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1924-1928）

The Ideology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1924-1928

黎冠忠

Kuan-Chung Li

指導教授：王遠義 博士

Advistor: Yuan-Yi Wang, Ph. D.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January,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中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1924-1928）

The Ideology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1924-1928

本論文係 黎冠忠 君（學號 R01123018）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6 年 1 月 24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  
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王憲義

（指導教授）

吳居仁

王政

## 摘要



過往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解釋長期為國共兩黨所壟斷，因此中國近現代史往往變為國共兩黨的歷史。事實上，活躍於這段期間的行動者比比皆是，特別是在 1920 年代，是思想最百花齊放、相互競逐與辯論的一個時代，也是中國、世界的各個政治勢力在中國相互爭鬥，意圖奪取政治權力的時代。本文所關注的對象，正是這個時代中，曾經與國共兩黨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鼎足而立、互相競爭的政黨「中國青年黨」，旨在說明他們為何組黨？如何誕生？採取了哪些政治行動？政黨的宗旨與意識形態為何？

本文第一章，我說明本文的問題意識、過往青年黨相關研究之不足以及論文架構。第二章梳理青年黨誕生的歷史情境、原因與過程，以及 1923 年成立後所採取的政治行動，是如何在國共北伐前得到了為數不少的信仰者與支持者，並成為第三大黨。第三章解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內涵，「國家主義」是青年黨所信奉的意識形態，青年黨對此做出清楚的解釋，並依照中國歷史情境將其中國化，提出一套以教育學、經濟學和政治論三種構想所組成的解決方案，並把這些要素組成青年黨信奉、宣揚的意識形態。第四章總結上述討論，指出青年黨的意識形態，恰好符合了「意識形態真空」的中國的需求。

本論文指出，過往研究者忽視中國在 1920 年代思想的混亂性，以及中國人與對俄國理解的變化，以致無法分析清楚青年黨之所以能夠崛起的過程，進而導致無法認清國家主義為何具有吸引力，其具體的內容為何。因此，本文將著重強調過往的歷史背景之影響以及國家主義的內涵。

**關鍵詞：**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意識形態

# 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s been monopolized by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s the history of Kuomintang (KMT)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fact, there were many activists and flourishing thoughts at that time, especially in the 1920s. And many political forces (Chinese or foreigners) were struggling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So I focus on The Young China Party (YCP) which was fighting with KMT and CCP, an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China from 1919 to 1928, to show the birth of YCP and their political actions from 1924 to 1928, and to explain the ideology of YCP: Nationalism.

In Chapter 1, I will explain the problematic of this thesi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other studies of YCP, and the structure of this thesis. Chapter 2 will show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China from 1924 to 1928, the birth of YCP, and what actions they took after they established their party in 1923. And Chapter 3 will analyze the content of ideology of YCP: Nationalism. Finally, Chapter 4 will summarize the key point in this thesi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emphasize that other studies have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oughts of China in the 1920s, so they fail to explain why YCP was established, became stronger and fought with KMT and CCP.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Nationalism and why Nationalism became popular. This thesis will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The Young China Party, Nationalism, Ideology

## 謝辭



時光匆匆，從寧靜單純的花蓮到繁華的台北市，流連於此，已八年半。2008年初來臺大，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繼續唸碩士班，並產出這本儘管不成熟、但總是八年半來學習結晶的論文。這本論文能夠順利的完成，受到非常多人幫助與支持。因此儘管拙於文字，但在此容我以幾句簡短的話語，表達我心中那其實無以言喻的感激與謝意。

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王遠義老師。論文的題目、方向、參考材料與寫作，也都仰賴老師提供了大量的資訊與建議，每次與老師的討論，總是有不少收穫，讓我在寫作上減少許多阻礙。而從大學部修習老師西方思想史與中國近代史，一直到研究所的課程，老師的思想與思考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觀點，一直深刻影響著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開闊和指引了我對世界與學問的視野。也很感謝老師給我機會成為老師課程的助理，不僅讓我有工作的機會，得以不用再在碩士班還花費家人的辛苦錢，更讓我有機會更多時間與老師接觸，老師的身教、言教，也無一不影響著我。非常感謝老師的指導與包容。

同時，感謝兩位論文口試委員，吳展良老師與丘為君老師。在研究回顧考試時，吳老師已擔任我的考試委員，針對我的論文，老師也細心指出許多我未充分注意到的問題與層面，使我能從更多不同的角度，審視與重新思考自己研究有何不足。丘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思慮不周之處和問題所在，並點出許多我論文中仍未注意到的思考層次，以及告知寫作文筆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給予我上述種種許多幫助。兩位老師在口試所提出的問題與延伸層次，許多是當下階段力有未逮之處，故論文中未能夠回答，若有機會，希望未來有時間能夠改寫論文，回應老師們提出的問題與建議。

對於一個從落後的鄉下花蓮，來到台北這個繁華卻冷漠的大都市，因此內心充滿不安、困惑、自我質疑與寂寞的我而言，在大學到研究所的生涯中，能夠遇到諸多師長、同學與朋友，在學業、生活與心靈上，給予許多溫暖的關懷與幫助，對此，我內心充滿感激。請容我一一感謝。

感謝師長們。謝謝陳弱水老師，陳老師是我大學時代的導師，儘管您非常忙



碌，但卻非常關懷學生，上您的史料課與中古史課程時，獲益良多，更在我剛上碩班時，就願意讓我出任中國史二的助教，謝謝您的包容。謝謝王遠義老師，老師對於課程助教「用人不疑」的態度，讓我能夠在討論課中盡情發揮，值得我學習。謝謝吳展良老師，在碩二那年讓我當中國史四的助教，在這段期間遇上了反服貿的 318 運動，老師不僅表現出對社會與學生們的關心，更身教地表現了知識分子關懷社會的風範，讓我學到很多無法言喻的事。謝謝陳翠蓮老師，願意錄取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生來當戰後臺灣史的助教，經過陳老師幽默生動、帶有豐沛感情與知識的一個學期，我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有了更深的認識，能夠對腳下這塊土地的過往有著不同的認識，老師熱切地參與社會上的事務，是我學習的典範。謝謝呂紹理老師和顏杏如老師，錄取我擔任課程助教，給予我充分的信賴，也在助教事務上給予我許多溫暖的鼓勵和指導，讓我能夠有更多的進步，兩位老師的課程內容，也更開啟了我對於臺灣史更多層面的思考，謝謝兩位老師。謝謝周婉窈老師，在學生趕不上論文大綱發表的時間時，不吝伸出援手，讓學生參與老師學生們主辦的發表會，順利完成畢業條件，而老師對於臺灣歷史上人們苦難的歷史與同情、參與社會事務的付出與用心，均使我往往感動不已，也促使我願意更深入地了解、參與社會事務，為自己所愛的土地付出心力。感謝上述諸位老師，老師們亦師亦友地包容著、教導著我，在言教、身教上，都讓我學習到很多很多，儘管未來不走學術之路，但在這段人生路途上，很感謝上天，能夠讓我遇到老師們。

謝謝系辦助教們，讓我有機會在系辦工作，與四位助教相處時，總是最愉快的，不管是助教們對於我之前參與社會運動時睡過頭的包容，還是學業、感情等各種生活瑣事，都給予我溫暖的關懷，讓我一直感懷於心，不敢忘記。

R01 的同學們，一直是這條痛苦的論文之路上，互相扶持的好夥伴。廷杰，大學以來便一直是討論學術、時事、國際等事的好夥伴，儘管意見時有不同，但一直堅定立場地給予回應，讓我能夠以更多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相信在不遠的未來，你會成為一位了不起的學者。謝謝曼竹，曼竹作為研究室裡少數的女性，總是在我遇到與異性相處的困難時，給予我非常棒的建議，讓我這個不善於和異性相處的人，能夠避免許多尷尬。謝謝偉杰，在研究所能夠結識你這個好友，能夠自在地交流對於學術、時政、感情等事情的看法，並給予我許多協助，真的很

高興。謝謝同樣在論文之路上一同努力的晏顯、徐鉞、許滄、立婷、明德、育晟、林佳、子喬、瑞音、才登、天駿、權修（儘管你並非 R01，但我認為，你其實是 R01），我們一起走過的這段日子，我永不會忘記。

在所上這段日子，許多學長姊、學弟妹也給予我許許多多的協助與陪伴。謝謝承樞學長，碩一必修課以來，就給予我許多協助，更接受我臨時的求助，擔任我大綱發表的評論人，也在各方面給了我很多建議與幫助，感謝學長。謝謝景雯學姊，從我入師門以來，一直關心我這位不成熟的學弟，傾聽我在學業、政治、情感上各種的困擾，衷心感激學姊不厭其煩地聆聽、與我交流，真的很感激學姊。謝謝建守學長，拉我進入故事與說書的寫作團隊，鼓勵我寫作，不吝給予我指導，讓我對於自己的寫作，不管是書評還是論文，都更有勇氣。謝謝雅琳學姊，在畢業後，持續關懷論文進展遲緩的學弟，不時地直接提醒我論文該加把勁了，讓我被持續推動著，才能在碩五上寫完論文。謝謝林榮盛，儘管 R00 的你總是開玩笑地叫我學長，但在論文的最後完成流程中，謝謝你協助我完成許多麻煩的程序，得以順利完成所有的步驟。謝謝黃庭碩、郭珮君、黃麗君、丘文豪、許秀孟、蔡松穎、蕭琪、黃琬柔、張純芳等學長姊，在我論文寫作的過程中，閱讀我那不成熟的論文給予我建議，或在我遭遇各種困難的時候，總是適時的給予我幫助、一同暢談、抒發情緒，謝謝你們的陪伴。

研究室的學弟妹們，是在 R01 都畢業後，給在研究室寫論文的我的歡樂的來源。特別謝謝盈佳，妳總是認真、仔細地聆聽，然後溫柔地回應我所說的每一句話、每個論點，帶給我更多的反思，教會我更溫柔而非冷酷地思考這塊土地上每一個脆弱的生命、每一段應該溫情看待的歷史，研究所這段期間若沒有妳，將少掉不少顏色。謝謝思儀，政治上我們有著許多有趣的辯論，刺激了思考，而妳認真閱讀我的論文，給予我許多唯有專業編輯才會給的建議，讓我的論文變得更好，謝謝妳。謝謝旻恆一直閱讀我的論文，給予我肯定與建議。還有紋沛、淨仁、志豪、聖峰、凌霄、嘉涵、前倬等學弟妹，沒有你們，在研究室的生活將枯燥無味，乏味的研究之路上，有你們陪伴，是一件讓人感到快樂的事情。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兩位好朋友，周芷萱與李捷瑩。芷萱從大學至今，就是一直扶持我的夥伴，不管是一起當助教抱怨學生的時光，還是在 318 開始的社會運動、研究生協會會長的選舉，我們都一同參與，儘管日後我們走的道路並不相

同，但我們都能互相了解彼此，給予彼此鼓勵與協助，能夠在大學結識妳這位好友，真的很開心，也很謝謝妳。婕瑩，能在補習班認識你，並與妳成為好友，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人生因緣總是玄妙，不是我這種常人所能理解，但是很高興能交到妳這麼棒的朋友，不僅在我延畢、需要關閉 Facebook 趕論文時，伸出了援手，不斷地督促我寫論文，還熬夜陪我趕完口試的演講稿，更在我情感脆弱的時候，親切又不失直接地告訴我許多真相，讓我認清了現實，同時更在各種事情上，幫助了我許許多多，妳使我更完整，沒有你，我不可能完成這篇論文，感激之情無以言表，唯有感謝。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親人。父母從高中選科系以來，便包容我僅因興趣、而非理解的基礎上，就無理選擇了歷史系，乃至考歷史所，不僅給予我無盡的包容，讓我在學習上沒有憂慮，能夠度過快樂的八年半，更包容我中途跑去補公職的魯莽舉動，而你們建立起的這個溫暖的家，是我的靠山，更是避風港與溫暖的窩。兄長冠鑫在我不在家的時候，代替我照顧父母，處理大小事務，更對我有許多包容，也在父母不理解我的行為時，替我解釋，你是讓我能夠無牽掛的在台北自由生活的支柱。自幼一直最關心我的外公外婆，還有兩位阿姨與舅舅，你們雖然並不瞭解我到底在做些甚麼，卻總是支持我，並關心著我是不是吃飽穿暖，深怕我餓著凍著，如果沒有你們的愛與支持，這條路將走得艱辛。還有在去年過世的奶奶，自幼雖然與您較少時間相處，但是我能理解，您以您的方式在理解妳的孫子，和給予關愛與支持，只是，很對不起，我沒有能夠在您在世時就拿到畢業證書給您看。家人們，謝謝你們對我的包容、支持與愛，你們是我走到最後的動力與支柱，沒有你們，就沒有黎冠忠，謝謝你們，這份論文，儘管並不成熟、寫得不好，但是，仍然希望獻給你們，以衷心表達我無盡的、無以言表的感激與感謝。

撰寫論文時，正巧碰上臺灣近幾年來巨大的變動，這段期間，心境數度轉變，已無法如當初所設想般去撰寫這本論文。但最終還是盡力地完成了這本論文。這段日子，各位的陪伴、支持、包容，將是我永生難忘的事，並讓我能夠更勇敢地面對茫茫的未來。最後請讓我再說一聲，謝謝你們。



# 目 錄



摘要.....	i
謝辭.....	iii
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論文架構.....	18
第二章 中國青年黨的誕生.....	19
第一節 何以創立？創黨前後的歷史情境.....	20
第二節 少年中國學會與勤工儉學.....	26
第三節 中國青年黨的創立與活動.....	31
小 結.....	42
第三章 青年黨二零年代的國家主義.....	45
第一節 國家主義的內涵.....	47
第二節 中國國家主義如何實踐？.....	64
小 結.....	87
第四章 結論.....	91
參考文獻.....	9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中國首倡於梁啟超 (1873-1929)。梁氏在變法失敗、東渡日本後，透過閱讀日文翻譯的西文譯著，加之受到當時身處之日本國內氛圍影響，開始提倡國家主義，主張中國應師法德、義、日等國，透過推行國家主義，意圖使中國在其「適者生存」之世界觀中，得以生存。<sup>1</sup>梁氏以其如椽妙筆，藉由清末盛行的新式媒體以及學會等做為傳播媒介，此一主張在中國乃廣為傳播。而中國青年黨 (以下簡稱「中青」) 之意識型態主張，則亦同名為「國家主義」，該黨創黨者如曾琦 (1892-1951)、左舜生 (1893-1969)、陳啟天 (1893-1984) 等人均多受梁氏影響，更曾有請梁氏出面領導之意圖。<sup>2</sup>

然中青之「國家主義」雖深受梁氏影響，但不代表他們全然接受了梁氏的觀念。由於外在環境有所變化，加上多人留學歐洲，故歐美學術思潮的變化亦影響了他們對國家主義的內涵，再者中青之國家主義理論的創造，也不限於一人，因此在論述上，已與梁氏過往提倡的國家主義有所不同。<sup>3</sup>

中青之決定創黨、提倡國家主義的時間，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提倡國家主義之德國戰敗之時，國家主義的形象隨著德國之敗而遭污名化。中青為

---

<sup>1</sup> 對梁氏國家主義思想深受到日本影響之研究，可參見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中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二版。

<sup>2</sup> 沈雲龍，〈曾琦先生傳〉，收於《中國青年黨建黨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1973)，頁 62；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香港：自由雜誌社，1941)，頁 134；陳啟天，《寄園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78。與梁氏之關係可以參見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158-177。

<sup>3</sup>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113-119。

與過去之國家主義做區隔，乃提出所謂防衛的、進步的「新國家主義」。<sup>4</sup>

而從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勤工儉學至青年黨創立、發展以來，中青與中國共產黨雙方在競爭青年入黨、中國應採取何種革命策略、主義宣傳等各方面均為論敵，彼此不僅在理論上有著激烈的論爭，更在1924至29年，國共從合作到分裂這段期間，中青與國共兩黨形成了三黨競逐的政治競爭。<sup>5</sup>

在上述情況下，加上支持者對於理論完善的要求，曾琦、李璜、余家菊和陳啟天等人在承繼過往國家主義理論的同時，也運用當時歐美解釋國家的盛行說法，如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以完善中青的國家主義理論，並將之系統化。<sup>6</sup>同時在這段期間，中青的組織也得以大力發展。<sup>7</sup>

因此，本文的問題意識，是希望解釋，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外是處在一個國際環境不穩定，而國內則政局和社會秩序混亂、經濟衰退，同時過往居於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崩解，導致意識形態真空、解決問題的各種「主義」盛行的狀況下，國家主義者是如何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進行政治活動，組成青年黨，與國民黨、共產黨形成三黨競逐的情勢的？同時，國家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國家主義」內涵是什麼？與「民族主義」有何不同？他們又是如何將之具體化為一套有系統的解決方案，用以宣傳、說明這個意識形態與解決方案，是如何能夠有效回應中國當時的具體情境的？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sup>4</sup>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頁 105。詳細內容參見陳啟天〈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原名〈何謂新國家主義〉)(臺北：冬青出版社，1973)，頁 31-46。

<sup>5</sup>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收於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66-101。學權爭奪則可參考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15 年再版)，頁 155-418，特別是 219-246、291-305。

<sup>6</sup>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134-140；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53-110。

<sup>7</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146-215；曾輝，〈中國青年黨研究(1923-1945)〉(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頁 114-134。

王奇生在〈“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一文中指出：

長期以來，學術界考察1920年代的中國革命，目光緊投向國共兩黨，而輕忽和漠視中國青年黨及其國家主義思潮的存在和影響。這種長期習焉不察的輕忽和漠視，其實仍是當年國共兩黨“革命”意識形態之餘緒，亦即將青年黨定性為“反革命”黨派。歷史研究者有意或無意間將目光更多地投向歷史進程中得勝利的一方和比較“進步”的一方，潛意識層面實際仍未脫“優勝劣敗”和“成王敗寇”觀念的束縛。<sup>8</sup>

這一段話，正巧指出了中國現代史研究上，諸多史家因其觀念束縛與意識形態先行，過度關注國共兩黨，導致忽略了這段時期歷史的複雜性。處於劇變下的近現代中國內部，有著眾多類型的行動者，以及其所從事的各種行動。

因此，在相關研究中，相較於國共兩黨等熱門主題，中國青年黨的相關研究，就筆者所知可謂稀少。而在相關的研究者中，早期以海外學者為多，多為簡單地論述中青的誕生與發展。<sup>9</sup>而臺灣的相關研究，雖有部分發表於《傳記文學》上發表的文章，但多半為簡單傳記敘述而非研究論文。<sup>10</sup>至於中國研究者則因意識形態與過往歷史上的對立，多數研究論文的論述均流於意識形態的攻擊，站在成王敗寇、敵對意識的立場上抨擊青年黨。<sup>11</sup>直到二十世紀末葉，隨著逐漸擺脫政治對立與意識形態的鬆弛，海內外對於中國青年黨以及相關人物才逐漸出現較為客觀、深入的研究。

本部分將回顧中國青年黨的相關研究成果。而在文中，將省略多數以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進行抨擊的文章。本文回顧以中國青年黨的發展歷史為主軸，時間向度將從青年黨成立前的少中時期開始，迄於一九四九年中國青年黨隨

<sup>8</sup>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頁 68。

<sup>9</sup> 海外最早研究者可參見陳劉潔貞（Chan Lau, Kit-ching）的論文，參見 Chan Lau, Kit-ching,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1923-1945”.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sup>10</sup> 這部分的例子可見沈雲龍，〈兩位反共的先驅：梁啟超與曾慕韓〉，收於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臺北：傳記文學，1981），頁 167-180。

<sup>11</sup> 可見李義彬，〈國家主義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反動活動〉，《歷史研究》第 5 期（北京，1965），頁 33-46。其餘可參考陳正茂，〈近五十年來有關中國青年黨之研究概況與述評〉，收於氏著《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資訊，2008），頁 7-9。

中國國民黨前往台灣，而範圍則兼顧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然囿於時間與學力所限，所回顧之前人研究，將以較為重要、為過往學者重視的研究為主。



## 一、中國青年黨發展史

### (一) 少年中國學會之研究

少年中國學會誕生自五四之後，受到五四風潮的影響，不願意與現有的黑暗舊政治走在一起，認定只有從社會進行改造，才能造就好政治來拯救中國。他們從事了大量的社會事業，如創辦各種報刊、從事學術研究、試辦工讀互助團、參與勤工儉學、從事反基督教與收回教育權運動等事，影響卓著，並且成為當時最有名的社團。然而隨後由於會員離散各地、社會改革實驗的失敗、學會內部因採取政治還是社會改革路線與主義的爭辯，最終導致學會的分裂與解散，也誕生了兩個重要且敵對的政黨：中國青年黨與中國共產黨。

關於少中之研究，筆者將參考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兩本著作，以及張少鵬的博士論文〈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加以簡略說明。<sup>12</sup>

陳正茂之著作，改自其過去所做之碩士論文，後於1996年由中國青年黨黨部出版，筆者採用的版本是2010年秀威資訊出版之新版本。本書共分九章，分數背景、動機、發起之經過、活動與發展、分裂、反宗教運動、收回教育權活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以及結論。

書中詳細敘述了少年中國學會誕生的時代背景，以及為何從事社會改造活動而非政治活動、發行報刊、工讀互助、勤工儉學乃至於日後分裂等事件，而學會分布更擴及國內外，影響深遠。此得力於作者握有大量的原始史料，並詳加利用，可謂將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盡可能完整地呈現出來。

再者作者透過詳細的考證，將少中的學會大事、會員名單等盡可能詳盡地

---

<sup>12</sup>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臺北：秀威，2010；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羅列出來，對於少年中國學會史的研究者而言可謂福音。然而本書的缺點，在於作者本身即為青年黨員，加之囿於時代限制，因此在描述過程中，對於共產主義以及後來參與共產黨者，用詞均帶有中青黨派之意識形態進行評論，如「受其蠱惑」等語常見於行文之中，實為缺憾。<sup>13</sup>

吳小龍的著作亦改自其博士論文。本書的敘述內容，扣除結論外共有四章，分別敘述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和成立、學會的主要活動、內部的思想爭論、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鬥爭。前兩章內容論述少中學會的發展過程與各種活動，而第三章與第四章則為本書重要論點所在。

作者在第三章論述學會內部的思想論爭時，從地緣的角度出發，指出不同會員出身的地域以及當下所處的環境，對於會員的意見與主張造成莫大的影響，而當這些會員改易所處環境時，均會再對其過往的意見形成反覆修正，這個觀點是過往的研究沒有注意到的。<sup>14</sup>

而在第四章，則花費較多心力論述國家主義形成的思想內容、政策方針，以及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雙方的諸多分歧，並敘述了雙方的論戰，最後作者指出，國家主義雖然各方面都設想了，但卻無法形成理論體系，這是國家主義的弱點，因此無法跟已有一整套唯物主義觀念的共產黨人相比，在論述上落於下風。<sup>15</sup>更指出少中國家主義派雖然把持了後期的少中會務，但不能把少中與青年黨做任何組織、理論上的聯繫，對陳正茂的聯繫說提出反駁。<sup>16</sup>

奠基於多數研究者之上，張少鵬在博士論文第二章，從晚清以來的學會發展趨勢、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趨勢、想藉由團體強化改革與個人修養等等方面，加以分析了少中何以成立，更指出曾琦想要藉由創立團體，來參與、改造國民黨，進而改造政治，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sup>17</sup>少中的發展則雖與上述兩書

---

<sup>13</sup>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頁 187。

<sup>14</sup> 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頁 97。

<sup>15</sup> 同上註，頁 194。

<sup>16</sup> 同上註，頁 199。

<sup>17</sup>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48-54。

類似，但是張氏指出，少中內部從原本理直氣壯主張「社會活動應優先於政治活動」，到「社會活動應包括廣義的政治活動」，乃至於「政治活動擺脫社會活動的限制，成為主要訴求」，乃是少中學會按著時勢的發展理論的變化，亦即是少中在大時代環境下必然的發展過程。<sup>18</sup>此點與上述陳、吳兩書互相補充。

總結上述，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既有晚清以降的歷史淵源，也有民國時期的政治問題背景，更有民族主義在五四以後的激盪，使得許多人團聚在一起創立了少中，並做出相當多的努力與嘗試，然而也因為時勢的發展，少中最後因此分裂，乃至解散，此為時勢所導致。而其中一部分少中會友，遂成為青年黨的主要成員。而下面本文則分述中國青年黨整體以及個別黨員的研究。

## （二）青年黨整體發展之研究

陳劉潔貞（Chan Lau, Kit-ching）是最早開始談論中國青年黨的學術論文，他在1972年所發表的論文。<sup>19</sup>內容從少年中國學會談起，簡略扼要地敘述了青年黨的誕生、發展、挫敗、與國民黨合作、參與抗戰推動憲政的努力，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以及政治理念，並做出對青年黨失敗的評價。但因時空限制，故使用的材料相當有限，連《醒獅週報》亦未能用上。以整體而言，該文因無意識形態的拘束，描述尚稱中允客觀。

1988年陳雲卿的碩士論文〈中國青年黨的創建和初期發展(1923-1929)〉，分三章論述國家主義理論的淵源與形成、曾琦創黨動機的探究與青年黨創黨過程、回國創辦《醒獅週報》進行宣傳、與中共的鬥爭，以及組織的發展、活動與衰退。<sup>20</sup>此篇論文運用大量材料爬梳史實，並以中青一方的視角出發。而相較於陳劉潔貞的研究，也據此詳實寫出這一時間中國青年黨各方面的狀況，論述全面且完整。

---

<sup>18</sup> 同上註，頁 41-42。

<sup>19</sup> Chan Lau, Kit-ching,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1923-1945”*.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sup>20</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1992年林如蓮（Marilyn A. Levine）所發表的“*Zeng Qi and the Frozen Revolution.*”一文，則分析了從少年中國學會到青年黨創黨的緣起，以及青年黨早期的國家主義理論。他觀察中青（特別是曾琦）的創立、意識形態、政綱等，歸結其特色為受到法國法西斯主義者，如法國法西斯主義者Maurice Barrès（1862-1923）及其所屬激進右翼政黨所影響。<sup>21</sup>然而馮兆基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他指出林如蓮行文本身的矛盾之處，如中青「缺乏歧視外國人的種族基礎」、  
「沒有什麼證據顯示他們反對議會制度和民主政治，而反對議會制度和民主政治是大多數法西斯主義組織的真正特徵」，認為是林如蓮誤解了青年黨。<sup>22</sup>

周淑真於1993年出版的《中國青年黨在大陸與台灣》一書，涵蓋的時間範圍起於少年中國學會，迄於1990年，本書敘述中國青年黨隨著中國局勢發展導致的政治變化與早期的國家主義理論，是中國早期較有系統的研究，而其使用率先使用《東方公論》研究青年黨在東北時期的活動，以及探討青年黨內部的分裂因素，更是本書的亮點。

雖然較中國以前研究為客觀，但周氏書中仍然擺脫不了馬列意識形態，以及站在共產黨成王敗寇政治的立場，因此對青年黨做出許多政治性的批判與攻擊。且周氏並無列出其所運用的參考書目。<sup>23</sup>而吳國樑、陳正茂等人更指出，周氏據以判斷抗戰時期青年黨有「兩面適應」與「三方布置」言論的史料，乃是引用了青年黨投靠汪精衛政權者的言論，亦即是孤證，是否可以採信，仍待商榷。吳國樑也質疑，周氏過度強調中青是反共才成立，卻忽略臨城劫車案對於中青創立的重要性。<sup>24</sup>惟段煉指出，其實曾琦早有組黨以反共救國之意，臨城劫車案僅是給予了創黨的契機，而非因此事才創黨，可視為對周、吳兩人討

<sup>21</sup> Marilyn A. Levine, “*Zeng Qi and the Frozen Revolution.*” in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ited by Roger B. Jean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2, pp.225-240.

<sup>22</sup> 參見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150。英文原文則參見Marilyn A. Levine, “*Zeng Qi and the Frozen Revolution.*”，p235.

<sup>23</sup> 周淑真，《中國青年黨在大陸和臺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sup>24</sup> 吳國樑，〈國共以外的選擇：中國青年黨之研究（1923-194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哲學碩士論文，1998）頁9；陳正茂，〈近五十年來有關中國青年黨之研究概況與述評〉，頁4。



論之補充。<sup>25</sup>

吳國樑在1998年提出的碩士論文〈國共以外的選擇：中國青年黨之研究（1923-1949）〉，共分四章。前三章別具一格地提出了對青年黨發展三階段的分法：1923年至1935年的「草創期」、1936年至1949年的鞏固期以及1949年後的「衰敗期」，敘述青年黨的活動、思想等多人論述的議題，但其提出的分期值得商榷，例如，分期的根據為何？吳氏並無提出可信服的論點，且因跨越的幅度過大，導致其各章（特別是第三章論及抗戰至戰後十三年）的論述過於簡略。不過第四章探討其組織內部分裂和鬥爭等內緣因素時，較周淑真更指出了經費問題，以此分析青年黨衰落的原因，為本篇論文的亮點，較過往研究更深入地討論了青年黨為何無力發展下去的問題。

孫承希2002年的博士論文〈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著重於論辯青年黨的國家主義思想。<sup>26</sup>該文第二章與第三章，從少年中國學會論起，敘述國家主義派的發展，特別是第三章，從政治理念的理路出發，論述醒獅派（國家主義派）自身的集體意識如何形塑自身主義的看法；以「全民共和論」提出全民革命與全民政治與階級協調，和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論戰；以「政黨政治論」主張民主政治、兩黨輪流或聯合執政、合作反共等主張，用以拉攏卻又對抗國民黨，發前人之所未發。


值得注意的是王奇生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sup>27</sup>本文從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了當時革命話語的形成、國共青三黨競逐的狀況，以及青年黨與共產黨為何成為理論對手，雙方論戰背後的思維邏輯與理念鬥爭。可說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張少鵬2005年的博士論文〈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從少年中國學會至

<sup>25</sup> 段煉，〈臨城劫車案與中國青年黨的成立〉，《歷史教學問題》5期（上海，2009），頁60、66-69。

<sup>26</sup> 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關於國家主義思想，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sup>27</sup>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頁66-101。



1930年代初期，仔細分析了青年黨從誕生到發展的內在與外在理路，特別著重了曾琦在創黨以及發展前期的角色。扣除緒論與結論，該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論述少中的發展與變化，從外在形勢分析少中如何從社會趨向政治，而曾琦等國家主義派是如何從中產生；第二章則從組黨、宣傳、組織與活動入手，分析了青年黨誕生的動機、人脈、與共產黨的衝突，醒獅社的誕生和宣傳成績，青年黨嚴密的組織規劃、逐步公開團名與黨名的策略以及活動成果；第三章則主要論述國家主義的流衍、發展、內容與政治理念，留待下一小節論述；第四章則分述青年黨與梁啟超、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黨際關係；第五章則說明青年黨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後，逐步轉變其發展策略以圖生存的過程，如依附軍閥、公開黨名以擴大宣傳，以及在各地發展武裝實力來抗衡國共兩黨等。

張氏對青年黨與研究系的互動分析，是本論文的重點之一。過往多數只論述曾琦對梁氏的嚮往，但曾琦之所以創立少中、創立青年黨以圖發展，並排斥所謂「舊人物」，均是由於梁氏之多次拒絕而起，可以看見曾琦本人與梁啟超的互動，對於青年黨創立的重要影響。<sup>28</sup>而在軍事發展上，過往論者如周淑真、吳國樑等多注重青年黨發展了孫傳芳金陵學堂、四川、雲南與東北等地的武力，作者更指出了各地的馬賊、土匪、民團等地方勢力也受到青年黨的籠絡，發展成一股勢力，更曾試圖發動軍事行動奪取地盤，可惜因戰敗、內部分裂等事而告終，並隨著與國民黨的合作，走向解散。<sup>29</sup>此論文可以說是自周淑真後，中國對青年黨早期各方面做出最下苦功努力的論文，詳述了國家主義派的方方面面，且已經擺脫了過往的意識形態藩籬，是客觀且較為全面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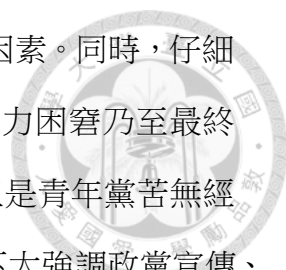
而曾輝在2014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國青年黨研究（1923-1945）〉，則集中研究青年黨作為一個「黨」的各種面向，例如成員、組織、經費、宣傳、武裝、與國民黨的合作，以及戰爭期間至戰後的憲政運動等。

曾文的特色在於研究了青年黨人物的「性格」，以左舜生為例，論述了青

---

<sup>28</sup>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158-175。

<sup>29</sup> 同上註，頁 236-241。



年黨的思想，強調其書生本色如何決定了青年黨走向落敗的因素。同時，仔細地對青年黨困窘的經費來源做了調查，指出此為其往後活動力困窘乃至最終失去獨立性的重要因素；而作為政黨，宣傳策略十分重要，但是青年黨苦無經費，加之理論體系不完整、辦報刊的內容多常有學術研究而不太強調政黨宣傳、行動上的缺乏等等，使其宣傳策略失敗；組織上雖然規劃嚴密，然因經費短缺而擴展有限，主要在四川、華北、東北、上海和福建等地有發展，成員上起初雖有起色，然而因為東北王霍事件導致分裂，使得黨的成員大為減少，直到抗戰期間乃至戰後才有大幅發展，然而嚴密的組織僅是口號，作者指出書生本色和對自由理念的影響，嚴重鬆散了組織的紀律，也導致了青年黨黨力無法與其他兩黨並列。

軍事上，作者指出青年黨早期並未意識到武裝力量的重要性，直到北伐之後才開始發展，但有著多種的發展策略，特別是掌握地方既有的民團武力和攏絡地方軍閥（特別是四川與東北）等具有成效，但隨日本侵略，這批武力不是解散就是投入抗日，並作為宣傳資本，而也隨著與國民黨的合作，遂放棄發展武力，投入成為民主體制運作的和平政黨。然而這卻導致了其最終走向依附國民黨的道路；而與國民黨合作的策略，由於青年黨本對國民黨一直以「諍友」自居，因此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一直發出合作呼籲，起初雖不順利，但透過左舜生等人的努力，並在西安事變挺蔣的狀況下，最終雙方達成合作共識；而論述憲政發展方面，由於與本論文研究課題無關，故省略之。

總體而言，曾輝的研究論文對於青年黨的外在要素重新做了研究，特別是其費力所做出的統計表格、會員名單等等，對於深入了解青年黨的獨立運作能力有深刻的分析，而其提出的「書生性格」特質對青年黨發展的阻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論點。<sup>30</sup>

上述以政黨史的角度，回顧了青年黨的發展歷程，其中可以看到過往的研

---

<sup>30</sup> 曾輝，〈中國青年黨研究（1923-1945）〉，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究逐步深化，早期的研究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黨派色彩，但也基本上均按照史料詳述史實。隨後因為兩岸交流，史料的流通也使得青年黨的研究能更加深化，研究逐漸避免了運用孤證，以及政治偏見的影響。更能將這段歷史放入當時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脈絡中加以討論，突出中國青年黨對於當時時代的重要性。而對中國青年黨如組織、武力、經費等問題，研究也日益精緻，跨出極大的步伐。

然而，筆者注意到，對於青年黨的政黨組織規劃設想之嚴密，是受到列寧式政黨組織模式的影響？還是受到五四以後各地學生會組織模式的影響？鑒於過往中國正黨多參考美國的柔性政黨，較難無法提供青年黨的發展資源，而少中也是極其鬆散的組織，故這一部分似乎可以再多做討論。同時，周淑真的論點雖仰賴孤證，但其指出曾琦在抗戰後期潛入日佔區這一點，究竟為何如此？曾琦又在日佔區做了甚麼？是否有跟日本人從事合作的可能？因曾琦的行為導致了青年黨內部的分裂，因此仍待釐清。

就個別人物的討論上，沈雲龍在1981年曾經寫過〈兩個反共的先驅——梁任公與曾慕韓〉，探究雙方的互動往來與心境變化，以及曾琦組黨緣由。<sup>31</sup>而陳正茂在這方面曾經在1992年發表〈李璜的政治初航（1919-1923）〉、1993年發表〈曾琦與民國政治〉等文章，探討曾琦與李璜個別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前者論述李璜從參與少中以後，如何開始從事政治活動談起，乃至於在法國成立中青為止，並扼要地介紹了國家主義概念；後者則談論曾琦一生中所從事之政治活動，其中橫跨的時間乃是從曾琦幼年到1951年於華盛頓過世，因此對各方面基本上都有簡略的述及。<sup>32</sup>

以上兩文對於李璜早期和曾琦整體的政治活動有一俯瞰式的論述，然因僅為論文，且因作者身為中青黨員，故敘述從簡，並未將時代風潮與反面論點納

<sup>31</sup> 沈雲龍，〈兩位反共的先驅：梁啟超與曾慕韓〉，收於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臺北：傳記文學，1981），頁 167-180。

<sup>32</sup> 陳正茂，〈曾琦與民國政治〉、〈李璜的政治出航（1919-1923）〉，均收於氏著《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資訊），頁 173-228；229-259。

人參考，內文也多有讚美之詞，近似於作傳。

1992年在香港，李金強發表〈曾琦與其《國體與青年》〉一文。此文文風與陳正茂類同，但此文主要論及曾琦幼年至五四這一段時間，著重於探討曾琦早年的重要著作《國體與青年》，指出此書受到日人德富蘇峰（1863-1957）的影響，並表達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信仰共和政體的精神，更指出曾琦對於青年的寄託與信仰、對前一代政治人物的厭惡。<sup>33</sup>

沈雲龍、陳正茂和李金強的研究，均指出梁啟超與曾琦的關係，極大地影響了曾琦的觀念，以及其為何創辦少中與青年黨。這一部分在〈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中，張少鵬深入探究了曾梁兩人的關係，作者指出梁氏的拒絕與加入段內閣等事，實是使曾琦對於過去舊人物的反感、對舊政治的失望，以及創立少中與青年黨的源由，而梁啟超最終也因身體不佳，在復出政壇與否之間猶豫時即逝世，結束了兩人之間相互影響的一段過往。<sup>34</sup>

在張少鵬之後，康之國《曾琦國家主義理論研究》一書，是較完整的曾琦個人研究。<sup>35</sup>康氏以思想史的方法出發，探索了曾琦的思想來源，並指出曾琦的政治運動來自於其背後的國家主義思想。本書的出發角度與張少鵬以內在理路思考的方法近似，但是特點在於，康氏是以研究個別人物而非政黨史進分析，可謂是青年黨探究的突破。然而本書的缺陷，在於康之國受到其師周淑真的影響，仍然充斥成王敗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偏見，因此對於青年黨仍多所指責與批判，為其研究的嚴重缺憾。

從上述的個別人物研究，看出青年黨的個別人物研究仍然處於初步階段，除了曾琦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之外，其他人如李璜、陳啟天等人的研究仍然處於替人物立傳的階段，尚待深入，而曾琦的研究也仍因作者意識形態的束縛，因此對其研究也仍有待開發。但張少鵬與康之國的研究方法，是開啟青年黨人物

<sup>33</sup> 李金強，〈曾琦與其《國體與青年》〉，收於金觀濤等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 493-506。

<sup>34</sup> 同註 28。

<sup>35</sup> 康之國，《曾琦國家主義思想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研究的可行方法，是值得後人注意的。

## 二、青年黨國家主義思想回顧

在1920年代，青年黨創辦時即提出了國家主義的主張，本節即回顧研究國家主義思想的各家研究文獻。

首先，在探究國家主義是如何產生、源頭何在這一問題時，在陳劉潔貞、陳雲卿、陳正茂、吳國樑、孫承希、王奇生、張少鵬、康之國的研究中，提及國家主義的起源與其內容，這些研究認為梁氏的國家主義思想和晚清的民族主義思想均深刻地影響到青年黨諸人，儘管這兩者與青年黨的國家主義主張並不完全相同。<sup>36</sup>孫承希、張少鵬和康之國更注意到歐洲的國家主義思想（特別是德國）以及日本的國家主義思想對於青年黨的影響力。<sup>37</sup>

因此，根據上述研究，可以指出國家主義的淵源可謂有三：（一）歐洲的國家主義（二）日本的國家主義（三）梁啟超國家主義與晚清的民族主義。因此，可以看見的是過往研究者對於中國國家主義的複雜性探索，除卻上述第一小節的外力因素之外，更已注意到國家主義內在理路發展的源頭，並探索其如何與中國的特殊環境互動。

其次，中國內在環境的影響，根據孫承希、敖光旭等人指出，更是對五四的個人主義、世界主義乃至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反動，並對中國強烈的反傳統思潮做出抗拒。國家主義對於中國反對自身傳統、接納西方思潮的反應，提出了強烈的文化保守主義，認為國家主義主張的「國性」、「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等，乃是立足於中國本身的傳統之上，進行演化。

然而中國當下的潮流卻與國家主義的主張背道而馳。因此國家主義援引歐

<sup>36</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頁 3-9；吳國樑，〈國共以外的選擇：中國青年黨之研究（1923-1949）〉，頁 90-107；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頁 12-17；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110-112；康之國，〈曾琦國家主義思想研究〉，88-92。

<sup>37</sup> 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頁 12-17；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118；康之國，〈曾琦國家主義思想研究〉，頁 72-82。其中曾琦尤愛引用法國國家主義「祖國高於一切」的口號，可清楚表現其受法國國家主義思潮的影響，參見曾琦，〈國家主義者之四大論據〉，收於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卷一）〉（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 387-388。

陸玄學基礎之歷史文化哲學以及實證主義哲學進行國家主義的建構，構築出與激烈反傳統相對的文化保守主張。但這個思想，本身即互相矛盾，導致了理論內在的困境與宣傳的失敗，使得青年黨人為尋找出路，逐步放棄玄學方面的主張，轉而建構一套理性、符合時代激進走向的文化激進主張。<sup>38</sup>而日後創造新理論「生物史觀」的常乃惠，更是其中轉變的最明顯者。<sup>39</sup>

而在宣傳時，鑒於五四之後反對國家主義的潮流，國家主義派不得不區隔其與德國軍國主義、民族主義之不同，正名青年黨之主張為「新國家主義」，是防衛而非擴張的、是和平而非侵略的國家主義，也不是以血緣為主、一民族一國家的民族主義，更與軍國主義完全不同，而是以國家為中心、統合各民族的一種主義，是一種共同生活下的人民產生國性，對於國家所共有的情感。<sup>40</sup>因此吳國樑和張少鵬透過名詞的辨析，使其區分出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等的不同。<sup>41</sup>

至於國家主義對教育的看法，陳正茂和肖海艷已有較為完整的研究，顯示了國家主義意圖在抵抗外國強權的文化侵略，更是為了保存中國文化，因為保

<sup>38</sup> 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頁 17-21；敖光旭，〈1920—1930 年代國家主義派之內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 期（廣州，2006），頁 90-109。

<sup>39</sup> 張少鵬，〈常燕生東西文化觀的激進化及其演變〉，《史學月刊》6 期（開封，2013），頁 77-86。

<sup>40</sup> 李璜在〈釋國家主義〉中指出：『「國性」乃是國家的人格。每個國家從其靜的（*Statique*）組織成分而言，有其種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自其動的（*Dynamique*）組織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特殊，信仰之特殊。於是每個國家所有的國民其生活的志願便不能進同於其他一個國家的國民。本著這個特殊的生活志願，便發現特殊的生活狀態。因此由內而外，皆認識得一個羣體的自我（*Le moi collectif*），這便是國家人格的構成與表現。每個國民在性情與行為上皆具有其國的國格。……未有一國國民的人格部表現出他的特別地樣範；明白言之，這種每個國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這種國家人格的縮小便是每個國民的人格。所以國家人格受了損失的時候，國民人格便立刻感覺得受了損失。全靠這小己與大羣的情感意志相黏著、相影響之力，便成功國家的意識（*La conscience nationale*）和國民的靈魂（*ames du peuple*）。』而李璜又在同一篇引用法國學者的話來說明：『德罷朗特（*De Barante*）說得好：一個民族的「國性」的成立是基於他的過去的回憶的；這種回憶並且是全民族，無分階級，都一樣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刺激，便同時一齊感覺不安；一個國家被了侵凌而全國國民都要起來抵抗，便全靠這個共同回憶而發的情感，絕不是只靠利益的觀念。』因此，「國性」的外在乃是一種經由生活、組織、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塑出來的國家靈魂與國民生活模式，而國性的內在則是這個國家共同的歷史回憶，合之則形塑出一個國家的靈魂，與國民的共有特性。參見李璜〈釋國家主義〉，載於《醒獅週報》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一號、十月十八日第二號、十一月八日第五號，轉引自《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頁 1-26。

<sup>41</sup> 吳國樑，〈國共以外的選擇：中國青年黨之研究（1923-1949）〉，頁 94-96；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頁 119-133。

存了文化等同保存了中國人的國性，中國在國家主義的演進過程中才能在自己的根裡面，從家族社會過渡至國族社會。故國家主義主張收回教育權。<sup>42</sup>

這一時期的國家主義，孫承希深刻地指出，中青運用涂爾幹的理論，分析中國社會所處的階段，是國民需要具有同質觀念的階段，因此需要國家主義。並主張透過教育等方式，把國家主義變成統一全國國民的信仰與集體意識。再者，醒獅派繼承清末以降強調道德改造的主張，指出最高的道德就是愛國，故要藉由愛國觀念，來團結國民來追求公益：「國家」。中青更主張賦予國家絕對化的權力，認為唯有強大的國家才能保衛民族、社會、國家。

簡而言之，中青國家主義立場呈現出強烈的集體主義色彩，並認為在國家獲取自由之前，群體自由乃優先於個人自由，個人首重義務與奉獻，直到國家得以自由自立於世界，不受外國強權侵略。<sup>43</sup>

到了一九三零年代，由於多數青年黨人投身政治與野戰抗日，國家主義理論的發展遠遠不如《醒獅週報》時期。故這一期間，以主持辦報的陳啟天、常燕生、黃欣周等人對國家主義理論進行新的創造，以應對時局。

他們指出，此時中國面臨了「雙重國難」：日本侵略與共黨作亂。因此在政治上主張對內實行全民民主的全民政治，取消一黨專政、以黨治國的「黨治」，並且要求消滅共產黨，對外則主張建立「國民政府」、「野戰抗日」，各黨各派大聯合等主張，進行政治宣傳。<sup>44</sup>

在理論上，則有「新法家主義」與「生物史觀」的提出，用以應對政治上的新變化。孫承希指出，陳啟天主張的新法家主義不僅是強調政府的集權措施，使得政府的權力絕對化、社會軍事化、政府高效化，使中國可以在世界各國競

---

<sup>42</sup>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頁 153-180；尚海艷，〈陳啟天與 20 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權運動——兼談國家主義教育思潮〉，《歷史教學（高校版）》第 2 期（天津，2009），頁 44-56；尚海艷，〈陳啟天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探析〉，《社會科學戰線》第 6 期（長春，2010），頁 246-249。

<sup>43</sup> 孫承希，〈醒獅派之集體意識與道德社會的追求〉，《史林》2 期（上海，2003），頁 98-105；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頁 83-96。

<sup>44</sup> 康之國，〈曾琦國家主義思想研究〉，頁 133-162；尚海艷，〈“新國家主義”與九一八事變后陳啟天的抗日救國主張〉，《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 卷第 15 期（長春，2013），頁 116-121。



爭下建構出一個「集團」並集中全力應對國際局勢的政治哲學，這是為了面對集團競爭的新戰國時代，陳啟天為了保護中國的生存而提出的救國手段。但同時孫承希提醒我們，此處陳啟天誤解了中國法家「法制」與西方「法治」概念的問題，有滑落極權的危險。<sup>45</sup>

而常乃惠、黃欣周等人主張的「生物史觀」，以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基礎，用以強調世界已經是集團在進行生存競爭，以及運用進化的社會階段論、國民性是國家社會進化的決定性要素，指出強調國家主義的國族社會是比共產主義社會是更進一步的，對抗共產主義與唯物史觀，而這樣的社會是藉由日益分工而有機地進化的社會。<sup>46</sup>

綜上所述，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理論研究，在早期多處於論述二零年代的國家主義階段，但在2000年之後，慢慢地出現了對於二零年代進一步的國家主義理論「新法家主義」與「生物史觀」的研究。而在這方面，目前的研究已經呈現了這兩種主張的大體面貌，然而這兩種主張是否與中青的民主政治觀念有所衝突，以及其與當時時代氛圍下的互動是什麼，則尚待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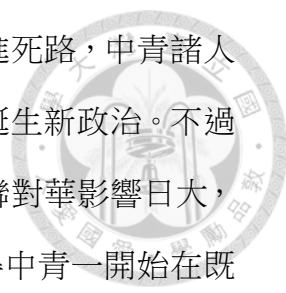
#### 本節總結

綜論上述研究，中國青年黨所誕生的環境，是一個中國處於內憂外患、求助無門、民族主義澎湃成長的時代，也是中國大量引進西方思潮意圖拯救中國、將中國當作西方思想的試煉場的時代。

在民國前期，曾琦等人就受到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所形塑的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隨後日本二十一條的要求、巴黎和會的失望、國內政治的腐敗、對於寄望之政治人物的失望等，使得他們心中的民族主義不斷成長，同時也讓他們對既有政治失望，進而寄託於社會改造。

<sup>45</sup> 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頁 121。

<sup>46</sup> 孫承希，〈析國家主義派的“新法家主義”與“生物史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上海，2003），頁 109-116。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頁 111-130；尚海艷，〈陳啟天的「新法家」與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二十一世紀》第 136 期（香港，2013），頁 44-56。



然而社會改造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屢經失敗，最終走進死路，中青諸人只好再走回政治改革的老路，以政治改造社會，再以新社會誕生新政治。不過雖然中青不斷宣傳蘇聯作為赤色帝國主義的陰謀，然由於蘇聯對華影響日大，共產黨也已經成立，中青寄望的國民黨也與共產黨合作，使得中青一開始在既無外援、內無地盤的狀況下，從零開始發展。

此時中青為了對抗共黨，並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採取首先宣傳的策略，在晚清民族主義、梁啟超國家主義、歐日國家主義等理論上，配合中國國情，構築出屬於中青的「新國家主義」，並隨著日益完善，吸引了不少熱血青年，更成為共黨的理論對手。但是隨著國共北伐，青年黨的勢力隨之被拔，逼使他們與過往的敵人軍閥合作，尋求生存，因而名聲受到打擊，發展受到壓抑。

跨入一九三零年代，青年黨不僅因國民黨統治中國的確立，受到一黨專政的打壓外，也因為外來侵略日漸嚴重，他們將全副心力投入反黨治、追求民主、抗日等事上，黨力已受到不小的損傷，更在三零年代因東北組織分裂，使得中青發展近乎倒退。

因此在此時，為了應對「新戰國時代」，以及強調團結、強力國家的重要性，加上國家主義理論因為眾人投入政治事務和抗日，已經停滯許久，陳啟天、常乃惠等人提出了新的理論：「新法家主義」和「生物史觀」，說明中國社會團結和發展以及強而有力政府的重要性。這也是同時受到日漸逼近的國難，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對於「民主」和「獨裁」、法西斯主義的親近有關。

然而中青諸人一開始提出的國家主義，甚至他們認同的民主政治，一開始就是具有強烈的集體意識。因此他們追尋的民主政治，不是以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是追求國家自由與富強、挽救中國於危亡的政治手段。因此，即使中青主張民主，這也只是政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他們運用此所謀求的，仍舊是挽救中國的命運。

###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的章節共分四章，除去緒論與結論外，將分兩章。

第二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敘述晚清以降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變化，再透過描繪當時紛雜的政治、思想背景，指出當時中國政治局勢的混亂，以及意識形態真空的危機，指出這是中國青年黨得以發展茁壯的背景。第二節則描繪五四運動後誕生的少年中國學會，以及青年黨與共產黨成員分化出去的歷史背景。第三節則描述青年黨為何誕生，如何誕生，以及回國後的政治活動。

第三章則分兩節，第一節討論國家主義的內涵與歷史，指出國家主義的要點為何？與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有何不同？而國家主義如何實踐於中國的系統化方案，將於第二節敘述。本節所要討論的重點，在於1924年至1928年之間，國家主義者如何敘述，將之成為一套適用、能夠具體回應當時中國歷史情境的方案，並將這套方案成為其意識形態中的重要部分。

藉由這兩章的剖析，筆者意圖呈現中國青年黨如同眾多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般，為了因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西方現代性對中國的推進對中國內在環境與文化產生劇變，以及迎接共產黨各方面的挑戰，他們構築出一套他們認為中國可行且應行的道路的主張，希冀以此改造中國，並落實於政治活動，藉此面對並回應日益艱困之現實情境的挑戰。

## 第二章 中國青年黨的誕生



### 前言

自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的國內外處境並未隨著革命而減緩，反而日益艱困，而這些艱困的環境，影響了當時的人們，因此本文將檢視中國所遇到的內外局勢變化，在清楚地看到這些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後，檢視這些情境如何影響當時人們對於中國未來走向的思考。而中國青年黨（以下簡稱「中青」）的創立，也與此一情勢密切相關，因此若欲深入討論中國青年黨的創立、思想與發展走向，除了探討此一歷史情境外，勢必得從同樣因此一環境而生，且影響其深遠之團體：「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說起。本節首先說明中國近現代史的政治、思想與社會變化，再將少中史帶入此一歷史情境中，概要地說明少中的發展，以及其對中國青年黨的影響。

而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股思潮便是中國的反傳統民族主義。林毓生總括其特點，指出了此一潮流肇因於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敗，此後中國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思想中，走上激烈反傳統的民族主義，並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運動當中逐步達到顛峰。<sup>1</sup>沈松橋也指出在五四時期，已經使民族主義從啟航期跨越到操演期。<sup>2</sup>青年黨的成員們，包含曾琦（1892-1951）、李璜（1895-1991）、陳啟天（1893-1984）、左舜生（1893-1969）、何魯之（1891-1968）、張夢九（1893-1974）等人，也自然沐浴於其中、受到民族主義的浪潮影響，因而採取一系列的行動，從創立學會、推行社會事業的社會改

<sup>1</sup>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收於《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下冊）》，頁 785-863。

<sup>2</sup>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 期（臺北，2002），頁 59-80。

革，走向創立中青、從事政治鬥爭的政治改革。他們作為這一連串政治行動的行動者群體，其所處的政治、社會、思想等歷史情境為何？此也是本章意圖描繪之情境。



## 第一節 何以創立？創黨前後的歷史情境

中國民族主義產生與擴散的過程，實與一連串國內外激盪的政治事件無法分離。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與此密切相關，故探究民族主義的內涵與發展，則與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如何構築中國民族主義、選擇了哪些元素，有著相當大的聯繫。

首先，林毓生指出如嚴復、梁啟超等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乃是隨著甲午戰後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而出現，中國民族主義帶給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乃是迫在眉睫、即將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使得具有入世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進一步探索解決方案。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則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變成了劇烈要求變革、帶有競爭性的意識形態，使他們迫切地尋找快速且能有效帶來效益的富強手段。故在民族主義籠罩下，任何變革都必須符合這一意識形態的要求，加上中國知識分子「藉由思想文化改造以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因此導致了之後激烈的反傳統主義。<sup>3</sup>

其次，王遠義寫道，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受到西方思想家的影響，產生了與中國過往思想截然不同的歷史分期與歷史時間觀，並採行了西方的社會發展階段論說法、「合群」的集體國家利益至上以及進化論的宇宙觀，這不僅導致了與傳統分裂、對傳統落後的指責，進而產生了反傳統主義，更使得第一代知識分子為了克服中國處於落後階段，尋求能夠使中國擺脫落後者的命運，在此第一代知識分子分成了革命與改良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但皆都認定除去過去

<sup>3</sup>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馬列主義及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頁 785-863。

歷史人為導致落後的錯誤，必然能使中國加速朝向光明的未來，跳脫必然的發展觀念，而上述的觀念則進入了中國民族主義中，深深影響了日後的五四一代人。<sup>4</sup>



再者，沈松僑指出，梁啟超所提出以國民組成一有機體國家、國家至上等概念的國家主義論述，實是予中國民族主義鋪墊下了高度以國家為趨歸、中心的基石，而這股民族主義力量在五四爆發，並在其後如五卅、九一八事變等二、三零年代的重大事件中，以青年學生為基礎，強力推廣這一以晚清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使其高度加溫，在抗戰時達到高峰。<sup>5</sup>

而李澤厚也指出，五四運動之後，「啟蒙」與「救亡」成為中國的主奏，兩者相輔相成，然而在之後內憂外患的壓力下，象徵啟蒙的個人主義與、自由、民主等理念輸給了代表救亡的政治改革、國家利益等現實局勢困境，因此救亡的重要性壓倒了啟蒙。<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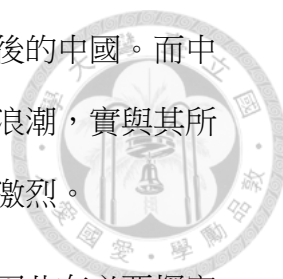
綜合上述，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多重意涵，而其中最重要的要素，乃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競爭觀和適者生存觀、社會發展的階段論與社會進化觀、處於落後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國家與國民之間具有連帶關係的有機體觀念、以國家而非血緣或種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以及國家至上等等內涵。同時應注意的是，在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家與民族關係之間的曖昧，中國民族主義究竟是以民族為主？還是以國家為主？張灝指出，辛亥革命以前階段性地雖以種族為核心的「小民族主義」論述為主，但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人們則逐漸走上以國家為主、梁啟超所提倡的「大民族主義」論述。<sup>7</sup>

<sup>4</sup> 王遠義，〈現代中國思想變遷中的歷史主義〉，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編，《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2005），頁 375-416。

<sup>5</sup> 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頁 49-119。

<sup>6</sup>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於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出版者不詳，年份不詳），頁 7-57。

<sup>7</sup>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頁 75-91。



上述種種觀念，深刻地影響了自晚清、民國乃至中共建政後的中國。而中國青年黨人們，自然也深受影響。而上述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浪潮，實與其所面臨的世界局勢密切關聯，並隨著時間往後推移，一次比一次激烈。

而此一民族主義思潮，則誕生自中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因此有必要探究這股民族主義的誕生環境。以國內情勢來說，李劍農即指出，自晚清遭逢一連串對外挫敗以來，外國勢力雖逐漸深入中國，然中日甲午戰爭的敗北，卻開啟了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狂潮之開端，這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開端。而此後中國仍接連與外國發生戰事，或者在中國境內，被外國之間的戰火所捲入，每遭逢一次戰火，外國就從中國取得了更多利權、劃分勢力範圍。

中國雖逐步認知到西方的長處，開始採取改革策略，但由於保守派阻撓與統治者在改革努力的挫敗，使得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十分虛弱。即使在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中國內部不因此而安寧圖強，反因國內袁世凱與國民黨政治鬥爭、袁氏稱帝、護國之役、府院之爭、張勳復辟等政爭，不僅瓦解了民國北京政府虛弱的統治能力與權威，更因軍閥與黨派彼此爭奪政治權力與地盤、與外國勾結，全國陷入政治鬥爭與內戰，軍閥之間大小戰爭不斷。而外國勢力則趁勢更加深入中國，並仰仗其對軍閥、政黨的資助，從中取得更多利權。<sup>8</sup>

就外界情勢而言，民國甫創三年，即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此時西方國家的勢力從東方抽離，日本即趁權力真空的此時，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起中國人的怒火，民族主義在中國人加速擴散，造成五四之前最大的一場民族主義抗爭運動，亦是五四運動的先聲，同時也改變了中國人過去對日本人親善、學習的態度。然而在現實上，北京政府無法也不願在沒有西方列強的支持下獨力反抗日本，最終仍與日本妥協，引起人們的不滿，而政府無法與人民交

---

<sup>8</sup>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 13-362。

流互動，同聲共氣抵禦外侮，也引發知識分子的反省，決心放棄政府，轉向啟蒙人民一途，也就是 1915 年新文化運動的開端，並埋下五四運動的種子。<sup>9</sup>

隨著一戰局勢的變化，中國在段祺瑞主導下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並派遣大量華工前往歐洲前線協助。而人們也認為中國必須站在「公理」的民主國家一方，對抗象徵「強權」的德奧一方。因此在同盟國戰敗之後，遂有「公理戰勝強權」的歡呼，並認定中國能夠從中收回遭德國強租、後為日本所佔的青島等地。然而在 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不僅無法收回德國在山東的利權，更必須讓日本取得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此事經梁啟超等人洩漏，引起中國自二十一條事件後最大的一波抗爭。自晚清以來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心中那一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中國將被淘汰的恐懼感，以及過往信任西方國家的那股被背叛感與憤怒感，使得民族主義擴散至更廣大的階層，而在五月四號北京的大學生們所主導的抗爭中、後續全國的行動中展現出來，迫使北京政府放棄簽字，拒絕承認凡爾賽和約。

這一股狂潮也引發了中國人新一波的反省與思考：「如何拯救中國」？顯然，辛亥以來的政治革命失敗了，老舊、黑暗的社會誕生不了優秀的政治人才，因此五四運動是要啟蒙大眾、從事社會改造，改造出全新的社會，而從這一全新的社會誕生出來的政治，自然就會是好的政治，而創造出新的社會與政治以後，就會形塑出一個團結、合群、能夠在國際生存的國家。因此，大量的社團、學會、機構、文化活動與社會改革行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sup>10</sup>

故在此時，中國彷彿西方思潮的試驗場，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思潮，意圖從中尋求解救並創造新中國的藥方，同時也受到當時思潮與中國傳

<sup>9</sup> 羅志田，〈救國抑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收於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 55-95。

<sup>10</sup>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王奇生，〈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收於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39-65。



統思想中所蘊含的大同理想、世界主義的刺激，產生了一股對普世的關懷。<sup>11</sup>因此當 1919 年蘇聯十月革命爆發後，中國即開始注意到蘇聯與共產主義，並且由於對西方在巴黎和會的失望。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受到列寧喊出的口號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理想所吸引，隨著蘇聯宣告對華的放棄特權，更在中國引起一股對蘇友好的熱潮（北方知識界尤然），因此在 1920 年之後，共產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布。<sup>12</sup>特別是李大釗（1889-1927），受到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的鼓舞，積極引進並吸收馬克思主義，並與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們積極接觸，隨後更與胡適、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等人進行激烈論戰。<sup>13</sup>

此時蘇聯推行世界革命策略，對外輸出革命，希望藉此化解蘇聯遭到國際封鎖的危機，遂往資本主義最薄弱的外環地帶—東方輸出革命是有必要的，因此第三國際派員來到中國，意圖擴展穩固其東方地盤，並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接觸，進一步促成中共 1921 年組黨。然而蘇聯了解中共無法瞬間壯大起來，故其策略在於尋求東方勢力中較為開明者合作，如吳佩孚與陳炯明等人，但隨後蘇聯與這些人合作破裂，因此轉向孫文的國民黨，在馬林、鮑羅廷等人的合力下，促成雙方合作。而國民黨亦注意到五四以後青年的活力與可能性，同時孫文在盱衡局勢、並與第三國際接觸後，決定聯俄容共，雙方在經過數度磨合後合作，改組國民黨，並合力對付軍閥。孫文雖死於 1924 年，但雙方合作依舊，並於 1926 至 28 年之間進行北伐。然而也在北伐途中，合作破裂，國共對立的新局於焉展開。<sup>14</sup>

而 1920 年初期的中國局勢仍陷於軍閥混戰之中，直、奉等軍閥派系仍然混戰不已，政治領導也更迭不斷，導致北京政府的內外聲望更形低落。<sup>15</sup>屢屢發

<sup>11</sup>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於《時代的探索》，頁 105-140。

<sup>12</sup>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5 期（臺北，2007），頁 47-97。

<sup>13</sup>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3 卷第 4 期（臺北：2001），頁 477-513。

<sup>14</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2001），頁 56-112。

<sup>15</sup>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 363-460。

生的內外危機，例如外蒙問題、國內學潮、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事，均為當時北京政府無力回應中國社會質疑之問題，而這些事情同時也牽扯著國、共等各黨派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活動，特別是親俄之國共兩黨與知識份子、反俄的國家主義派以及北洋軍閥的走向。<sup>16</sup>也促使主張革命的國共青三黨，因為民族主義高漲以及北京政府軟弱無力之表現，而透過大量的運動與宣傳，大力發展其勢力，為國共北伐和青年黨與國共的鬥爭，鋪下更多基石。<sup>17</sup>也是在這樣的宣傳之下，主張革命的黨派與北洋派之間「新」與「舊」、「革命」與「反革命」等形象深入人心，革命派成為拯救中國、吸引民族主義者加入的一個新希望。而國、共、青更形成三黨競逐的情勢，形塑並開啟了中國的「革命政治文化」，此政治文化從此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調。<sup>18</sup>

然而，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步步推進，國共青三個革命黨之間產生極大矛盾，特別是以爆發流血的「清黨」為高峰，共產黨員被殺被捕，寧漢雙方先分後合，而青年黨、西山會議派等各種非共產黨人士也成為被抓捕、清除的對象。國民黨此舉，在欲於此時展示、奠定其於各方面均為領導中國的統治者，也是宣示壟斷革命政治文化話語的舉動，從此以後國民黨均用此一話語體系任意指控、打壓反對者。<sup>19</sup>在國民黨北伐結束後，隨即施行以黨治國的「黨治」，主張「黨內無派，黨外無黨」，並開始施以「黨化」教育，打壓反對團體，並引進大批北洋官僚入南京政府工作，因此使其形象大壞、政府依舊貪汙腐化。<sup>20</sup>

<sup>16</sup> 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期（臺北，2007），頁141-192；敖光旭，〈1920年代國內蒙古問題之爭〉，《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北京，2007），頁55-73；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47-97；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二刷。

<sup>17</sup>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頁76。

<sup>18</sup> 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收於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163-196，特別是頁176和182-193頁，南北新舊在北伐後期人們的印象中特別顯著；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頁66-101。

<sup>19</sup> 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11卷1期（臺北，2000），頁99-147。

<sup>20</sup>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著，陳謙平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頁11-42。

因此，儘管有著統一的中央政府，卻忙於剿共內戰，而實行黨治、走向一黨專政獨裁的情勢，不僅無法施行民主政治，更使本來因政府無力管制的自由風氣，至此已然大變。



## 第二節 少年中國學會與勤工儉學

與青年黨、共產黨淵源甚深的少年中國學會，是晚清民初以降的思潮，以及民初社會政治惡劣的局勢、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逼生出來的產物，作為創建「少年中國」之夢的人們，是在何時、何地，以及為何創立這個社團，那麼為什麼後來又會解散？以及與青共兩黨的淵源為何？本節即處理以上問題。

回溯當時政治情勢，中國在歷經了二次革命、袁世凱（1859-1916）稱帝等政治風潮後，北方軍閥失去能夠處於超然地位的領導強人，彼此鬥爭不斷。而後因府院之間如對德是否宣戰等諸多爭端，張勳（1854-1923）受黎元洪（1864-1928）邀其入京調停，張勳藉此推動清朝遜帝溥儀（1906-1967）復辟。然在段祺瑞（1865-1936）的優勢軍力以及各軍閥聯合反對下，段氏擊敗張勳後，再次主政北京政府，但各地均難聽其號令。而當時的議會政治亦因為袁世凱、張勳等數次帝制運動，也已受到嚴重的打擊，而段祺瑞所組織的安福系又與梁啟超（1873-1929）的研究系在國會內明爭暗鬥，段氏並透過安福系操縱國會。<sup>21</sup>另一方面國民黨又隨孫中山（1866-1925）南下，滯留上海或廣州，響應孫中山的護法號召，孫中山亦聯合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鬥爭。即使在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南北雙方有意議和，但實質上仍無結果。隨後北方軍閥數度混戰，中央政府不斷易手，最後落入直系的曹錕（1862-1938）、吳佩孚（1874-1939）手中。<sup>22</sup>在民主共和體制屢遭破壞、失靈的狀況下，使得人們亟思尋求其它拯救中國的藥方。例如章士釗討論國體問題，創辦甲寅雜誌，即是

<sup>21</sup>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頁 396。

<sup>22</sup>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頁 276-460。

從此方面展開思考。<sup>23</sup>

而民國創立未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旋即爆發。當時歐洲各國與美國捲入大戰之中，無暇東顧，日本在此時對中國頻頻施加壓力，意圖奪取更多的利益。首先是在民國三年（1914），日本以當時「英日同盟」為由，出兵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山東青島，並於民國四年（1915），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意圖將中國變為保護國，此舉引起中國各界極大反彈和民族主義的蓬勃壯大，而袁世凱政府的接受更使得許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對政府喪失信賴，選擇「從救國轉向救民」，以此邏輯走向了新文化運動。<sup>24</sup>對於「國家」的看法，更是「惡國家不如無國家」，對於當時的政府大力批判。<sup>25</sup>而新文化運動不與舊社會合作，從事「改造社會」的想法，則深切影響「少年中國學會」的創立理念。<sup>26</sup>

其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人當時寄極大的希望於戰勝的協約國召開的巴黎和會，視當時協約國戰勝同盟國為「公理戰勝強權」。<sup>27</sup>同時，希望能夠因為當時中國參戰成為協約國的一員，藉此取回被日本以戰爭藉口佔領的青島。然而英美等國與日本私下的承諾，決定仍將山東交給日本，引起中國社會以學生為先導的大規模抗議反日浪潮。五四運動期間，各界開始出現各階層的組織以抗議政府、列強與日本，其中以學生組織最為嚴密。這些學生組織的出現，混雜著民族主義的愛國熱誠、對北京政府的失望，力圖透過改造社會的方式救國，故促進了大批社團、學會的興起，從事各項社會的改造工作。<sup>28</sup>而少中即趁此風波，在經過一年的醞釀後正式創立。

探究少中創始者們的當初動機，可說是各個不同。王光祈、李大釗等多數

<sup>23</sup> 丘為君，〈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1期（台北：2016），頁9-23。

<sup>24</sup> 羅志田，〈救國抑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頁55-95。

<sup>25</sup> 丘為君，〈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頁23-40。

<sup>26</sup>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台北：秀威資訊，2010），頁15-35。

<sup>27</sup> 陳獨秀，〈《每週評論》發刊詞〉，收於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 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1993），頁427。

<sup>28</sup>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191-198。

人，當初即是見到政治黑暗，所以要從另一條路培養人才，以備未來少年中國之需。除此之外，少中內部的國家主義派（多數為未來中青之黨員）中，曾琦在年少時期，即有創設一團體加入國民黨後，再將國民黨加以改造的政治想法。<sup>29</sup>而當初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西原借款，許多留日學生因義憤而罷學歸國，組成「留日學生救國團」，現也因群眾並不支持而後繼乏力，為了收容這些學生、發展救國團體，少中發起人也有將其納入少中的構想。<sup>30</sup>

是故，「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工作雖於於民國七年（1918）六月三十日籌備，但也是在五四運動後，於民國八年（1919）七月一號，由王光祈召開大會，通過宗旨、規約等事項，才正式成立「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少年中國學會。<sup>31</sup>而少中的四大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主張從下而上地透過社會事業（「教育」與「實業」）去改革惡劣、腐敗的社會。這很明顯地呈現出辛亥革命後對現有政治失望、期盼從社會改造著手拯救中國的特點。

然而少中會友在是否可以自由從事政治活動、是否需要選擇一種學說（主義）為學會宗旨的這一事情上，卻一直懸而未決。<sup>32</sup>此事當時雖未解決，卻埋下了日後少中因環境變遷而走向政治道路、為了彼此的政治主張與意圖使少中成為政治團體等事情上，走向分裂的種子。<sup>33</sup>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入中國，許多知識份子開始關注俄國革命的情

<sup>29</sup>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48-54。

<sup>30</sup> 郭正昭、林瑞明合著，《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臺北：百傑出版社，1978），頁 20-21。

<sup>31</sup> 關於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成立的文獻與過程，參見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頁 219-230；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頁 48-57；郭正昭、林瑞明合著，《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頁 19-25。

<sup>32</sup>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 286-288。王光祈起初採納了李璜的建議，讓同仁自由從事這一活動。然而日後李大釗等人接觸社會主義之後，遂亟欲轉變學會的性質，遂引發了與曾琦等國家主義派的鬥爭，少年中國學會也因此緣故，最終於 1923 年解散。

<sup>33</sup>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 257-258。

況。如作為少中成員之一的李大釗，早在 1917 年就已經開始觀察俄國革命的變化，並在陳獨秀所創辦的《每週評論》上刊載如〈俄國大革命之影響〉、〈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 的勝利〉等文章介紹俄國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也在 1919 年與胡適於《每週評論》上有著「問題與主義」之爭，更在 1920 年於北京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而在 1920 年 8 月 16 日的聚會上，李大釗提出動議，把標明「主義」的問題提出討論，隨後即在《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三期上以〈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茶會上的講話〉為名刊出。<sup>34</sup>

李大釗此一動議的提出，不僅因為少中本身的團體思想上較為分散，同時也是因為少中本身在社會改革的嘗試等方面遭到挫敗，使得許多少中會友紛紛倒向政治上的各種主義，尋求新的出路。然而這也為日後 1921 年南京大會上，恽代英（1895-1931）等共產主義派與陳啟天、左舜生等國家主義派產生激烈論爭，最終導致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sup>35</sup>然而，這一分裂同時也與少中會友參加「勤工儉學」和留學海外法蘭西有極大的關聯。

在蔡元培（1868-1940）、吳稚暉（1865-1953）、李石曾（1881-1973）等人，基於本身「勞工神聖」以及無政府主義等理念的支持下，自民國元年開始籌辦「留法儉學會」，希望送中國學生往法國留學。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尚無實際行動。直到戰爭期間，由於法國急需人力，因此向中國招募大量華工。之後蔡、吳、李等人遂利用此一機會，送出大批學生赴法，並於 1921 年成

<sup>34</sup> 李大釗，〈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茶會上的講話〉，收於姚維斗、楊芹編注，《李大釗遺文補編》（哈爾濱：黑龍江省新華書店印行，1989），頁 3。但吳小龍指出，雖則多數人將李大釗的提出視為標明主義的起點，但事實上在少中成立後，《少年中國》的創刊號上即已有人提出此一問題，並引起北京（評估形勢後，先不要主義，日後多為共產主義派）、上海（發展學術，不要主義）、巴黎（主張要主義，日後多為國家主義派）等地會友的爭論，這與三方相處的地域安全與否甚有關係，此一爭論的結果，最終仍決定各行其是，直到 1920 年 8 月 16 日的茶會才由李大釗再次提出，並在 1921 年南京大會上討論，南京為較北京安全之所在，兩派在此再次劇烈爭論，然而當初的北京與巴黎兩方立場卻全然相反，最終雙方不歡而散，最終分裂。參見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95-108。

<sup>35</sup>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頁 89-126。陳啟天亦在此發表其〈何謂新國家主義〉（後改名為〈新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刊於《醒獅週報》上），成為中國青年黨的政治張本之一。另外如李璜、余家菊編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亦於 1923 年出版，成為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的教育理論。

立里昂中法大學，這些人人數最多時高達兩千多人。<sup>36</sup>時無政府主義在中國人中大為流行，成立了許多無政府主義團體，其中影響日後甚鉅的即是毛澤東與蔡和森（1895-1931）等人創立的「新民學會」，許多人嚮往前去法國半工半讀地學習新思潮，因此多響應赴法。而日後的中共黨員如張申府（1893-1986）、劉清揚（1894-1977）、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1898-1927）與陳喬年（1902-1928）等亦赴法，前往擔任中法大學教職或留學生。

然而，前往法國的人多數到了當地才發現，當時的法國因為戰後經濟不景氣，實際上能做的工作甚少，而能做的工作往往作的極累亦只能溫飽，而無心力再多作學習，呈現出李璜所謂「既不能工又不能讀」的情況。<sup>37</sup>當時在第三國際的協助之下，勤工儉學的學生中，較為貧困與不滿的學生開始受到共產主義的誘惑，周恩來（1898-1976）、鄧小平（1904-1997）、趙世炎（1901-1927）等日後中共的幹部均在此時加入共產黨。當時因許多人抵達後生活困苦，遂在鼓動下發生圍攻使館、進攻里昂大學的事件，造成多數人被遣返，包含熱衷於組黨的蔡和森，因此中共活動稍微停歇。但在 1922 至 23 年間，周恩來與趙世炎再次活躍起來，成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併入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在法國的華工與勤工儉學學生之間大肆活動。<sup>38</sup>

當時在少年中國學會中意識形態偏向國家主義的曾琦、李璜等見此情況，雖心中感到不恰當（如惋惜趙世炎之加入共黨），也在思考組黨之事，但並未採取行動。最終促使國家主義派團結起來的，乃是臨城劫車案及其後共產黨爭奪旅法華人團體領導權的一連串鬥爭。

<sup>36</sup> 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收於氏著《勤工儉學的發展》（臺北：三民，1988），頁 6-13。

<sup>37</sup>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 上卷》（香港：明報月刊，1979），頁 75-99。

<sup>38</sup> 陳雲卿，〈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30-34。李璜的回憶錄中詳細地回憶了當時旅法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參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 上卷》，頁 127-143、145-147。

### 第三節 中國青年黨的創立與活動



1923年五月，山東臨城發生孫美瑤（1898-1923）的劫車綁票巨案，引發西方共管中國鐵路交通的激烈輿論，尤以法國之倡議最力。當時在德國的曾琦見此消息，在審視國內政局後，立刻趕回巴黎，率先聯合少中會友，準備籌辦救國聯合會，隨後與日後為國家主義青年團創始人的胡國偉、張子柱聯絡，運用他們的刊物《先聲週報》發表通告，並認為此等大事應是旅法全體華人之事，遂聯絡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共同籌辦。然而在旅法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期間，除討論列強共管事外，劉清揚等共產黨人趁機宣揚「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與共產主義，遂引起曾琦、李璜等人的不滿，在《先聲週報》上反共，宣傳國家主義，與共產黨人的《赤光》半月刊筆戰。

此時，為與共黨對抗，他們計畫、籌備成立政黨的工作，最後於1923年12月2日，由曾琦、李璜、張子柱、胡國偉、黃晃等人在法國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廳正式成立中國青年黨，定宗旨為「本國家主義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sup>39</sup>從法國為基地，展開對旅歐共產黨的鬥爭。

當時因法國的言論自由不如中國國內緊張，故中共旅法支部較為鬆懈，中青黨員鄔剛如盜取國共合作共產黨的機密文件，曾琦判定必對國民黨有害，認為此乃共產黨意圖篡奪國民黨與孫中山的革命，遂將之轉交與曾琦為四川同鄉的國民黨老黨員謝持（慧生，1876-1939）的女婿曹四勿，請之轉交孫中山，

<sup>39</sup> 胡國偉，《巴黎新影：中國青年黨四十年前在巴黎成立初期與中國共產黨鬥爭的歷史回憶》（臺北縣：菩提出版社，1964），頁5-7；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上卷》，頁153-159；陳雲卿，〈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34-46。但段煉亦指出，臨城劫車案並非如此重要，在1923年建黨時通過的《中國青年黨建黨宣言》就沒有直接提及臨城劫車案，到1929年發表《中國青年黨公開黨名宣言》，亦即是提及此為「特殊原因」而非「一般原因」，一般原因則與少中當年指出「政治社會之腐敗」和「既成政黨之腐敗」類似，可見當時籌組政黨的理念仍是以此為主，臨城劫車案及其後事件僅是觸發曾琦等人決定組黨的一個特殊原因，參見段煉，〈臨城劫車案與中國青年黨的成立〉，《歷史教學問題》5期（上海，2009），頁68。



告訴他共產黨私自進行的陰謀。此舉不僅種下日後國民黨內部反共的種子，也因此雙方關係視同水火，甚至爆發流血衝突。<sup>40</sup>

在此同時，國內的政治局勢也開始產生變化。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以及孫中山本身希望取得蘇聯援助、改造國民黨為一布爾什維克式政黨的意圖下，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通過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主導下通過聯俄容共方針，國共正式合作。因此，旅法的共產黨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1924年紛紛歸國。

曾琦、李璜等中青黨人知曉後，當下亦決定返國，除曾琦受中華書局聘雇之個人因素外，也因為當時中青在歐洲的發展已達極限，同時因為旅歐、莫斯科等地的共產黨人多返國，青年黨為與之對抗，亦必須另闢戰場。因此當曾琦等人回國後，旋即與其他持國家主義主張的少中會友如等人以及國內反共的組織如薩孟武（1897-1984）、何公敢（1888-1977）等人創立的孤軍社進行聯繫，準備創辦刊物《醒獅週報》，進行「先宣傳，後組織」的工作。<sup>41</sup>曾琦等人歸國的時間，恰好正是中國國內對蘇聯的態度與認識有著數度大翻轉的時刻，國內的氣氛已經逐漸產生親俄、聯俄與反俄等二元對立的格局。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建立，旋即陷入內戰與外力干涉之中，直迄1920年底戰爭才告一段落。<sup>42</sup>然而，國內經濟旋即因實行「戰時共產主義」而加速惡化。<sup>43</sup>鑒於經濟情勢的惡化，以及1921年在坦包夫（Tambov）和克隆斯塔（Kronstadt）海軍要塞的兩次暴動，國內陷入第三次革命的危機，列寧在第十次黨大會上決定推行混合的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以恢復國內的生產力。

<sup>40</sup>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 上卷》，頁153-165。

<sup>41</sup> 陳雲卿，〈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56-64。

<sup>42</sup> 李邁先，《俄國史（下卷）》（臺北：正中書局，1989），頁440-465。

<sup>43</sup> David MacLellan 著，蔡伸章譯，《馬克思後的馬克思主義》（臺北：巨流，1989），頁181。

44而在 1919 年，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旋即建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意圖在歐洲先推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然而在歐洲推動革命意圖的失敗，歐洲強國視蘇聯為輸出革命的病原，以及蘇聯並不承認沙俄的債務，因此受到列強的外交封鎖。蘇聯為突破歐洲列國的封鎖，加上經濟上的困境，遂決定一方面先採取與資本主義國家妥協的做法，另一方面向東方與被壓迫民族與殖民地人民聯合，作為外交的突破口與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步。<sup>45</sup>

這一政策的背景除了蘇聯當時的國內外政經情勢的惡劣外，蘇聯國內也早已有相對提出的主張。在 1918 年，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即已提出〈不要忘記東方〉一文，指出東方是帝國主義者「幸福的基礎」，亦即各種自然與人力資源的後備來源，並主張由共產主義去引導殖民地人民發動革命，反對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失去他們的資源來源，引導世界革命的成功。<sup>46</sup>

到了 1920 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初稿〉，並於此篇中說明歐洲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的原因，乃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擁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藉殖民地之財富用以賄賂國內的工人階級，因此世界革命策略應改從受壓迫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出發，在那裏推行反帝國主義運動。<sup>47</sup>同時寫下「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不要與他們融合」等實行辦法。<sup>48</sup>可見蘇聯一直希望往東方輸出革命，然而由於和白俄內戰，以及外國聯軍的干涉，蘇聯的實質影響力，要到 1919 年蘇聯紅軍越

44 李邁先，《俄國史（下卷）》，頁 466-474。

45 李邁先，《俄國史（下卷）》，頁 474-490。

46 斯大林，〈不要忘記東方〉，《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 152-154。

4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94-95。

48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初稿〉，《列寧選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15-222。

過烏拉山、進逼東西伯利亞之後，才傳達中國。<sup>49</sup>

而當時中國的情況，恰好有利於蘇聯散播共產主義。由於在 1919 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在山東的權益為列強所交易，使得中國對歐美大失所望，激起愛國情緒澎湃的五四運動。當時仍處於內外交戰中的蘇聯，見機不可失，遂在該年七月由加拉罕簽署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表示願意放棄沙皇時代對中國侵略所得的一切權權益，希望藉此拉攏中國，但因當時蘇聯的勢力範圍仍未超過烏拉山，因此不論是北京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均尚未知曉此一宣言。直到 1920 年，北京政府才接收到此一宣言。<sup>50</sup>

1920 年四月，蘇聯勢力伸至東西伯利亞，成立遠東共和國作為與美日之間的緩衝，並派遣維經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6）來華探路，並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接觸，協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因此 1921 年，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1942）、尼科爾斯基（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1889-1938）的參與下，成立中國共產黨。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當時雖然中共急需共產國際的援助，但在民族主義的高漲下，中共不願意明文規定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直到陳獨秀在上海被逮，經由共產國際大力協助下，陳獨秀才得以脫困，也因此轉為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變為共產國際的支部。<sup>51</sup>此後，中共在中國的政治行動，如中蘇建交時的外交行動、外蒙古獨立與否的問題以及 1922 年商談國共合作等事，多半接受蘇聯與共產國際的指揮。

在 1919-1924 年這段期間，中國人對俄國的態度有著劇烈的變化，而這乃

<sup>49</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70。

<sup>50</sup> 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3），頁 50-51。事實上蘇聯所言放棄的特權，當時蘇聯是無力恢復的，在實際利益上，中國並無佔到任何便宜，但此作為與歐美對照下的一種姿態，仍使多數中國人感到振奮。第一次《對華宣言》參見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55-61。

<sup>51</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69-76。共產國際來華到將中共變為共產國際支部這一過程頗多曲折，從本來只想與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團體等建立關係，到變成建立共產黨，實有許多考量，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大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199-211。

是與俄國革命所帶動的世界革命認知、中國政府內外上的混亂與虛弱、中國社會自「二十一條」後即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以及對歐美諸國的失望等內外形勢息息相關，而西方文化因大戰導致中國人對其想法的幻滅，更形成胡秋原所謂的「二重文化危機」，中國青年在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均破滅的情況下，更苦於尋出路，社會主義正好填補此一空虛。<sup>52</sup>加拉罕發表的《對華宣言》在 1920 年傳入中國，成為時人認識蘇俄之基礎。宣言並激起中國知識界的友俄狂潮，引起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觀念在各種輿論間的傳播，許多學子嚮往並前往蘇聯，更有人開始傾向視蘇聯傳播的世界革命理念為拯救中國的不二法門。

在此一空前友俄親俄的氛圍下，當時輿論上亟欲北京政府與對中國友好的國家互相承認邦交。<sup>53</sup>然而當時北京政府因追隨協約國的行動，雖然在地方上已經開始實務的交涉，但沒有立刻承認蘇聯。<sup>54</sup>隨著蘇俄政權的鞏固，加拉罕旋即於 1922 年 9 月 27 日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然而第二次《對華宣言》中卻將中東鐵路一節修改為「另行簽訂使用中東鐵路辦法的專門條約」，同時在 1921 年藉口消滅白俄而強入外蒙，扶植親蘇政權。1922 年 8 月，蘇俄派越飛（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1927）來華，實是要升級蘇俄的東進政策，以革命促外交，利用中國知識界對蘇聯高漲的友好情緒完成外交任務。北京政府當時新任外長顧維鈞（1888-1985）與其談判，然雙方因外蒙撤兵與無條件歸還中東路之問題而陷入僵局，北京知識界中人以及報界均大力批判北京政府的遲緩，主張無條件承認蘇俄。而越飛為給北京壓力，遂突然參與日俄談判，隨後遞交有利於蘇聯的節略，欲否認宣言之無條件放棄在華特權，並持續鼓動輿論攻勢。<sup>55</sup>然當時輿論界已經開始轉向（如北京研究系之《晨報》等報

<sup>52</sup>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臺北：學術出版社，1983 年第五版），頁 41。

<sup>53</sup>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 50-51。此知識界的界定約為學者、教育界、學生界（三者合稱「學界」）、報界或新聞界（即「輿論界」）、及其他邊緣知識分子（包含部分廝身政界者），而知識界又可分為一般知識界和國共黨團知識分子。

<sup>54</sup> 王永珠，〈聯俄與仇俄：1920 年代中國知識界對蘇俄態度的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38-41。

<sup>55</sup>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 52-

以及上海報界)，到十一月更因此消息傳出，使得部分知識界對俄幻想幻滅。教育界與學生界並開始出現批評將革命與外交混為一談的聲音。而教育界、學生界與輿論界業已開始分化。



越飛見北京政府不肯退讓，遂南下與孫中山接洽。蘇聯當時意圖在孫中山、吳佩孚、張作霖之間縱橫捭闔，獲取中國承認，以及中東鐵路與外蒙的利權。越飛的南下乃是要給予北京政府壓力。而孫中山也希望讓蘇聯承認其為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因此雙方一拍即合，並聯合發表《孫越宣言》，孫中山並指示國民黨在上海的機關報《民國日報》協助輿論轉向支持蘇聯在中東路與外蒙的立場。<sup>56</sup>《孫越宣言》的提出引起了不小之爭議，越飛也因外交任務難以達成而離華。接替其任務者為發表《對華宣言》之加拉罕，國內知識界視為一線曙光。

然而加拉罕在對華政策上與越飛並無不同，均是以蘇聯之利己立場出發，故直到 1924 年，中俄外交問題仍舊於外蒙與中東路問題上打轉，是故仍無進展，而北京學界仍對政府施壓，促其「無條件承認蘇俄」，而此活動之背後實有中共骨幹份子在催動（即李大釗及全國學聯內的共黨分子）。而隨後 1924 年 2 月英國與義大利相繼在外交上承認蘇聯，中國學界主張盡速無條件承認蘇聯，以免喪失本能取得之權益，此間輿論造成本來主張先解決懸案再承認外交的北京政府莫大壓力。<sup>57</sup>

在 3 月 14 日，王正廷未經北京政府允許，便與加拉罕簽訂〈王加協定〉，並且強迫中方接受此一協定，牽引國內政潮學潮。當時國內因地域關係，北京

56. 第二次《對華宣言》資料參見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頁 86-90。

56 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頁 670；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頁 143-149。

57 協定的交涉內容與過程參見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頁 212-292；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 61-71。

學界部分已逐漸發現蘇俄之意圖，因此共黨知識分子所發動的學潮並未取得大量的同情，而較為穩健的輿論界、政界與人數漸增的國家主義者漸則主張先承認〈王加協定〉再協商外蒙與中東路懸案，而南方孫中山則極力否定〈王加協定〉，希望將蘇俄引導到承認其為合法政府、與之訂立外交此一方向。然而與孫中山合作的中共，因其當時作為共產國際之支部，因此透過各種方面進行活動，意圖使蘇聯與中國能夠建立外交，並力主讓外蒙古「民族自決」，因此大力抨擊上述各派。

親俄派、共產黨的言論與行動，逐漸使得國內反親俄派、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孫中山與國民黨內民族主義者開始與之分化，國民黨內部甚至在上海與廣州之間起了爭端（上海的《民國日報》多為共黨與國民黨左派主持）。<sup>58</sup>而隨著加拉罕在對外蒙古等事交涉的強硬，中國輿論界與政界對此有著激烈的反對態度，且學界之對蘇俄無條件承認與支持的態度已漸漸變化，聲勢已不如前，加之作為共產黨與蘇聯盟友的國民黨業因受到激烈輿論攻擊，已在外蒙古問題上轉向不支持蘇聯，處境進退兩難。加拉罕見此遂積極與顧維鈞接觸，雙方在承認王加協定之前提下（並改進其狀況），於 5/31 簽訂《中俄協定》。國民黨與共產黨、孫中山與鮑羅廷之間的裂痕更形顯著。

雖然隨後孫中山與鮑羅廷妥協，但國民黨的張繼、謝持等人，逐漸形成黨內反共的「右派」，即後來之西山會議派之雛形。<sup>59</sup>而當時國內之所以出現如此強烈的國民以輿論干預外交的行動，乃是一來對北洋政府感到不放心，立足國家立場尋求與俄國合作，同時也鑒於世界情勢，希望能夠中俄合作，共抗列強，二來又懷有「革命」之情懷，呼應蘇聯世界革命之主張，於是乃有所謂「無條件承認蘇俄」的主張產生，然而在其間，實有國共等親俄派、以及站在

<sup>58</sup> 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頁 293-299；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 71-79；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頁 149-162。

<sup>59</sup>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 79-87；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頁 163-186。

維護中國立場之一派兩股勢力的交纏與鬥爭。隨著對莫斯科外交目的之認清，其中站在維護國家立場的國人，對蘇聯所謂革命與共產主義之主張產生莫大懷疑，並起而抵制蘇俄之利己外交，而親俄的勢力則逐步限縮到國共兩黨以及少數親俄知識份子。然而究竟是否該「聯合」主張社會革命、以勞農為主體的蘇聯，實際上中國知識界中仍存有爭議。

在上述國內對蘇聯的外交舉動反感、國共兩黨的發展空間因而被壓縮之情勢下，曾琦等人於是年九月返國，並於十日在上海創辦《醒獅週報》，提倡「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國家主義。<sup>60</sup>此舉恰好與當時逐漸萌芽的民族主義銜接，填補了當時處於列強欺壓、受到蘇俄外交手段欺瞞而不願信任共產主義的中國人所尋求之意識型態，進而成為與提倡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相頡頏的對手。《醒獅週報》作為中國青年黨對外的言論機關報，除了與共產黨的機關報進行意識形態的論戰、作為宣傳主義的工具（演講、時評、論說三個專欄，並因應時事而出各種專號），同時亦是和當時國內與其友好的其他團體以及海內外國家主義團體（專件、來件和特載三專欄）的聯繫方式。<sup>61</sup>

除了透過《醒獅週報》的鼓吹，中青的成員也以到各地大學任教，與有意成立國家主義團體者接觸，以及已成立社團與中青聯繫等方式，逐步建立起國家主義團體彼此之間的網絡，並開始逐步吸收國家主義團體做為其外圍或將之改為支部。<sup>62</sup>而青年黨雖透過《醒獅週報》抨擊國共合作，但青年黨、特別是

---

<sup>60</sup> 李璜在〈國家主義正名〉中指出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差異，他認為國家主義是以「國家」而非「血族」作為單位，因此特重領土與主權以及生活於此領土上的人民，同化於此國家之下之各民族均共同為此國之國民，禍福同享，共同救國，而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為相反，因為國家主義是先圖自強、後圖獨立與解放，與帝國主義侵略不同，參見李璜〈國家主義正名〉，載於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醒獅週報》第三號，轉引自《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台北：冬青出版社，1973），頁 27-30。而陳啟天也說明新國家主義是主張國家存在均有其價值，應當互相尊重並反對侵略，參見陳啟天〈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頁 32-36。

<sup>61</sup> 陳雲卿對《醒獅週報》的各欄特色做了相當清楚的簡介，見〈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 74-90。

<sup>62</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 152-156。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 上卷》，頁 186-188。

黨魁曾琦的態度為力勸國民黨與共產黨解除合作，並與國內各團體進行「神聖聯合」，然國民黨並未採納其意見。<sup>63</sup>至於共產黨，則視之為共產國際之支部，並不視為一「政黨」。<sup>64</sup>



曾琦等人歸國未久，1925年上海即爆發五卅慘案。當時軍閥之間的混戰仍然持續不斷，而直系與奉系之間的戰爭並未稍歇，1924年，浙江督軍盧永祥（1867-1933）與江蘇督軍齊燮元（1885-1946）之間爆發江浙戰爭爭奪上海控制權，盧永祥敗走後，時任執政的段祺瑞順應上海紳商等人的要求，將上海變為無駐軍之自治市，然而戰後造成江浙地區社會秩序的動盪，上海又因無駐軍而成為三不管地帶，官署此後均對各項活動採取放任態度，成為五卅之所以工人、民眾、學生等能夠遊行集會的一個背景。<sup>65</sup>

五卅慘案之發生雖始於二月山東青島日商與中國勞工之衝突，但隨後五月在青島，上海日商與勞工再起衝突，上海日商並殺死工人代表之一、中共積極工運份子顧正紅（1905-1925），乃激起時人民族主義之上升與對帝國主義之憤慨，此事後中共很快地開始（以中國國民黨上海黨部之名義）介入並主導五卅的抗爭運動，進行大規模對帝國主義的抗爭，迄於十月方才結束。<sup>66</sup>

在五卅運動之後，中國民族主義更為壯大，各黨派得益於此，均有大幅度的成長。<sup>67</sup>國家主義團體亦在五卅之後大為成長。<sup>68</sup>在國家主義團體大為成長的此時，加上許多成員提出公開組織之必要，最終在十月十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乃正式宣布成立，吸收各地青年團體，並建立三重組織：第一重為不公

<sup>63</sup> 張少鵬，〈北伐前後曾琦與國民黨的關係〉，《江漢論壇》6期（武漢，2005），頁111。

<sup>64</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129。

<sup>65</sup> 馮筱才，〈江浙戰爭與民初國內政局之轉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期（杭州，2004），頁58-59。

<sup>66</sup> 唐寶林，〈陳獨秀大傳〉，頁279-292。

<sup>67</sup>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期（台北，2002），頁76。

<sup>68</sup> 醒獅週報自五卅之後，每當有國家主義團體成立（如光華社、少年中國自強會等），均會在特載一欄刊登「風起雲湧之國家主義」並附上成立該團體之宣言。而陳雲卿對於國家主義團體的出現時間等做出了一簡明清楚的表格，參見其〈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146-152。



開的黨，第二重為公開活動的團，第三重則為各外圍組織，並將中央黨部自巴黎遷回上海，從事各種組織活動，中國青年黨開始壯大。<sup>69</sup>同時又與各團體成立「國家主義聯合會」，共同從事國家主義之宣傳等諸多行動事宜，並藉此擴大勢力至各地。<sup>70</sup>

而在中國青年黨擴大據點中，實以北方最為重要。不僅因隨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國青年黨與其他國家主義派的活動在本來活躍的華中、華南受限，因此乃以北方為主要活動地點。而是當時國家主義派在京滬一帶仍為多數，因此在1925年十月，爆發了一場「聯俄」與「反俄」之論戰，中國青年黨亦參與其中，且感到此論戰有姍姍來遲之感。在論戰中，中國青年黨的理論、政綱之較其他國家主義者程度完備，也為其在北方擴大其成員與外圍組織有極大關聯性。<sup>71</sup>

聯俄與仇俄之爭，乃是發生於北京之《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時事新報》及其副刊《學燈》上的一場論戰，實為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延續在五卅之間言論戰爭參與者包括梁啟超、丁文江（1887-1936）、張奚若（1889-1973）、無政府主義者秦抱樸、青年黨人李璜、常燕生（1898-1947）等諸多學人。不過在論戰中極具特色的是，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均與國家主義者立場相近，共同對抗當時主張親俄、聯俄者。此一論戰始於陳啟修（1886-1960）發表在《晨報副刊》發表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為起始點，雙方爭執於何為「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與「白色帝國主義」之差別為何、蘇聯經濟政策上與資本主義國家有何分別、「親俄」與「聯俄」的差異、究竟應該依賴外力解決問題還是自立自強、內政與外交是否緊密相關等諸多問題上。當時多數人均認為蘇聯具有帝國主義之傾向，此為諸多論者否定其世界主義之

<sup>69</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 159-163。

<sup>70</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 170-186。

<sup>71</sup> 敖光旭，〈國家主義與“聯俄與仇俄”之爭——五卅運動中北方知識界對俄態度之解析（下）〉，《社會科學研究》1期（成都，2008），頁 149-151。

可能，而成為其提倡國家主義之依據。莫斯科對於五卅運動以後轉向在國內軍閥和國共兩黨之間模稜兩可的態度，以及應英日兩國之要求，處死在俄聲援五卅之中國僑民，更使得人們更加確信此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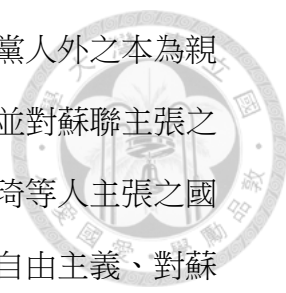
但在與歐美列強比較之下，雖然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無異，例如秦抱樸曾赴蘇俄觀察，認為列寧實施之政策實與帝國主義國家無異，而國家主義者則徹底認為蘇聯此赤色帝國主義則是較之以往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更具危險性，論戰中多數人仍然認為蘇聯可能是較友善的國家，外交上與之合作則可，但不可感情上一面倒向蘇聯。

雖然在實務上漸趨實際，然而中國知識界的壁壘逐漸築起，各種意識型態的衝突、民族主義的高漲等已經深深地影響知識界的各種走向，從而反思過去嚮往世界主義的態度，為國家主義的發展鋪下了土壤，而青年黨的綱領如「內不妥協、外不親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以國內「神聖聯合」反對共產主義「階級革命」，以專對英日之策略反對「打倒帝國主義」之世界革命又剛好與非親俄派的立場相近，從而得到廣泛的認同，為青年黨與國家主義的發展打下極好的基礎。<sup>72</sup>青年黨當時在北京的領導者李璜，同時也參與了這場論爭，又因為反俄援僑大會與共產黨有所衝突，此舉反而壯大了國家主義的聲勢，吸引更多參與，從而擴大了青年黨在北方的勢力與基礎。<sup>73</sup>

簡而言之，中國因 1919 年巴黎和會之失望，而爆發具有強烈愛國主義之五四運動，對西方列強的失望使得人們轉向表面上對華友善之蘇聯。然蘇聯之對

<sup>72</sup> 關於論戰之內文，參見章進編，《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新北市：文海，1982。論戰的分析則參見王永珠，〈聯俄與仇俄：1920 年代中國知識界對蘇俄態度的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85-150；敖光旭，〈國家主義與“聯俄與仇俄”之爭——五卅運動中北方知識界對俄態度之解析（上）〉，《社會科學研究》6 期（成都，2007），頁 139-149、〈國家主義與“聯俄與仇俄”之爭——五卅運動中北方知識界對俄態度之解析（下）〉，頁 140-152。王永珠之碩論為開啟此一研究的風氣，然而內文對史料諸多解讀錯誤，敖光旭在其基礎上重新進行了整理與較為完備的分析與討論。胡秋原雖然認為此一論爭影響力於全國而言並不大，然筆者認為此對國家主義派在北方勢力範圍的拓展則有不小的功勞，胡秋原的說法參見其《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頁 48-49。

<sup>73</sup>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一九二三～一九二九）〉，頁 182-184；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 上卷》，頁 194-200。



華態度與外交隨蘇聯現實處境之變化而變化，因此使得除共產黨人外之本為親俄的中國人大多數對蘇俄感到憤怒，進而對蘇聯有更深的認識，並對蘇聯主張之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產生幻滅。此一環境下，使得甫歸國的曾琦等人主張之國家主義有機可趁，進而填補了處於弱國環境下的中國人對西方自由主義、對蘇聯社會主義幻滅之意識型態真空，並在接下來引起民族主義狂飆之五卅運動中得以大力發展，更在聯俄與仇俄論戰中進一步更加吸引了許多本來較持中間立場、務實態度的非親俄派、反共產派以及本已信仰國家主義但未加入青年黨的人，進一步壯大了青年黨在北方的勢力。

過往的研究如敖光旭等雖已指出，在這段中蘇外交的糾葛下，中國人曾經將革命情感與交融為一體，對蘇聯的無限嚮往，卻因為蘇聯現實之外交而幻滅。但並未指出的是，在這一由幻滅的過程中，中國人仍然尋求一條新的出路，這就為甫歸國之青年黨鋪下了發展的土壤。而其後之軍閥內戰、五卅慘案，更使第三條路的國家主義派有著不小的發展，而在北京聯俄與仇俄之爭，敖光旭雖已經指出青年黨在國家主義者中，理論和政綱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但仍未再深入探究此一論爭對青年黨日後發展的重要性，實為遺憾。本節即意圖彌補此一空白。

## 小結

民國 16 年（1927）梁啟超在其家書中寫道：「我看現在國內各黨派中，惟有“國家主義青年團”一派最有希望……。」對當時的中國各黨派的看法，並特別對國家主義派寄予厚望。<sup>74</sup>梁氏對於國共兩黨要實行一黨專政向來反感，但他同時亦觀察國內現有勢力，看見的是當時作為第三條路的國家主義團體的活力。然而在當時，隨著國民黨與共產黨實行北伐、與吳佩孚等軍閥作戰時，

---

<sup>74</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594。

國共雙方的黨員隨著國民革命軍的腳步前進到各個城市鄉鎮，對於國家主義團體在各地的據點進行掃蕩，至國共雙方分裂、國民黨進行清黨時，青年黨與其他國家主義團體亦遭列入清單，故當時在上海的曾琦等人曾被捕入獄。<sup>75</sup>隨後隨著國民革命軍兵之所向，青年黨與其他國家主義團體在各地的據點也遭到國民黨拔除，散落各地之共產黨與軍閥亦同與青年黨對抗，國家主義派的勢力大為限縮。<sup>76</sup>

回顧自國家主義派興起與誕生的過程之中，可以看見國家主義派乃是在中國面臨內外交迫窘境下之產物，而其中中國青年黨又為國家主義派之翹楚。自五四引起的愛國主義熱潮下，他們與許多當時志同道合之友朋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從事各種社會改造的嘗試。然而各種社會改革的嘗試之失敗，加之俄國十月革命後引起的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的熱潮，在此一背景下，少中部分成員參與共產黨從事政治改革，最終與少中內部信仰國家主義之成員分裂，而成視之如寇讎的敵手，不論在勤工儉學時期之法國，還是在國內均產生激烈論戰，乃至流血衝突。因此曾琦等人乃在巴黎成立青年黨，並隨著旅法共產黨人腳步追擊回國，隨後成立醒獅社以及國家主義青年團、國家主義聯合會等組織，與國內國家主義團體聯手對抗共產黨。

在曾琦等人歸國前，中蘇交涉中蘇聯的利己態度已導致國內氣氛對於蘇聯產生反感，並對其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有所破滅，然而當時國共已經決定合作，國民黨的舉動無法與共產黨脫鉤，卻又陷入民族主義輿論譴責的困境。此一情況下，各種因民族主義而起之海內外國家主義團體逐漸成長起來。曾琦等人於當時歸國，創辦《醒獅週報》並提倡較有系統之國家主義，實際上具有填補意識型態真空的功效。而隨後爆發之五卅運動，更是促使了大量國家主義團體的發展，也因此曾琦等人與孤軍社等國家主義團體乃創立國家主義青年團與

<sup>75</sup> 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頁 133-134。

<sup>76</sup> 陳啟天，〈近代中國國家主義運動小史〉，原載民國十七年之《醒獅週報》第一九一期，轉引自冬青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台北：冬青出版社，1975），頁 49-51。

國家主義聯合會，作為尚未對外公佈之青年黨的對外活動機構，從事建立支部、吸收外圍團體的活動。

在五卅運動結束後，該年十月則又在北京出現一場「聯俄」與「仇俄」之間的論爭，而青年黨人亦加入其中。當時北方之國家主義份子較多，而青年黨之理論已較之前更為完備，因此在最後脫穎而出，成為北方國家主義團體的領導者，也使得國家主義更加深入各地。此也為日後國共北伐，青年黨在華中華南的力量受到嚴重打擊時，還能存有日後活動的重要根據地。

中國青年黨雖成立於法國，但因當時其領導人歸國時間正逢蘇聯在華形象大幅滑落之影響，以及其後五卅慘案、聯俄反俄之爭等有利環境，加之中國民族主義因帝國主義國家之壓迫、北洋軍閥之殘酷對待，使得中國人尋求除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以外的意識型態。青年黨較完備之國家主義意識型態則進入其中，並獲得了不少支持者，成為時人所認知的第三條革新中國的道路。

### 第三章 青年黨二零年代的國家主義



#### 前言

面對民國建立以後的各種亂局，曾琦曾言：

今日中國之國事，曷為擾攘十餘年而不克底於定乎？論者探究其源，亦嘗各有所見。或曰法治之未立也；或曰教育之未興也；或曰軍隊之未裁也。茲數說者，皆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實則未得其根本原因之所在。所謂根本原因為何？一言以蔽之曰，無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而已，夫一國之有中心思想，則國是所由而定者也；一國之有中心人物，則國民所望而趨者也。<sup>1</sup>

簡而言之，曾琦認為中國之所以紛亂不已，並不是制度層面的問題，而是因為缺乏「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那麼中國在走過改革與革命之後，儘管政體轉變為現代的民主共和政體，但是「顧自人民國以後，國人乃不復有明瞭之中心思想與確信之中心人物。」<sup>2</sup>曾琦正是觀察到了此一現象：

夫一國無中心之思想，則眾說紛紜，而莫衷一是；一國無中心之人物，則民心惶惑，靡所適從。古今中外，罔不如是。證諸今日，其例尤然。國事之壞，豈突然哉？今欲求國亂之底定，期國基之鞏固，惟有先努力於中心思想之製造。有中心思想，然後中心人物可得而出。<sup>3</sup>

中國思想體系中以儒家居於正統的地位，而儒家過去正是以天子制度作為摺合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秩序與價值。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後，普世王權（universal kingship）隨著清朝滅亡而瓦解，導致了長期居於正統地位的儒家思

<sup>1</sup> 曾琦，〈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曾琦先生文集（上）》，頁 78。

<sup>2</sup> 曾琦，〈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曾琦先生文集（上）》，頁 80。

<sup>3</sup> 曾琦，〈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曾琦先生文集（上）》，頁 80。

想，及其所維繫的文化、綱常、政治、社會等各種秩序走向崩潰，使得中國陷入了「意識形態真空」的危機。<sup>4</sup>

因此中國之所以在民國後陷入一片混亂，並不是這些政治、教育等各種制度層面上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內心仍然處於失序，卻又沒有思想指引以及人們帶領他們的困境。因此，當時中國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如同過往儒家一般強勢的「意識形態」來填補，作為指引的方向。而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內部作為西方思潮的試驗場，不僅有諸多西方思潮為解決此一問題而受到大量歡迎，曾琦等人也提出一套新方案，也就是「國家主義」，作為與諸多思潮（特別是共產主義）對抗、解救中國的意識形態，以引發「中心人物」來拯救中國。

國家主義，是中國青年黨行動與宣傳的思想基礎。在青年黨人眼中，是十九世紀以降世界的「主要思潮」，更是最適合於中國的「中心思想」。<sup>5</sup>其誕生於歐陸，具有堅強的歷史、思想與社會根基，而十九世紀以降世界各地的歷史發展，則更證實了國家主義的可行性、先進性與必然性。是故，當青年黨人分析了中國現實後，發現與「共產主義」相較，國家主義更適合於中國當下的現實，更使中國能最正確地走在歷史發展的必然道路上。<sup>6</sup>

因此，在中國出現空前的取向危機、新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出現的這個時代，沈松僑所言之民族主義「操演期」的時代，林毓生所言之「意識形態真空」的一九二零年代，中國青年黨在政黨發展上，不僅與國共鼎足三分，而在意識形態的論戰、吸收成員上更是與共產黨成為死敵。<sup>7</sup>正如同林毓生

<sup>4</sup>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收於《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下冊）》，頁 785-863。

<sup>5</sup> 曾琦，〈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收於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頁 78-81

<sup>6</sup> 曾琦，〈國家主義者之四大論據〉，《曾琦先生文集（上）》，頁 387-388；常燕生，〈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頁 1-40。

<sup>7</sup>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頁 37-60；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收於《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下冊）》（臺北：中研院人社中心，2014），頁 558、566-574；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頁 785-863；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收於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66-101。

引用紀爾茲之言所指出的：「當一個社會發生了政治與社會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出現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sup>8</sup>青年黨在此時能有此成就，均拜國家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所賜。<sup>9</sup>

那麼國家主義的內涵為何？它的歷史是什麼？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又怎麼將國家主義應用於中國？目的是什麼？本章將處理上述議題。

## 第一節 國家主義的內涵

「夫國家主義思潮，乃緣國家本體而發生。世界上先有國家而後有國家主義，苟國家組織存在之理由一日不廢，則國家主義之思潮一日不能遏止，此徵諸古今中外之歷史而可信者。」<sup>10</sup>對青年黨提倡的國家主義而言，「國家」在其思想中是最重要的。而這個國家的意涵，是一個「對內統一、對外獨立」的

<sup>8</sup>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頁 790。

<sup>9</sup> 本文關於意識形態的定義，採用林毓生的觀點：「意識形態是對人和社會、及與人和社會有關的宇宙的、認知的與道德的信念的**通盤**形態。它與『看法』、『教義』不同。不過，這些不同往往是**程度**的不同。意識形態與看法、教義之不同既然是程度上的不同，那麼，意識形態本身也可根據其系統性、封閉性、與依賴『奇理斯瑪』（charismatic）型人物的領導的程度而區分為弱勢（溫和）和與強勢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特色是：它對與它有關的各種事物都有高度而明顯的「系統性」意見（此處『系統性』並不必蘊含『正確性』，強勢意識形態的系統性則是僵化的系統性）；它往往要把系統中的其它成分統合於一個或幾個顯著的價值（如平等、解救、種族純粹性等）之下。就這樣，意識形態的強弱往往呈現在對外界封閉的強弱。極強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拒絕自我革新，另一方面則要求追隨者絕對服從，並使追隨者覺得絕對服從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現。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播則要靠『奇理斯瑪』型人物的出現與領導。

自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從原先聽天由命的心態轉而認為世界的命運可運用人類自身的力量加以改進，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即各式各樣的主義）遂蓬勃地崛起。因為任何一個要求進步——尤其是一個要以革命為進步手段——的運動（此處『革命』二字，不適僅只政治革命而言），必須具有凝聚群眾的力量，而由『奇理斯瑪』型人物倡導的強勢意識形態，由於它的系統性、連貫性、封閉性、與道德情操的訴求，所以能賦予人們確定的方向即據以奮鬥成功以後美好的遠景，於是自然是凝聚群眾所不可或缺的了。但，強勢意識形態有高度的自我封閉性（越強的意識形態，其自我封閉性越高），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甚至與常識隔絕。因此受到強度特高的意識形態支持的革命，便往往犯了重大的錯誤，帶來了重大的災難。這是為了促使進步而形成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弔詭（paradox）。」參見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頁 844-845。

<sup>10</sup> 曾琦，〈國家主義者之四大論據〉，《曾琦先生全集（上）》，頁 386。



強大主權國家，是一個擺脫過去不平等條約、能夠維護國民權益的國家。然而青年黨人眼中所見的，卻是個「內不統一、外不獨立」，權益被迫交予列強，且帝國主義國家仍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侵略的中國，而國人不是對國難毫無感覺，就是盲從各種不適合於中國的主義，對此他們有極深的憂慮。<sup>11</sup>

因此，他們力圖想要改造的方案，乃是承繼第一章所指出的民族主義思想，並經各種歐陸國家主義思想改造後的一套意識形態與解決方案。

林毓生指出：

意識形態簡而言之，其特性有：（1）它根據自己的前提在其內部發展出一套自圓其說的「系統性論述」（2）論述的系統性，則依靠對於可能對它挑戰的「事」與「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種封閉性的程度，決定意識形態的強勢或弱勢的程度，越封閉的意識形態，越強勢。另外，意識形態的強度與它所對付的危機的嚴重性的程度往往成正比：危機愈嚴重，愈需要意識形態的系統化來對付之。為了要維持其「系統性」於不墜，意識形態便愈需要對其可的挑戰採取封閉的態度。<sup>12</sup>

國家主義作為一套完善的意識形態，因此有必要將其建構要素，進行系統性的梳理與說明。本節將處理這一問題。

## 一、國家

在面對以超國界、主張以「階級」作為政治區分的共產主義者，以及主張「政府為惡」、「泯滅國界」的無政府主義者，為了回應他們對於「國家」的質疑，爭取更多人信仰，國家主義者運用了諸多歷史、哲學、社會學、生物學等各種當時流行的學說，捍衛「國家」存在之必要性。從這一方面而言，為了證明國家存在之必然性，國家主義者勢必要說明，「國家」作為統合領土內諸多人民的政治共同體，是緣何而生？為又怎麼誕生的？而又為何持續存在？

<sup>11</sup> 本社同人，〈本報出版宣言〉，《醒獅週報》第1期，頁3-4。

<sup>12</sup>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頁790-791。

曾琦以「實利說 (Utilitarianism)」作為國家主義解釋國家誕生與起源的哲學基礎，指出：

國家發生於實際上的利益……以為人類因智識發達之結果，知有國一家之力，因而組成國家，在國家組織之下，有政府以扶助人民，有法律以保障人民，較之為成國家之前之混亂狀態，其利害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故國家實為人類生活必需之物。<sup>13</sup>

由於在國家誕生之前，人們陷於互相為敵的自然狀態中，不僅人與人之間衝突甚多，加上自然環境險惡，因此生活環境的壓力使人處於困厄之境。隨著文明的演化，社會因之而生，然而人群之間的相處日益複雜，因此誕生國家來調解人與人、人群與人群之間所日益複雜的關係，以及藉此透過集體的強制力量來克服各種生存上的困境。故國家是「為人民謀生存上的便利而團結。」<sup>14</sup>且是「是出於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不得不產生的」產物。<sup>15</sup>

以歷史事實而言，曾琦、常乃惠、余家菊等人均認為，國家乃是由人群逐漸集結，產生出同類意識和感情，逐步演化為部落社會、城邦，最終誕生了國家。<sup>16</sup>陳啟天更加以補充，在生存競爭的情形下，國家也是逐步演化出來、共同隸屬於一個政治權力底下的、最佳的「生存競爭單位」。<sup>17</sup>是故簡而言之，國家之誕生，乃是由於人們群居，並為了因應生活所需，遂從部落、城邦等小型共同體，逐步擴大而演變出國家。

而原始社會的性質，李璜則運用當時社會學者對北美、澳洲初民社會的研究，指出原始社會並非如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的經濟唯物觀」所言，是經濟物質決定一切。人類最原始的社會群體為「圖騰社會」，此時的部落是一個家族、宗教與政治合而為一的社會團體，並有著認為大家系出同源的圖騰宗教

<sup>13</sup> 曾琦，〈國家主義之學理的依據〉，《曾琦先生全集（上）》，頁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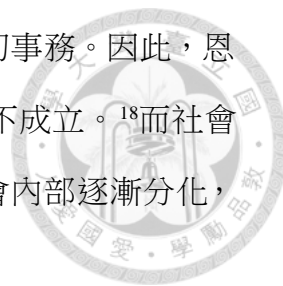
<sup>14</sup> 曾琦，〈國家主義之學理的依據〉，頁 406。

<sup>15</sup> 陳啟天，〈國家主義的歷史根據〉，收於《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頁 163。

<sup>16</sup> 曾琦，〈國家主義之學理的依據〉，頁 399；常乃惠，〈國家主義之再生〉，《醒獅週報》第 135 期，頁 11；余家菊，〈國家主義概論〉（北京：新國家雜誌社，1927），24。

<sup>17</sup> 陳啟天，〈國家主義的科學根據〉，《醒獅週報》第 152-157 期，頁 8。

信仰，而這個信仰，則決定了團體生活如政治、經濟等等一切事務。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做的推論並不成立。<sup>18</sup>而社會自此以後就一直籠罩於個人，亦即「社會先於個人」，儘管社會內部逐漸分化，政治社會也從部落、市府演變至國家也都如此。<sup>19</sup>



在闡述國家主義者對國家起源的看法後，應該說明國家主義者如何思考國家主義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一國之中，國家主義是如何誕生的？其精神為何？

李璜引用法國辭典，簡要地說明了這個意思：「國家主義乃是對於其所屬的國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願（*La préférence déterminée pour ce qui est proper à la nation à laquelle elle appartient*）。」<sup>20</sup>他指出，對於國家，人民生活於其中，基於天性，加上受到社會分工互助、先人創造出來的文明等影響，因此就會產生對於家、社會以至於國家等共同體的愛，這是一種天性使然的、主動的愛，而非當時社會學者所言是被動的、因時代潮流與同時代人都有而被動產生的愛。同時，隨著歷史演進，各國的習俗逐漸演變，具體化為該國的制度、文化、文物乃至於精神信仰，進而成為一國國民的結晶，也就是該國的精神與靈魂，國民只要一出生就會受其影響。因此這個國家，國民皆稱其為「祖國」。因此「祖國一旦失了面子，國民精神便要立刻不安起來；祖國亡了，國民便要喪魂失魄，無所依歸，萬劫千磨，都非得國命重光，國魂恢復而他的精神纔得安寧。」這也代表「國民的精神自有一致的所在。本了這一致的精神，大家始有了共同的希望，本這種共同的希望，大家便有了共同的責任。這個責任便是：共同保守祖宗之業而光大之。」<sup>21</sup>這也就說明了，為何人們會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起而奮戰的原因，歷史上拿破崙壓迫各國，各國人民起而反抗則是鐵證。國家主義的精神，便在於人類天性對於國家的愛，因此而會去保衛國家。

陳啟天更以心理學指出，人擁有「恐懼」與「愛好」的本能，人們愛國即

<sup>18</sup> 李璜，〈國家主義答客難〉，《醒獅週報》第 17 號，頁 76-77。

<sup>19</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 2 號，頁 10-11。

<sup>20</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 1 號，頁 6。

<sup>21</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10-11。

基於此天性，儘管和平時可能不顯現、甚至反對愛國，但當國家受到危難時，恐懼國家滅亡的心理將會引使人們本能地去愛國。而這種愛國的本能最終成為習慣時，就會成為國家主義。那麼本能如何演變成習慣？一來是透過一次次外來的危機，不斷地激發本能，形成愛國運動，透過政治社會化的方式深入人心，最終會演成變成習慣；其二是透過充滿愛國刺激的學校、家庭和社會教育，長期刺激人的愛國本能，最終形成習慣，當遇到事情就會本能反應，這也是國家主義者為何強調教育，因教育能將國家主義深入人心。<sup>22</sup>

從「愛國」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國家主義視「愛國」為國家主義的根基，是國家主義者認定「最高的國民道德」，而其衡量基礎在於「犧牲精神」。<sup>23</sup>換而言之，即是推己及人，「國民全體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國民全體的快樂，就是我們的快樂。」<sup>24</sup>了解國家、同胞的苦難，受到刺激，為國付出，正是愛國。這正是國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正是基於此種情感，說明國家存在的必然性，國家主義者反對所有主張世界主義的學說：「國家主義乃是反乎國際主義而言（ils' oppose à l'internationalisme）。」<sup>25</sup>同時也仇視反對國家存在的學說：「國家主義乃是疾視一切所有不以國家的舊信仰為根本的學說（Qui consiérecomme mauvais toite-doctrine don' t le fondement n' est pas la tradition nationale）。」<sup>26</sup>這些學說，例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是要消滅國家的學說，在國家主義者眼中，是會將列強引入中國、讓中國被列強瓜分滅亡的學說。這也是為何國家主義者將不少心力放在對付這些學說，特別是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受到第三國際背後的蘇俄指揮，要將中國赤化，若成功，則成為蘇俄屬國，赤化若失敗，則成為蘇俄的替罪羔羊，讓列強注意力放在中國，引發紅白帝國主義在中國的

<sup>22</sup> 陳啟天，〈國家主義的科學根據〉，頁 9。

<sup>23</sup> 胡國偉，〈國家主義者的道德觀〉，《醒獅週報》第 33 號，頁 161-162。

<sup>24</sup> 王君實，〈一個國家主義者的人生觀〉，《醒獅週報》第 45 號，頁 234。

<sup>25</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 1 號，頁 6。

<sup>26</sup> 同上註。

戰爭，使列強無心顧及蘇聯。<sup>27</sup>為了保衛國家，國家主義者必然大力反共，也必然成為共產主義者所要打擊的對象。

## 二、國性<sup>28</sup>

「國性」(La nationalité; nationality)是國家主義論述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要點，這不僅是因為國家主義者主張每個「國家」均有其特有之國性，更「因為集產主義的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本他們的經濟史觀，無政府主義的蒲魯東和克魯泡特金本他們調劑生產力的說法，都在在否認這個『國性』的存在。」<sup>29</sup>故國家主義者更得證明其存在，為其學說張本，以迎戰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國家主義者為國性下一簡略定義：「所謂國性，乃是一民族共有的性質，由經驗和習慣陶冶而成。」<sup>30</sup>然而我們必須探討國性是怎麼誕生的？而國性又有哪些內涵？導致其在國家主義學說中，何以具有重要的地位？對於這些問題作出解釋，則可以將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等主張，作出區別。

那麼，國性是如何產生的呢？李璜指出「被壓迫的國家便由於這種境地生出「國性」(La nationalité)的問題。」<sup>31</sup>余家菊則說「國魂者，國民先天的特性又益以後天的遭遇而型成之國民氣度，國民情思也。」<sup>32</sup>而陳啟天歸納出民族、地理、歷史、宗教、政治、經濟與教育，這七點在國性誕生的時候，深刻地影響了國性所具有的特徵。<sup>33</sup>因此，李璜將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征服歐洲後，歐洲各國反抗的歷史，作為國性的表現、國家主義誕生的起點時，即明白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但是這個國家意識，國性問題的顯著，一半雖由於拿破崙壓迫，一半還與當時文化的程度與交通的發達有關係，然後方才真正認識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

<sup>27</sup> 曾琦，〈中俄問題弁言〉，《醒獅週報》第 40 號，頁 203；叔耘，〈蘇俄國際與第三國際〉，《醒獅週報》第 92 號，頁 533-535。

<sup>28</sup> 他們在文章中，也使用國民性、國魂等名，筆者以下統一使用「國性」一詞。

<sup>29</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6。

<sup>30</sup> 曾琦，〈國家主義之學理的依據〉，頁 404。

<sup>31</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1-2。

<sup>32</sup> 余家菊，〈國魂篇〉，《醒獅週報》第 47 號，頁 246-247。

<sup>33</sup> 陳啟天，〈國家主義的科學根據〉，《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頁 154-155。

此之不能受制。……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諸文明國家既已有了明瞭的國家的這個社會生活，而交通發達，一國內的人接觸頻繁，而與他國人接觸亦頻繁，因此既十分認識了本國人，更漸漸認識了別國人。於是黑格爾所謂的一國國民共有的「志願的統系」(Le système de volonté)便自然發生。這種「志願的統系」既成了一國國民的「智識的本體」(l' essence intelligible)，所以萬萬受不得外國的無理壓迫，而要全國共起，以謀抵抗。因為有了這回抵抗，志願愈堅，團結愈緊。因此，拿破侖之壓迫便恰恰足以助成國性的伸張，民族的獨立。隨著拿破侖之敗，「國性」的要求便在歷史事實上大大發展起來……既然這種主張深合乎事理民情，而又有了德意等國的大成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勢不可遏，傳遍全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隨之而起。十九世紀中間，以國家主義相號召相集合的政黨，便不斷的成立於各弱小國家中……。<sup>34</sup>

國性的展現，在於交通發達，各國彼此接觸之後，始明彼此之不同；而在外力的壓迫之下，國性則更加發達，被壓迫者不僅明白其與壓迫者之不同，更因此具有團結一致的國家意識，以及抵抗外國的國家主義。拿破崙的失敗、德義等國的成功，更使國家主義盛行於世界，成為歷史最主要之潮流。

那麼國性的內容為何？李璜在〈釋國家主義〉一文中，對於國性作出了詳盡的解釋：

「國性」乃是國家的人格。每個國家從其靜的 (Statique)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種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自其動的 (Dynamique)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特殊，信仰之特殊。於是每個國家所有的國民其生活的志願便不能進同於其他一個國家的國民。本著這個特殊的生活志願，便發現特殊的生活狀態。因此由內而外，皆認識得一個羣體的自我 (Le moi collectif)，這便是國家人格的構成與表現。每個國民在性情與行為上皆具有其國的國格。……

<sup>34</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4-5。

未有一國國民的人格不表現出他的特別地樣範；明白言之，這種每個國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這種國家人格的縮小便是每個國民的人格。所以國家人格受了損失的時候，國民人格便立刻感覺得受了損失。全靠這小己與大羣的情感意志相黏著、相影響之力，便成功國家的意識（La conscience nationale）和國民的靈魂（âmes du peuple）。<sup>35</sup>

各國的國性，誕生自各國獨特的客觀環境因素與變動之歷史文化因素兩者的交互作用，因此各國國性自古即彼此不同。而由於國家先於個人而存在，國性在人誕生之後，就已開始深刻地影響個人，因此個人本身自幼年到老年，始終即會呈現出該國國性，個人因此對該國產生歸屬感與愛。同時因個人又屬於國家，所以當國家／個人受到他國的壓迫、侮辱時，就如同自身受到壓迫，這種國家與個人合而為一的同一感，即是國家意識。

接著，李璜引用法國學者德罷朗特（De Barante）的研究，深入指出影響「國性」最深刻的，乃是各國過去共同的歷史時間感：

一個民族的「國性」的成立是基於他的過去的回憶的；這種回憶並且是全民族，無分階級，都一樣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刺激，便同時一齊感覺不安；一個國家被了侵凌而全國國民都要起來抵抗，便全靠這個共同回憶而發的情感，絕不是只靠利益的觀念。<sup>36</sup>

這種歷史時間感，正是透過共有的回憶，而將所有人形塑為共同的國民，因此使之具有極強的情感，這種情感是全國性的，是超過私人、階級、民族等利益糾葛的。「國民須有共同的心，須有共同的精神。」正是國性的呈現。<sup>37</sup>而表現形式，即是「祖國超於一切」的「神聖聯合」。<sup>38</sup>

因此，「國性」的外在乃是一種經由生活、組織、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塑

<sup>35</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3。

<sup>36</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9。

<sup>37</sup> 余家菊，〈國家主義釋疑〉，《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頁 93。

<sup>38</sup> 曾琦，〈神聖聯合與一致對外〉，《曾琦先生全集（上）》，頁 120-121。

出來的國家靈魂與國民生活模式，而國性的內在則是這個國家共同的歷史回憶，合之則形塑出一個國家的靈魂，與國民的共有特性。而這個共有的「特性」，並非如同專制政體般要求全國人民從精神到外在均整齊劃一，反而是在這一共有的特性下，使人民能夠自我成長，使國家能夠因此強大。<sup>39</sup>

在這個基礎上，李劍華進一步延伸，指出國性之所以各國不同者，有先天體質與氣質（心理）、後天社會與自然（地理環境）的作用。<sup>40</sup>何炳松也認為，歷史與文化的教育，乃是增強國性的重要因素。<sup>41</sup>而王化周更進一步完善了國性的相關理論，他將國性與民族性區分開來，指出各民族之間若有相似的民族性，則容易團結在一起，並透過文化、性質、歷史、環境等進而團結成一個國家，然而若是民族性完全不同的民族結合起來，所誕生的國家將會因為共同性過低，而導致國家與國性無法成長，而陷入衰弱。因此國性作為國民共同的心理，有著使國民團結的功用，使人們信仰自己是同一個國家，是國家盛衰的關鍵。他更指出，國性雖然會隨著血緣是一脈繼承的，但卻也是會變動的，外在的環境會影響國性的變化取向，而教育則是用以告知國民，國性特殊價值則是培育國性的手段。此外，他更提出了國性的五週期概念，以此解釋與判斷各國國性的變化與形態：首先是國性無定見無目的、沒有方向的「醞釀時期」，具體例子即遊牧民族；其次是「軟性時期」，具有一定型態但毛羽未豐，此一階段的國民極具情感和感受力，革命情緒較為容易觸發，且敵視傳統，喜好引入外來思想，如中國與波蘭；第三是壯年的「中性時期」，不僅具備國民特質，理性也己能控制前一時期過於豐沛的情感，對於國家固有文明與外來思想，則均能重新給予評價，依據此不疾不徐地向前發展，如英、美、日；再次是走入僵化的「硬性時期」，國性和國民思想均囚於過去光輝的歷史牢籠之中，對於新環境也難以適應，偶爾雖能恢復一點活力，但也僅是轉瞬即逝，很快又會變

<sup>39</sup> 余家菊，〈國家主義釋疑〉，頁 91-93。

<sup>40</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醒獅週報》第 61 號，頁 340。

<sup>41</sup> 何炳松，〈現代西洋國家主義運動史略〉，《醒獅週報》第 86 號，頁 496。



回本來的樣子，如法國與義大利；最後是國性完全失去活力、毫無生命力可言，走向滅亡的「衰老期」，如歷史上諸多滅亡的國家。<sup>42</sup>

總結上述，「國性」不僅是國家對外呈現的人格，更可謂國家主義核心「國家」之靈魂。體現國性者，乃是政治共同體「國家」的成員「國民」，而不是各個「民族」。各國的國性誕生於各國的特殊環境與融合，而在各國往來頻繁後顯現出來，隨著了解各國彼此之間的不同變得更加明顯，並在受到壓迫時茁壯成長，更可透過教育深化國性，使全國國民具有同一感，這就是國家主義的核心：「國性」。同時，國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變動的，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根據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表現，人們可以依照表現進行判斷。而國性在面對到壓迫時，將驅使國民超越一切利益，團結起來對抗外敵，這也就是國家主義者所說的：「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訴求。」<sup>43</sup>

### 三、國家主義的歷史

「國家主義是個近代的產物，然而在上古時代不自覺的國家主義也不是沒有。」<sup>44</sup>國家主義者在敘述國家主義的歷史時，將國家主義的誕生時間點歸因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受到各國的壓迫首先誕生，而隨後拿破崙席捲並壓迫全歐，國家主義也因此在全歐洲各地勃興，並隨後則傳播至世界各地。<sup>45</sup>

然而，國家主義的出現，法國大革命僅是將國家主義的火種點燃，早在古代，國家主義的種子就已經播下。常乃惠指出，各群人類因為出於同祖宗、居於同一環境、言語習慣都相同，因此產生「同類意識」，因而出現鬆散的組織「社會」或「民族」，隨著受到壓迫，感到有互相幫助、彼此之間親密關係之故，鬆散的「社會」或「民族」就會變成嚴密的組織「國家」，更感受到要維護團體，就必須愛護團體、甚至為團體犧牲的共同意識，國家與愛國的觀念，

<sup>42</sup> 化周，〈國民的特質與國家的運命〉，《醒獅週報》第 174 期，頁 4-10。

<sup>43</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 1 號，頁 6。

<sup>44</sup> 常乃惠，〈國家主義小史〉，《醒獅週報》第 134 期，頁 12。

<sup>45</sup> 李璜，〈釋國家主義〉，頁 5-6；何炳松，〈現代西洋國家主義運動史略〉，《醒獅週報》第 86 號，頁 497；常乃德，〈法蘭西大革命前後之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 136 期，頁 12-14；常乃德，〈拿破崙與西班牙德意志之國家主義運動〉，《醒獅週報》第 137 期，頁 6。

於此時一同出現、成長，這是國家主義的根源。<sup>46</sup>程中行亦指出，所屬團體因各地不同的環境，各自特殊的文化信仰因此誕生，逐漸演變成「國性」或「民族性」，而對自身特殊的「國性」所產生之自覺心與自尊心，也是國家主義與國家主義運動之所以誕生的緣故。<sup>47</sup>



然而隨著東西方世界性的大帝國的出現、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的興起，國家主義一時受挫。但東西方的分流也在此出現，中國由於文化同化力太強，使得各種民族均被同化，維持了一個大一統的帝國，然而歐洲卻因無法繼續大帝國的存在，如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均在此時開始產生新的國家主義意識，再受到文藝復興的影響後，埋下了走向國家主義的種子。<sup>48</sup>

文藝復興的開展使得西方能夠逐漸擺脫大一統宗教與封建制度的束縛，走向近代的國家。而這個時候有兩種形式的世俗國建立方式，一種是西班牙與法國式的，以君主由上而下去塑造國家，而國民較少參與；另一種則是英國與瑞士式的，以「全民政治」、國民參與的方式去形塑、建立國家。<sup>49</sup>

前述第一種模式，在後續還有瑞典、俄國與普魯士相繼師法，因此走上以君主由上而下來啟發人民國家主義的道路。但是相較於起初就是全民參與建國的英國、瑞士，前者仍然需要全民國家意識萌芽茁壯後的共同參與，才能使國家完成從古代的封建政治轉向近代國家的目標。而全民爭取自由、參與並干預國家，此潮流達到顛峰造極，並開創國家主義正式成立之紀元者，乃是法國大革命。「為著祖國」、「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等國家主義精神充分展現於此刻，不僅對內改革體制，因此成功地對抗歐洲各國聯軍的進攻與壓迫，更成功地啟發了全歐各族的注意與仿效：國家已建立者，就對內要求全民政治；國家尚未成立者，則多注意於對外解除強權壓迫以建國。但當時歐洲許多民族仍受雙重壓迫，通常都是兩者同時進行。此後，以全民政治為基礎的國家主義運

<sup>46</sup> 常乃惠，〈國家主義小史〉，《醒獅週報》第 134 期，頁 12-14。

<sup>47</sup> 程中行，〈國家主義之歷史觀序言〉，《醒獅週報》第 38 號，頁 191。

<sup>48</sup> 常乃惠，〈國家主義之再生〉，頁 11-12。

<sup>49</sup> 常乃惠，〈文藝復興與各國民族的覺醒〉，《醒獅週報》第 135 期，頁 13-14。

動，在歐洲蓬勃發展。<sup>50</sup>

自十九世紀中葉，國家主義運動更成為世界潮流，這一切均導因於拿破崙。拿破崙對歐洲的壓迫，促進了歐洲各國國家主義及其團體的發展與興起，並使其倒台，西班牙和德國更藉此擺脫法國的統治。其中德國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更從世界主義倒向國家主義，並大力鼓吹，使德國人大量吸收國家主義，強力推進了德國的統一運動，使德國得以統一。<sup>51</sup>

而儘管這段期間有壓制國家主義的神聖同盟、維也納會議等事，然而國家主義運動卻越演越烈。拉丁美洲各國、希臘、波蘭、比利時、義大利等均風起雲湧，其中以義大利尤為激烈，馬志尼的「少年義大利」國家主義運動，奠基於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全民政治的主張，更強調「統一和獨立」，並對抗當時神聖同盟的帝國主義入侵。這股力量最終使義大利統一，少年義大利的精神更因此傳遍世界，各地群起效尤。<sup>52</sup>

而隨著歐人與其他地方人群的接觸，使得國家主義精神也傳入各地。黃種人的國家主義運動也蓬勃發展：匈牙利與奧地利的鬥爭，使其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日本也因國家主義運動而躍為世界強權之一；土耳其更成為世界典範，信仰國家主義的土耳其青年黨遍布土耳其，出身於此的軍人凱末爾，不僅推翻衰弱的鄂圖曼帝國，更與列強交戰，最終為土耳其爭取到完全的獨立與主權，成為各國的典範。<sup>53</sup>

從十九世紀國家主義的勃興到二十世紀，這段期間國家主義除了推動歐亞非等地政治的變化，其內涵也產生了變化：從爭取自由、獨立、不干預過多事務，轉變為國家對各種事情的干預；由於干預過多事情，使得國家權力與機能更加擴大；從最初始民族運動創造的、國家組織尚未發達的民族共同體國家，

<sup>50</sup> 常乃德，〈法蘭西大革命前後之國家主義〉，頁 12-14。

<sup>51</sup> 常乃德，〈拿破崙與西班牙德意志之國家主義運動〉，頁 6-8。

<sup>52</sup> 常乃德，〈神聖同盟與少年義大利運動〉，《醒獅週報》第 137 期，頁 8-9。

<sup>53</sup> 常乃德，〈黃色民族的國家主義運動〉，《醒獅週報》第 138 期，頁 9-11。

轉變為以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各種元素組合而成的政治共同體國家。<sup>54</sup>這也正是中國青年黨所提倡之國家主義，不同於人們所提的民族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國家主義對抗反國家主義的鬥爭。戰前的東歐是此鬥爭的集中地，由於此地是大帝國與壓迫弱者的國家所在，同時德國已經從國家主義變質為軍國主義，諸多的壓迫使得國家主義在許多小國與民族之間萌芽，遂於十九世紀引發了此地一連串以全民政治為基礎、爭取獨立與建國的國家主義運動，最終引發大戰。而波蘭、捷克等國，在戰後也如願以償，一償其民族自決的訴願。<sup>55</sup>

戰後各地國家主義風起雲湧，均力圖反抗帝國主義、尋求獨立自主。<sup>56</sup>儘管有許多大思想家、社會主義者因大戰而轉向鼓吹世界和平，但戰後十年間，土耳其、敘利亞、摩洛哥、埃及、德國、波蘭、愛爾蘭、朝鮮等國，均是依此努力去尋求自己的獨立自主。即使是蘇聯，也正推行國家資本主義。<sup>57</sup>國家主義者常乃惠、何炳松透過歷史的描述，展示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國家主義的成長興衰史。<sup>58</sup>而張子柱透過現況的觀察，不僅反對一戰後喧囂一時的世界主義，並向人們指出，國家主義不僅是過去和現在的潮流，更是未來的世界潮流，是中國要走的道路。<sup>59</sup>這個看法，也正是其他國家主義者的看法。

#### 四、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辨

在提倡國家主義之初，即有人質疑國家主義與過往提倡的民族主義有何不同，那又與當時德國表現出來的軍國主義、列強的帝國主義有何差別？青年黨人隨即作出解釋，力圖避免開民族主義一詞中所帶有的強烈單一民族、文化中

<sup>54</sup> 常乃德，〈十九世紀以來國家主義在學理上的發展〉，《醒獅週報》第 138 期，頁 11-12。

<sup>55</sup> 常乃德，〈國家主義對反國家主義的大抗爭—歐洲大戰〉，《醒獅週報》第 138 期，頁 8-11。

<sup>56</sup> 何炳松，〈現代西洋國家主義運動史略〉，頁 496-498。

<sup>57</sup> 常乃德，〈歐戰後世界各民族之國家主義運動〉，《醒獅週報》第 139 期，頁 8-11。

<sup>58</sup> 常乃德，〈歐戰後世界各民族之國家主義運動〉，頁 8、頁 11；何炳松，〈現代西洋國家主義運動史略〉，頁 496、頁 498。

<sup>59</sup> 張子柱，〈什麼是世界的新潮？〉，《醒獅週報》第 74 號，頁 423；〈什麼是世界的新潮？〉，《醒獅週報》第 75 號，頁 431。

心的色彩，並與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作出區別。

王柯指出，「民族」作為和製漢語，在引介入中國的過程中，由於明治時期的日本在翻譯「民族」一詞時，因為西歐與德國在不同發展下，以及明治時期日本國粹主義的發展，日本學者將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兩種不同的意涵合併於「民族」一詞之中，讓「同一文化的民族作為構成政治共同體之基礎」這一概念，混淆了「民族」最初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意涵。而中國知識分子在引介過程中也同樣吸收了這一混淆的概念，並導致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若要做政治共同體的「國民」或「公民」，必須同時是文化共同體「民族」的一份子。本是多民族的中國，卻變成了以漢族、漢文化為主的「單一民族」國家，這不僅使漢族與其他民族形成了緊張，同時也使得中國民族主義也因此帶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sup>60</sup>而這正是國家主義所欲避免的情況。因此，李璜在〈國家主義正名〉中，即做出詳盡的四點說明。首先，即從字源與近代「國家」觀念的發展去做解釋：

近代國家的內容不是民族兩個字所能包含，所能代表的。固然在拉丁文裡，Natio這個字有民族的意思，但國家乃是近代的產物，便不單含民族的意思了。…必定要聲明近代的國家不只是一個民族構成的。一個國家裏往往有幾個民族同住着，而並不妨礙他的國家的統一和發展。……並且在近代國家的構成上，在實質上言之，所謂領土、主權之意很是重要；在精神上言之，信仰與共通歷史的回憶也大有關係的。常常是幾個民族同保一個疆土，同擁一個主權，文化相融，有了共通的信仰，歷史既長，有了共同的回憶。於是患難安樂都能長相保守，而不分離，以失墜此領土主權；此種精神與此種事實便成功近代國家的穩固基礎。而國家主義也是本此精神，本此事實，來在強鄰破人，大盜亂國的時候，叫一國的人共同協作以安內而攘外。因此國家主義的根據和內容-是與-近代國家的根據和內容一樣而並不加增別種成分的。於是國

<sup>60</sup>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 45-74。

家既不能夠叫作民族，而國家主義也就不能叫作民族主義了。<sup>61</sup>

首先，可以看見，他們主張民族作為血緣紐帶所組成的群體，然而國家未必是由單一民族所組成的，許多國家更是由多個民族所組成，並且屹立不搖，此乃是因為這些民族所在的地方，已經先有一共同的政治共同體「國家」存在，在歷史上諸多民族一起維護這個政治共同體，這些民族都具有公民身分，握有政治共同體的主權，更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信仰與相互影響卻又多元的文化。因此可以說，國家一詞並不等於民族，事實上，多數國家反而包含多個民族在內，並具有其他特質，因此翻譯為民族主義是不恰當的，這也反應出當時人們受到民族一詞傳至中國時，日本所帶來的影響。

其次，從中文字面的翻譯上考察，也可以看出翻譯為民族主義的謬誤：

並且國家這兩個字，在字的構造上也特別能形容出近代Nation這個意思。……於是領土、人民、主權三種要件都含在這個國字內面了。而且國家這個家字，從精神上言之，是有所依歸之意。……因此國家這兩個字，一個完全的表示出他所指的實質內容，一個親切的表示出他所指的精神生活。……當因此我們譚國家主義既完全沒有分辨血族的想法，便不必用民族主義這個字。何況國家主義的對待主張，如像Internationalisme，却叫作國際主義，又何以獨稱Nationalisme為民族主義呢？<sup>62</sup>

在中文中，國家一詞所具有的內在意涵，實已包含了近代國家所具有的內外要素，作為一種公領域的政治共同體，更是不會從血緣去區分的。更何況若翻譯為民族主義，就無法與相對的國際主義一詞做對比，不論是內涵還是字面上均如此。

再者，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也因為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混淆，而有解釋之必要：

<sup>61</sup> 李璜，〈國家主義正名〉，收於《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頁 27-28。

<sup>62</sup> 李璜，〈國家主義正名〉，頁 28-29。

有人說民族主義是美前總統威爾遜所提倡的「一民族一國家的主義」。如果是這樣，便與我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是兩回事。……不過我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雖不予威爾遜的一民族一國家的主義相反對，但是我們既以國家為單位，而對於已經同化在一個國家下面的各民族便不贊成他們分離了。如像中國裏的滿族和回族，他們既與漢族有幾百年真正共處，相安於一個文化的歷史，則同為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不但不加以歧視，而且要更使他們瞭解我們是同處於一個現狀，患難是相共的。我們今日言救國，不只是救漢族，是連滿、蒙、回、藏各族一齊要救，因為他們都是中國的一份子。既同是國家的份子，他們也該當起來同我們合作去打破這個現狀，因此我們更不願意把 Nationalisme 叫作民族主義，而使他們誤會成這只是漢族謀自救的主張。<sup>63</sup>

威爾遜在凡爾賽會議所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更是與國家主義大不相同，國家主義包含各種民族，不只謀單一民族的自救，而是國內所有民族的自救，因此不僅不會壓迫到少數民族的權益，而是會使整體獲益。也就不會因此而使本來具有共同歷史、記憶的政治共同體四分五裂。

最後，針對當時將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相混為同一主張，例如劉文海在其《近世大國家主義》中，即將帝國主義翻譯為「大國家主義」。<sup>64</sup> 國家主義者對其加以駁斥，也認為有解說其中之必要：

(二)有人以為國家主義這個字容易誤會成帝國主義 (Impérialisme) 或軍國主義 (Militarisme)，所以寧肯譯為民族主義。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小心了。不但在字面上，這三個字本來是三個寫法，在字義上，這三個字本來是三個意

<sup>63</sup> 李璜，〈國家主義正名〉，頁 29-30。

<sup>64</sup> 劉文海，〈近世大國家主義〉，收於任卓宣主編《帝國主義》(臺北：帕米爾書店，1977)，頁 1-3。劉文海的翻譯，根據其所言乃因其認為「我國社會人士，對於該名稱多久誤會，頗感不便；思之再三，唯有變更之為。」因此引起余家菊與劉文海對此名詞的商榷，最終劉文海坦承此一譯名有誤作結。參見余家菊，〈論所謂「大國家主義」并質商務印書館〉，《醒獅週報》第 39 號，頁 197-198；余家菊，〈為大國家主義答劉文海君〉，《醒獅週報》第 42 號，頁 215-216；〈附劉文海君來函〉，《醒獅週報》第 42 號，頁 216。

思，而且在百年來歷史上這三個主義常常是對頭冤家，怎樣能混為一譚呢？<sup>65</sup>

國家主義乃是歷史上受到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壓迫而生，例如法國大革命時各國之入侵法國、拿破崙征服壓迫歐陸各地區，均誕生了類似的思想，這更是代表國家主義不等於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而余家菊更指出：「『侵略』與『專制』二者，為帝國主義之必然屬性。具備此二者，即為帝國主義；無此二者，即不得以此稱之。」<sup>66</sup>顯現出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截然不同。

因此，若總結上述四點的討論，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國家主義所要創造、拯救者，不是一個單一文化與政治的共同體「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包含不同民族，卻擁有過去共同歷史之公民的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與自晚清以降，蘊含著漢族中心、民族－國家難以區分的革命派－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建國主張，青年黨清晰界定了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分野，更透過優先提倡政治共同體的重要性，用以化解當時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能有效地創造各民族組成共抗強權的聯合戰線。這也是當國民黨將國旗由五色旗更換為青天白日旗時，青年黨為何仍然主張維護與北京政府關係密切的五色旗，正是為了維繫各民族之間的紐帶「中華民國」此一政治共同體象徵的緣故。<sup>67</sup>

### 本節總結

本節所探討的內容，主要聚焦在國家主義中的幾個重要元素：國家、國性、國家主義之歷史，以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差別。國家主義的立足點必然需要有國家，作為具有人格特質的國家，自然具有其個性，也就是國性。國家是社會演化史中的最佳產物，而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受到壓迫時，國性的顯露將逼使愛國的國家主義誕生，國家主義的運動將迫使人們「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然而，鑒於一戰後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個負面的名詞和國家主義產生誤解的聯繫，而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此方面具有相似性，加上當時和製漢詞

<sup>65</sup> 李璜，〈國家主義正名〉，頁 28。

<sup>66</sup> 余家菊，〈論所謂「大國家主義」並質商務印書館〉，頁 198。

<sup>67</sup> 曾琦，〈論五色國旗之意義與價值并勗留日擁護國旗大同盟諸君〉，《曾琦先生全集（上）》，頁 413。



「民族」傳入中國後，也使中國人對此有所誤解，因此國家主義者必須辨明，國家主義不是上述三者，不僅是防衛的、和平的，也是包含眾多民族在內、具有共通文化、情感、歷史、國性的國家，才會產生的主張，跟民族主義強調的單一民族血緣、文化、歷史的主張並不相同，國家主義者指出，這個主張不僅反映中國本身的特性，更是為了讓眾人理解、防範他國藉民族主義分裂中國，所必須澄清的主張。

## 第二節 中國國家主義如何實踐？

青年黨既然主張不宜將各種主張隨意搬至中國應用，那麼說明青年黨人如何將國家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國性調整應對策略，即是本節之論述重點。本節將上述國家主義之核心要素作為基礎，分別論述國家主義應用於中國的各種主張，是如何使之適應於中國的？

### 一、中國國家主義史論

如上所述，國家主義的歷史，誕生於法國大革命。而在中國，這股潮流，也隨著海通以後傳入中國，成為中國社會的伏流，而隨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使得中國的國家主義因而轉為顯明的、有益的運動。<sup>68</sup>

然而，無種子則無法萌芽。常乃惠指出國家主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有類似的種子萌芽，然而由於時代的限制，加上後來大帝國時代的來臨，國家主義即隱沒不彰。<sup>69</sup>

直到鴉片戰爭失敗，中國被迫讓渡司法經濟等多數主權並加入國際社會，受到此種外力的刺激，國家主義運動逐漸產生。所謂國家主義運動，即是「要國家能夠走向國家主義的一種運動；詳細點說，就是國家能夠站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目的是要「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手段，達到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目的，含有對外與對內兩方面的運動。」

<sup>68</sup> 陳啟天，〈中國國家主義運動的過去與將來〉，《醒獅週報》191期，頁3。

<sup>69</sup> 常乃惠，〈國家主義之再生〉，頁11-12。

中國的國家主義運動，首先是自強運動，意圖對抗外來侵略，然而隨著甲午戰敗，遂認定內部不更新，無法與外人對抗。因此對內的國家主義運動接連而起，先後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成功，晚清的國家主義運動暫告段落，國家主義轉入「半意識的狀態」，成為一股伏流。隨後因為日本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巴黎和會列強對中國的無視，導致五九國恥、五四運動等國家主義運動再次崛起。<sup>70</sup>

此後中國國家主義運動，因著局勢，以及當時環境的四個結構性因素，使得國家主義運動得以大幅度的發展，這四個因素乃是：（一）新文化運動以降，對過去傳統的全面抨擊，致使中國失去中心思想，而國內外又無可資用以立國的中心思想；（二）實際政治的動盪不安，社會改革的失敗，均是人民缺乏國家觀念，因此需要喚醒人民參與、管理政治；（三）受到民國八年至十二年世界和平呼聲的欺騙，理解到外國對於中國的歧視，因此希望能改造中國，使之與各國平等立於國際；（四）思想界的自由空氣，使得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俄國藉此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從事顛覆工作。上述四個原因，使得國家主義者認為，國家主義正是所有思想中，用以立國、使人民覺醒並參與政治、使國家能與列國平等以及對抗共產主義，最適切於中國的思想。<sup>71</sup>因此，中國青年黨（當時仍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對外活動），正是因應時局而生。<sup>72</sup>國家主義者在這段期間，已經逐步系統化理論，建立起革命組織，同時運用宣傳的方式指引青年思想，以及反共、反俄，且持續推動收回教育權運動，有著相當成果。

因此，中國國家主義的萌芽，以及國家主義運動的開展，事實上可以說是從鴉片戰爭開其端，而隨後有著由對外轉而對內、隱性轉為顯性、溫和轉為激烈的一個過程。儘管在辛亥革命後短暫趨緩，然因中國國內局勢的未改善、國

<sup>70</sup> 陳啟天，〈中國國家主義運動的過去與將來〉，頁 3-4。

<sup>71</sup> 陳啟天，〈中國國家主義運動的過去與將來〉，頁 4-6。關於第一點中心思想的問題，本文已在前言指出，晚清的民族主義中產生了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這股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正是民國八年以降激烈反傳統行為的根源，而隨著普世王權的解體，儒家也失去了依附的制度，因此儒家意識形態之後受到全盤性的打擊，才誕生了意識形態真空的危機。相關研究參見註 6。

<sup>72</sup> 常乃德，〈中國之國家主義運動〉，《醒獅週報》第 139 期，頁 11-12。

外帝國主義侵略日烈，致使國家主義再度高漲、運動再度興起，而國內中心思想因反傳統造成了真空，而外來思想如世界主義、平民主義、共產主義等不適合做為中國的立國思想，更有導致國家混亂、外國入侵的可能，因此國家主義者開始全力推廣、系統化國家主義，以圖做為中心思想，並對抗一切他們認為有害於中國者。

## 二、中國國性論

中國的國性究竟是什麼呢？跟他國相比，具有哪些特質、優點與缺陷呢？這樣的問題，對於主張「每一國均有其特別之國性」、「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要求」的國家主義者來說，是必然要解答的問題。

國家主義者均認為中國的國性為「愛好和平」。<sup>73</sup>然而，正因國性「愛好和平」，面對當代困境時則毫無能力，缺陷也透露出來，特別是面對外國時的過於軟弱。張介石認為中國受到過於缺乏反抗精神，西漢以前中國擁有強力的、男性的反抗精神，至今已經柔弱化為軟弱的、女性的抵抗。<sup>74</sup>

為了使中國能夠再度立於國際，張介石將中國與德國、日本當下的國性進行比較，指出德國與中國比較下，德國的優點有組織力、責任心、自尊心、反抗力、創造力、秩序性。<sup>75</sup>中國跟日本相比，日本的優點有，秩序、組織、進取、堅忍、犧牲、合作，中國的優點是聰明。<sup>76</sup>張介石認為，上述德、日的優點，正是中國所缺乏、所需要學習的。若將上述的優點所整理，可以說「組織力」是第一優先考量，接下來是秩序、反抗力、創造力（進取心）、責任心（犧牲）、自尊心（堅忍）、犧牲和合作。

<sup>73</sup> 陳啟天，〈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收於《國家主義論集（第一集）》（臺北：冬青出版社，1977），頁 38。本文原名〈何謂新國家主義〉，於 1923 年少年中國學會上南京大會上演講；曾琦，〈國家主義與中國青年〉，《醒獅週報》第 34 號，頁 169-170。

<sup>74</sup> 介石，〈男性的抵抗與女性的抵抗〉，《醒獅週報》第 38 號，頁 191；介石，〈第三中國魂〉，《醒獅週報》第 46 號，頁 239。

<sup>75</sup> 介石，〈中德民族性之異同〉，《醒獅週報》第 3 號，頁 14-15；〈中德民族性之異同〉，《醒獅週報》第 4 號，頁 18-19；〈中德民族性之異同〉，《醒獅週報》第 6 號，頁 28；〈中德民族性之異同〉，《醒獅週報》第 7 號，頁 32-33；〈中德民族性之異同〉，《醒獅週報》第 8 號，頁 36-37；〈中德民族性之異同〉，《醒獅週報》第 9 號，頁 40-41。

<sup>76</sup> 張介石，〈中日民族性的比較〉，《醒獅週報》第 84 號，頁 483-484。

而依照余家菊的看法，則這只是西方與中國「重爭與重讓」、「重責人與重自反」、「重力與重理」、「重權利與重義務」的觀念差異而已，不需要對中國自身的國性有過多的汗巖，反而應自重自愛。



李劍華則從中國歷史的發展，歸納出平和性、自尊性、同化力、革命思想、政治思想及功利主義幾點為中國國性的內容。首先是平和性，李劍華以歷史性的追溯，指出從古到今，影響中國國性變化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莊子等人，思想上均有程度不一、反對戰爭的平和主義，人民對窮兵黷武之皇帝、軍隊的看法，也表現出這種平和性深入人心，即使在民族之間碰撞時，也多以文化同化而非武力征服，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國民性之平和，也是中國的特點。<sup>77</sup>而中國人自尊心甚強，在歷史上也特別表現在對自己文化的優越感上，只是隨著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這種自尊心也隨著挫敗而似乎轉為自卑。<sup>78</sup>對外族、征服者的文化同化力，更是中國人自傲的一點，然而在面臨新式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李劍華也指出這點並未足峙，是中國人該注意的。<sup>79</sup>

再論革命思想，李劍華以中日兩國為比較，說明中國的君臣關係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天子、政府作為人民的僕役，中國人民如遇不良者，可以將不良的政府給更換掉，日本則不能。<sup>80</sup>李劍華更指出，儘管有上述的革命思想，但因中國人的政治思想過於平和，對政治抱持著無感覺的態度，抱持著苟安主義，不管政府到底是誰統治、哪種政治體制，他們都只求和平、無害於自身即可，而非要求政治為人民謀福利，因此在過往政府均屬於少數群體控制，而非普羅大眾。而政治也因此腐化，淪為買賣賺錢、貪汙腐敗的溫床，政治遂每況愈下。<sup>81</sup>最後並論中國人對於功利的態度，以英日兩國作為對比，可以看見中國的功利主義過於追求利己、全然缺乏義務觀念，而英日兩國則是以社會公眾的

<sup>77</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醒獅週報》第 62 號，頁 348-349。

<sup>78</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醒獅週報》第 63 號，頁 356-357。

<sup>79</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醒獅週報》第 64 號，頁 363。

<sup>80</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續）〉，《醒獅週報》第 65 號，頁 367-368。

<sup>81</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續）〉，《醒獅週報》第 66 號，頁 375。

幸福、講求義務犧牲等觀念的功利主義。而中國這種功利主義之所以發達，乃因外族入侵，導致對國的價值茫昧，對國家共同體生活的觀念淡薄，再者國家與社會兩者完全脫節，因此社會問題政治無法解決，人民也就只求明哲保身，變得私心過重，不顧公益。<sup>82</sup>

綜上所述，中國的國性「愛好和平」是上述人等的共識。但這個國性，在歷史上、在面對外力時，問題也逐漸浮現。正如前一節筆者引用王化周所言，國性是可以變化的，而中國國性也仍處在「軟性時期」的發展階段，因此是還在成長、可以改善的。因此張介石才不斷引介德、日等國國性的優點，供中國參考。而要如何改善呢？國家主義者，均認為唯有「教育」。

### 三、國家主義教育學

「共和國家最要者，為道德。」曾琦引用孟德斯鳩之言，指出「一國之社會能秩然有序且日趨進步，全賴以最高道德以維持之。」<sup>83</sup>中國的社會結構自晚清以來，即開始從過去的傳統社會朝著資本主義社會轉變，而在這段轉變的過程當中，過去儒家的傳統道德秩序受到衝擊而逐漸瓦解，而其所依憑的王權制度因革命而崩潰後，這套道德觀已無可依憑的政治結構。<sup>84</sup>隨後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政治事件，更使得儒家更成為眾矢之的，人們對其更感到厭惡，儒家變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對象，而儒家道德觀也成為攻擊、反叛的對象。

隨之引入的，乃是相對於儒家三綱五常的西方主張，在五四運動之後，西方思想的湧入更如狂潮，例如個人主義、女性解放、民主、科學、共產主義、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主張，不斷被引介入中國，意圖跳脫儒家思想的束縛，並使國民道德一舉而躍至西方先進社會的標準。<sup>85</sup>

身處於此一歷史情境中，國家主義者眼見舊道德信仰之崩落，然而新的綱

<sup>82</sup> 李劍華，〈中國國民性論（續）〉，《醒獅週報》第 67 號，頁 383。

<sup>83</sup> 曾琦，〈國家主義者之四大論據〉，頁 389。

<sup>84</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收於《國家主義的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23），頁 51-52。

<sup>85</sup> 張灝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一文中，將這一過程的思想特點描繪為整體文化取向的危機，見該文頁 44-60；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 289-316。

常卻未確立，中國國民陷入混亂之中，理解到中國國民若無一整體信奉的道德價值，不僅行事、生活無所適從，更會導致對本國毫無認同、失去自尊，使得社會混亂，而他人對本國的欺凌，反倒認為正常。因此，為了使國民對中國、對共和政體具有認同感，並尋回自己國家的尊嚴，國家主義者即力圖透過教育，重新樹立中國的新道德價值，使中國人民成為一合乎現代社會，以「國家」為信仰中心，具有民主共和政治所需素養的國民。

早在五四運動之前，曾琦即觀察到中國國民道德觀紊亂的現象，為此他在1918年撰寫了〈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一文，後來改為《國體與青年》一書出版，受到當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推崇，認為該文適合當下中國人之所需。<sup>86</sup>

該文將袁世凱、軍閥等人的舉止與儒家主張忠君、三綱五常等道德觀結合，與民國之後應該建立的民主、共和、科學、愛國等價值觀相對立，指出中國正是因為過去的道德與現實狀況不合，而新的道德觀不僅沒有在國民心中確立起來，甚至遭到抵制，因此才會產生接二連三產生稱帝、復辟等各種破壞民國政治的行為，青年更因不知該往何處走、遵奉何種道德而感到鬱悶與混亂，遂對國家失去信心與認同，而惟西方是尚。曾琦認為，這不僅是青年的不幸，更是國家整體之大不幸，因為青年是國家前途與命脈之所繫，若因此而陷入崇洋、自卑、混亂乃至於絕望而自殺，將可能使處於危急存亡之際的中國永無翻身之日，乃至於滅亡。<sup>87</sup>

然而在五四以後，西方思想如狂潮湧入，曾琦在《國體與青年》一書中所提出的主張也不敷所需。多數青年受到當時世界主義、平民主義、共產主義的風潮所吸引，並且成為辦學教育的宗旨。同時中國國內基督教的學校不斷增加，吸收中國人成為基督教教徒。而此時的國家主義，反倒因為世界大戰後，受到

---

<sup>86</sup> 沈雲龍，〈曾琦先生傳〉，《曾琦先生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1583。

<sup>87</sup> 曾琦，《國體與青年》，《曾琦先生文集（上）》，頁9-15。

人們的疑懼而失去重視。不過，國家主義者認為，上述主張均有害於中國。

國家主義者認為，教會學校所培育出的學生、留學生以及老師，由於受到教會的影響，對於中國不僅不認同，更詆毀中國的一切，反而認同外國的主張，甚至支持外國對中國的各種侵略舉動，因此教會學校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要透過教育的方式間接毀滅中國的歷史、文化、認同等舉動，要培養中國人出賣自己國家、為外人所用乃至支持外國侵略。<sup>88</sup>

至於平民主義，國家主義者認為並不與國家主義相違背，但是倘若不先發達國家主義，沒有對國家產生中心信仰，平民主義終將使中國人仍將無所適從，對於中國乃至於個人在未來的生存均將有更深遠的禍害。<sup>89</sup>

世界主義則更為國家主義者所反對。由於一戰德國戰敗，德國的軍國主義與國家主義遭到錯誤的連結，使得人們對國家主義反感，加上當時西方的政治人物與學者們大肆提倡世界主義，使得五四以後引介西方思潮進入的中國人大幅傾向世界主義，主張透過世界主義直接走向和平。然而事實上國家主義者指出，世界主義僅是西方少數人之夢想，現實上並未受到各國重視，相反的，戰後各國的國家主義反而更為增強。況且國家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各國平等的狀態都尚未到達，更遑論泯除國界之世界主義？他們不主張世界主義，他們主張的是國際主義，而要走向這條道路之前，更正應該先發達國家主義，使得這一主張有著堅強的後盾，才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弱國提倡此一主張，不僅無人搭理，更易使人們認定該國孱弱，而遭到他國侵略。<sup>90</sup>

因此，對國家主義者而言，教會學校、平民主義、世界主義等主張，均為建立以「國家」為中心之新道德的阻礙，事實上，這三者也常常是一體的。因此，國家主義者在行動上，於1924年發動「收回教育權」運動，透過抗議、罷

---

<sup>88</sup> 余家菊，〈教會教育問題〉，收於《國家主義的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23），頁131-162。

<sup>89</sup> 陳啟天，〈中國教育宗旨問題〉，《醒獅週報》第6號，頁28。

<sup>90</sup> 余家菊，〈民族主義的教育〉，收於《國家主義的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23），頁2-4。

課、退學等各種風潮。<sup>91</sup>並且提出國家教育的宗旨。

國家主義者關於教育學的主張為何？簡單而言，即是灌輸國民愛國的觀念，與為國犧牲的精神。什麼是國民？「國民者一國內的份子而有政治及社會全能者也。」<sup>92</sup>那要怎麼讓國民產生情感呢？李璜引用法國哲學家惹南（Renan）對國家的定義，充分體現了國家主義教育學寄望教育能給國民了解的內容：

一個國是一個靈魂，是一種精神的原則（principle spirituel）。有兩種東西，在意義上其實是相同的，能够造成這種靈魂，這種精神的原則。一種是在過去的，一種是在現在的。前一種是一些公同所有對於過去很豐富的紀念；後一種是對於現在彼此的承諾，願意共同生活的承諾願意繼續共同發揮光大前人遺業的承諾。一個人不是立刻便成功這個樣子的。一個國也如同一個人，是有很長遠的努力，犧牲，和盡職的過去為他的基礎。所以一國人最重要的精神在不忘先祖；我們之有今日，何莫非祖宗之所造就。一種英勇的過去，一些光耀青史的大人物：這都是社會的基本，為一國精神所系屬的。曾共有在過去的光榮而又有在現今的志願；曾共做了一些大事業而尚願意在共作一些，這便是對於成功一個國的主要條件。<sup>93</sup>

李璜引用惹南之意，在於說明國家主義的教育所希望學生的，是「誘啟後人光大先業。」<sup>94</sup>冀望他們所學習的了解的，是過往中國的歷史、地理等本國的知識與文化，以及國民的天職與責任。<sup>95</sup>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知識的教育只足以照耀人的意識，使他更明白地去選擇向前的路，但是不足以催促他一定往前或走哪一條路；腦裡裝滿了知識不足以支持善的生活，心坎上充滿了熱情才足以戰勝自私的習性，有同等的智慧不足以同心而共業，

<sup>91</sup> 余家菊，《國家主義教育學》（上海：中華書局，1925），頁 32-33；77-84。

<sup>92</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52。

<sup>93</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48-49。

<sup>94</sup> 李璜，〈國民小學教師對於今日中國國家的使命〉，收於《國家主義的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23），頁 79-86。

<sup>95</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53。



有同樣的心情才足以共喻而同往。<sup>96</sup>

要使國民的愛國情感發達，才能讓國民學習知識後為了國家發揮所長，共同為國家而奮鬥。但是要如何使國民充斥著這樣的精神呢？李璜寄望於當時國民小學的教師去引發學生，「國民道德，愛國觀念，是全靠小學校歷史教課去耕種的。」真誠堅固的愛國思想與道德責任，一定需要很早就小孩子心中培養起來，這就是國民教師所負擔的任務，為了要能夠達到這個效果，教師必然需要自己肩負起這樣的責任。<sup>97</sup>而要做為這樣的教師，必須自身具備這樣的道德基礎。因此國家主義者相當重視國民小學的教師的素質，並寄望於他們。

同時，國民教育的內容，是更深一層地希望人民了解到「社會的連帶關係」：

其實國家便是一個社會，——比家族較大的社會，國家主義便是主義國民個人的意識要與國家社會的意識溝通而打成一片罷了。個人的生活那一天能離了社會，個人的價值也大半賴社會的價值的程度，所以這種甚深厚的連帶關係，為國民的該當首先知道，講國民教育的該當首先注意。<sup>98</sup>

國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正是國家籠罩於國民，因此國民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與之緊密相連。而國家自然而非憑空而出，而是由過往的歷史先人所創造，他們創造出來的一切，自然籠罩著這個國家的後人，因此，作為一國國民，當然需要了解這個事實，這也是教育所需要教導他們的：

連帶觀念的發揮可以使我們更了然於愛國之義在珍重前人之業而求有以光大之：這不僅是一種理想的主張，簡直是一種應有的義務，因為前人為我們經營下這麼多的遺產——指言語書籍器具等——讓我們消受而並不取償，我們豈該只是消費而不求增加！前人所用力草創者我們當愛護而光大之，前人所用命爭來者我們當合力而保守之。常常懷着共同擔任這個光大前業保守舊物的

<sup>96</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53。

<sup>97</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73-74。

<sup>98</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71。

想法就是國民所應共有的精神，就是真正的愛國思想。<sup>99</sup>

正如同前面所引惹南之言，唯有了解先人遺產對於後人的影響與偉大，才懂得要守護住自己的基業，在面對外人的文化侵略時，更要守住自己的傳統，更新之，光大之，讓這些遺產永傳後世。

除了在時間上祖先與後人的連帶關係外，連帶關係還包含了「一國人同時彼此相處，處處有休戚生死的連帶關係。」<sup>100</sup>一國之內所有人彼此是有互相連帶的，因為現代社會是仰賴「分工」而逐漸進化而來，而分工越頻繁，社會的連帶關係則越密切，而國家便是社會分工的最重要的演化產物，而國家的統一就是建築在這個分工的連帶上。中國能夠統一也需要是仰賴於此，但因連帶意識薄弱，導致各省人們之間的衝突。<sup>101</sup>因此李璜指出，若要統一，必須要：

因為一國人的精神既不能統一，所以才時常發現形式上之不能統一。反過來說，要想國家永久真正在形式上統一，必須國人的精神能夠統一，要想國民精神能夠真正統一，必須使他很早的明於「社會分功」的重要，明白些說，就是該當使他很早的明於縣與縣省與省在物質精神兩方面連帶關係的重要。<sup>102</sup>

唯有當國民理解到時間先人與後人、空間上各地人們之間是一種互相連帶的關係之後，才能夠跨越地域觀念，形成了國家的觀念。而當各地的國民理解到這一點之後，並且是需要國民有責任去盡義務、去愛護的國家，是需要彼此相互團結，才能在當時強敵環伺、國賊林立的情況下，去對抗這些殘害國家的敵人，共同創造一個美好未來的國家。唯有如此中國才能生存。

透過國民教育，讓人們具有愛國思想以後，更需要使人們具有能力去對抗殘害國民、國家的敵人，消極面能夠具有自衛能力，積極面則是待時機成熟可進行全民革命。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在學校施行軍事教育，實行武育

<sup>99</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73。

<sup>100</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76。

<sup>101</sup> 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頁 77。

<sup>102</sup> 同上註。

救國，達至全民武裝。<sup>103</sup>然而當時的中國，卻早已取消了軍事教育，因此，國家主義者乃重新提倡再行軍事教育，以救國家。<sup>104</sup>

余家菊指出，中國國民雖愛好和平，但是因為實力虛弱，這種情況講和平只是任人宰割，因此實行軍事教育，正是為了要能夠使國民具有一定的軍事能力與知識，具有自衛的能力。之後，就可以在各地進行辦民團、指導地方軍事防衛武力，去取代舊有那些腐壞的、魚肉鄉民的軍隊和民團，進一步成為真正地方自治防衛的武力，用以防備內外的敵人。同時還有其他幾個優點，例如使國人變得守紀律、壯膽氣、強健筋骨，社會變得更有組織。對當時的中國而言是非常必要的。<sup>105</sup>

靈光同樣也指出，實行武育救國不僅有上述的成果，更因為青年是中國的希望，如果實行軍事教育，可以將青年的肉體與精神強化，不被當時的惡環境支配，或走向絕望而自殺。畢竟唯有健康的青年才能救國。<sup>106</sup>左舜生也指出，當時社會風氣澆薄腐化，如果實行軍事教育，正可以整頓社會風氣，使青年安頓下來，加之國際環境險惡，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中國更可能成為戰場之一，若實行軍事教育，也正能使國家因應戰爭所需。<sup>107</sup>

而上述諸人均認為，推行軍事教育，正是要使青年具備相關知識，以備日後回鄉，成為全民革命的主力，要取代那些沒有希望的、魚肉鄉民的民團與軍閥，非得要透過有軍事知識的國民，進行組織、訓練和武裝革命，才能夠推翻這些人。<sup>108</sup>這也是其他國家主義者的共同看法。透過這些人，才有辦法在地方推行武裝革命，由國家主義者取得地方政權，之後才有可能推動地方的省自治，進一步達到聯省自治，乃至全國統一。因此武育教育，是國家主義者實行政治

<sup>103</sup> 曾琦，〈學校軍事教育問題號弁言〉，《醒獅週報》第 30 號，頁 143。

<sup>104</sup> 陳啟天，〈學校軍事教育復興運動〉，《醒獅週報》第 30 號，頁 145。

<sup>105</sup> 余家菊，〈學校軍事教育問題發端〉，《醒獅週報》第 30 號，頁 143-144。

<sup>106</sup> 靈光，〈武育救國論〉，《醒獅週報》第 30 號，頁 144-145。

<sup>107</sup> 舜生，〈學校軍事教育之必要及其應注意之點〉，《醒獅週報》第 30 號，頁 146-147。

<sup>108</sup> 曾琦，〈學校軍事教育問題號弁言〉，頁 143；余家菊，〈學校軍事教育問題發端〉，頁 143；靈光，〈武育救國論〉，頁 145；舜生，〈學校軍事教育之必要及其應注意之點〉，頁 146。

統一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有了武育教育，也需要有國民教育灌輸以愛國觀念，並在革命黨中國青年黨的領導下，才有辦法使這些人與過去的軍閥等國賊有所不同，並完成全國統一。

綜上所述，國家主義者主張的國家主義教育學，乃是主張實行國民教育，國民教育的核心觀念是愛國觀念和連帶關係觀念，而教師，特別是國民小學的教師，是最重要的傳遞者，引導學生產生這些觀念的啟蒙者。唯有使國民均具備這些觀念，才能讓他們跳脫過去侷限他們的地域觀念，理解到自己與先人、與周圍彼此之間的人之間，原來都是中國的國民，不僅尊崇先人的偉業，也理解到與中國國內人們的連帶關係是非常深厚的，這個時候才開始真正去尊重、愛護自己的國家，這時候有了愛國愛鄉的觀念，才會去加入國家主義的運動，去實行全民革命，「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維護這個國家的主權與統一。而實行武育教育，正是要使國民具有軍事能力，當國民經受國民教育，愛國觀念萌芽而信仰國家主義後，具有能力去參與武裝革命，實行軍事行動，從地方開始取得政權，才有推行聯省自治和聯戰法的基礎。

#### 四、國家主義經濟學

在當時，中國作為經濟、政治、文化各層面均受到帝國主義宰制的落後國家，為了要能夠抵禦外國對中國的壓迫，分析局勢後，他們理解到，強調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優越，是不足以成事的，中國要走的，乃是朝向發展資本主義、提升國家生產力、強化國家經濟以創造足以抵抗的物質文明的道路。因為國家唯有具備獨立自主的經濟主權與能力，在國際上，才會被視為是一個真正的、具有國格的獨立國家。<sup>109</sup>因此，中國若要發展資本主義，推進整體經濟的工業化，勢必得先分析國內外的當前局勢，參考西方經濟學發展以來的諸多學說，依此來提出藥方。

國家主義者指出，中國經濟處境處於相當衰弱的狀態，若再不改善，將被

---

<sup>109</sup> 惲震，〈中國人所當創造的文明〉，《醒獅週報》第 21 號，頁 95-96；〈中國人所當創造的文明〉，《醒獅週報》第 22 號，頁 99-101。

列強所擊垮。他們將中國經濟之所以衰弱的根源，歸因於當年一八四二年清朝與英國鴉片戰爭後，雙方所簽訂的南京條約、天津條約中，中國喪失了關稅的主權，關稅制度由國定關稅制變為協定關稅制。<sup>110</sup>所謂協定關稅，乃是由國際間彼此同意，以條約協定一切稅率。<sup>111</sup>然而因為中國自晚清以來屢次戰敗，簽訂多次不平等條約，又大量借款等因素，稅收均成為抵押品，因此中國的關稅乃為外國所共管，稅則由外人制定，中國被迫接受外國所訂立的稅率與制度，但由於關稅具有控制全國經濟發展的能力，倘若不有關稅制度，則國家經濟將無法發展。<sup>112</sup>而除經濟層面外，財政、產業政策等也須仰賴自主的關稅制度，才有辦法推行。<sup>113</sup>因此，關稅可以說是重中之重的問題根源，中國如要富強，不論是要加稅、建立統一的財政制度，乃至保護產業以發展經濟，均不得取回關稅自主權。

另外，外國對中國的侵略還不止於關稅。中國本身的釐金制度，加上國內貨品轉口的復進口稅等多重的課稅制度，對於中國商人已經造成沉重負擔，而外國除了因不平等條約，具有操控中國稅率、可在中國利用中國的資源與便宜的勞工設廠製造外，當時外商還具有可以免除釐金的子口稅，之後更想要再透過各種方式規避掉中國國內徵收的各種稅目。這樣一來，中國幼稚的工業更無法與成熟的外國工業抗衡，中國將淪為外國商品的占領地，長久以來中國將永世不得翻身。<sup>114</sup>

奠基於上述論述，陳啟天進一步統合看法，指出中國經濟的未來必須要採取兩個步驟：收回經濟權和統一經濟權。中國必須先收回經濟權，取回國家對於經濟所應掌握的主權，那麼應該收回那些權利？主要有關稅權、交通權、製造權、貿易權、金融權及礦產權，基本上就是自晚清以來所喪失的各種利權，

---

<sup>110</sup> 胡國偉，〈收回海關主權問題〉，《醒獅週報》第 56 號，頁 307-308。

<sup>111</sup> 胡國偉，〈裁厘加稅與關稅自主〉，《醒獅週報》第 56 號，頁 309。

<sup>112</sup> 胡國偉，〈收回海關主權問題〉，頁 307。

<sup>113</sup> 徐正權，〈中國關稅略史問答〉，《醒獅週報》第 56 號，頁 310。

<sup>114</sup> 胡國偉，〈裁厘加稅與關稅自主〉，頁 309。

唯有將其奪回，才能統一經濟權。統一經濟權要做甚麼呢？首先，政府應以國家為單位、以全國國民為出發點去發展經濟、解決經濟問題，在這個出發點上，去規劃一個統一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以國家為單位，但並不妨礙私人與地方經濟的發展，同時統一度量衡、稅制、貨幣等各種經濟發展的要素，奠基於此，再透過國家的力量推行產業政策，扶植國家工業發展，同時運用國家的力量壓抑私人資本、協調民生、扶助農工，以避免貧富差距過大，導致階級鬥爭。簡而言之，是「佔在國民經濟的地步，運用國家政治的權力，統籌經濟，力求公利；開發展業，增加國富；節制資本，協調民生；使全國經濟事業充分發展，經濟利益普及全民，各得相當而且必要的經濟滿足，而無從發生所謂貧富懸殊，階級爭鬪的慘劇」。<sup>115</sup>

從以上的說明看起來，國家主義者已經指出，中國經濟的具體問題，在於經濟主權的喪失，而其中又以關稅是重中之重。這一切不僅導致了經濟衰敗，連帶也至使中國國內的經濟差距、貧富懸殊過大，最終可能導致階級衝突。而之所以會喪失這些權益，乃是由於晚清以來中國政治權力的衰敗，若要改善。曾琦認為要強硬地主張收回這些權益，不管是透過和平的還是激烈的方法，都要收回，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夠推行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發展資本主義。<sup>116</sup>

而根據上述局勢的分析，國家主義者的經濟發展策略，其背後所仰賴的經濟理論，乃是德國的經濟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所主張的「國家經濟學」。<sup>117</sup>李斯特的主張，立足於「國家人格」的概念：「現今世界上的國家如無經濟上之獨立自由，便算不得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國民便難免為外人的奴隸牛馬，必得要將本國生產者的國家市場設法保護着，使不為外貨所占

---

<sup>115</sup> 陳啟天，〈國家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醒獅週報》第 57 號，頁 313-314；〈國家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醒獅週報》第 61 號，頁 340-341；〈國家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醒獅週報》第 68 號，頁 388-389。

<sup>116</sup> 曾琦，〈收回關稅權之兩種方法〉，《醒獅週報》第 56 號，頁 307。

<sup>117</sup> 李璜，〈述國家主義的經濟學〉，《醒獅週報》第 26 號，頁 121-122、《醒獅週報》第 29 號，頁 138-139。；唐慶增，〈經濟學中之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 82 號，頁 472-473；賀良，〈李斯特（Friedrich List）與其國家思想〉，《醒獅週報》第 99 號，頁 575。

領。」<sup>118</sup>是「以國民性的意思 (idée de nationalité) 對抗國際主義」、<sup>119</sup>「以生產力的意思 (idée de force productive) 對抗交換價值」，即是以國家為獨立單位、發達國家生產力的經濟體概念，對抗主張自由貿易、破除關稅的自由經濟體制。這背後所代表的，乃是兩個理念：一、為一國取得經濟上的獨立自由，因為沒有經濟自由的國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二、為一國保守本國生產者的國家市場，因為一個國家要能生存，必然要有一個生產發達、能暢銷國貨、一定規模的國內市場。<sup>119</sup>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必然需要收回關稅，推行保護主義政策，建立國內市場和提高國內產業的生產力，那麼該麼怎做呢？羅伯特·艾倫 (Robert C. Allen) 將李斯特經濟學中的發展策略，總結為四個要點：一、廢除內部關稅並改善交通條件，建立大規模的全國性市場；二、徵收外部關稅，保護「尚處於嬰兒期的工業」，抵抗來自英國的競爭；三、成立銀行，穩定貨幣並提供商業資金；四、建立大眾教育體系，加快新技術的採用和發明。<sup>120</sup>然而這些主張，正是奠基於國家作為經濟單位的基礎上，藉此才有機會將國家建立起獨立經濟。

同時，國家主義者也對會貧富懸殊、勞資差距等經濟發展所會帶來的問題進行了思考，他們體認到，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對這些問題失之察覺，才會導致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的產生與蔓延。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他們主張運用「干涉主義 (Interventionnisme)」的經濟政策，其背後理論為羅德白爾推士 (Rodbertus) 和拉薩爾 (Lassalle) 的「國家社會主義」，不僅為全民經濟利益作調節，更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工具。具體而言，國家社會主義「在民主主義的政治之下是可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用國家能力實現的經濟分配的相當公道的」，「用國家的能力，來防止個人各為其私利而害及社會

<sup>118</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醒獅週報》第 50 號，頁 264。

<sup>119</sup> 李璜，〈述國家主義的經濟學〉，《醒獅週報》第 26 號，頁 121-122；〈述國家主義的經濟學〉，《醒獅週報》第 29 號，頁 138-139。

<sup>120</sup> 羅伯特·C. 艾倫 (Robert C. Allen) 著，陸贇譯，《全球經濟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頁 43。

的經濟生活，並且來調劑私利的自由競爭的衝突，以使一國的人的經濟生活都能够平均的發展」，而國家的目的正是為了「公利」，所以「他要去干涉一國內人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生活，以免他為衝突的私利所弄亂。」節制私人資本，重新分配財富，實行社會福利，十九世紀下半夜至今的歐洲，乃至於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均是這種經濟政策理念的實行者。<sup>121</sup>而國家主義者，也在這個理念下，提出了「社會政策」的概念，用以作為此一理念運作下的策略。<sup>122</sup>

總結上述，國家主義者根據李斯特的主張，觀察當時的中國與國際情勢後，提出了相關的經濟策略：收回經濟權與統一經濟權。國家主義者也在1927年，將李斯特的《國家經濟學》一書翻譯出版，作為其經濟理論上之根據。<sup>123</sup>這些都是為了中國能夠在帝國主義競爭激烈的險惡國際情境中，能夠存活下來的策略。而這個策略，必須奠基在中國國家主權完整上，而要取回完整的國家主權，勢必要使政治統一不可。因此國家主義者為了完成政治統一，一方面要主張推動全民革命，推翻軍閥等各種阻礙國家進步的勢力，另一方面則灌輸國民國家主義，鼓勵全民奮起抵抗列強，藉此協助收回經濟主權。因為唯有收回經濟主權，才能夠運用保護貿易政策，使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提高生產力，使之能在國際競爭中生存。<sup>124</sup>

##### 五、國家主義政治論

國家主義者的政治主張，除其「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以外，最主要有兩者：「全民政治」與「聯省自治」，這兩者彼此之間，以及與上述的主張，是有機地連結在一起的。為了將全國國民有機的聯繫在一起，不得不施行全民政治，而在地方上需要推行聯省自治，使全民參與、熟悉地方和全國的政治、國防等國家大事，才足以使國民熱愛國家這個共同體，為了國家不惜犧牲，去消

<sup>121</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頁 264-265。

<sup>122</sup> 劉東巖將之具體化，可參看劉東巖，〈國家社會政策與勞資之根本問題解決〉，《醒獅週報》第 151 期，頁 3-12；劉東巖，〈述國家社會主義〉，《醒獅週報》第 152-157 期，頁 18-28。

<sup>123</sup> 王開化在 1927 年將該書譯出，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sup>124</sup>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總部擁護關稅自主宣言〉，《醒獅週報》第 142 期，頁 1。



滅軍閥、共產黨和買辦等國賊，進一步抗拒列強的侵略，保衛國家。

全民政治，是國家主義者不可動搖的主張。儘管民元以後，中國遭逢許多破壞民主共和之事，但他們仍然認為，全民政治「為近世政治試驗最良之方式」，「無人敢說專制政體較民治更好的」。<sup>125</sup> 因此，他們堅持過去開國以來的民主政治制度，並將之列入青年黨的政綱之中。

然而，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推行的民主政治，距當時已過一百多年。這段期間，資本主義大幅發展，「不但封建社會完全解體，不但種種新組織接踵而至，而且把人們的精神都解放了，把平民的政治能力和智識要求都提高了」，因此導致了社會組織的變化，「以法律為區分基礎的社會階級一變而為以經濟為區分基礎的社會階級」，同時這種經濟、社會的變化導致了社會問題，其中勞資衝突又是最具對抗性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在歐洲各國遂出現「工團主義（Byndicalisme）」，「舉凡工業發達之國家都會裡面，無不有同業組合之團體林立」，工團不僅「防禦牠們的職業利益」，且「發展牠們的連帶精神」，更想「與政邦對抗」，欲「以勞工階級的名義奪取政權」。<sup>126</sup>

這個現象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導致的結果，更是因為「政治制度還是百餘年前的舊物；社會變遷到了如此地步而表現國民意識的器具，仍是普通選舉與地方代議制度」，當時歐美各國的政治人物「從沒有想到政治制度與經濟事實時刻符合的必要；從沒有以經濟事實去糾正政治制度的志願」，「不早事改革已朽之制度以求適於新生環境」。而在一戰後，「代議政制的聲勢一天衰落一天，一般人甚至對於『德謨克拉西』都懷疑起來」，人們「無不痛恨政客式的政治運動，並且厭煩久慣之民主政治」，而「數年血戰與凡爾塞和約所產生的許多重大問題，均不得圓滿解決而議員們除互鬧意氣之外，又不能多所建樹」，因此「社會問題簡直沒有方法解決，政邦與個人對峙，把許多國家經濟的局面都破壞了」，舉國陷入所謂「近代政邦的急變」（La Crome de l'état moderné）

<sup>125</sup>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對時局宣言〉，《醒獅週報》第 141 期，頁 7。

<sup>126</sup> 鄧孝情，〈職業代表制概論〉，《醒獅週報》152 至 157 期合刊，頁 13。

之混亂狀態，導致歐洲許多國家「專政的變態心理漸漸地普偏化」，走向專制獨裁的政體。<sup>127</sup>

為解決這個困境，法國學者改造政治制度的補救之方，是透過「組成一個能夠代表業利益，共同利益，而且具有專門學識的意願採用科學方法與精神去解決邦國重大問題」的議會，而這個制度正是「職業代表制」。<sup>128</sup>那麼職業代表制的成員有誰？代表了哪些意涵呢？簡而言之，是「（一）職業利益的代表（二）專門技能的代表（三）社會團體的代表」，儘管形式各有不同，但是「只有三種合用，始能滿足才能（Competence）利益（interêt）職業（Profession）三方面的要求間收其合作的實效」，才能改善過去英美的代議政治問題，使之與「近代的經濟事實不相衝突」，並組成「完善底職業議會」與「完善底經濟政府」。在這個精神上，法國創設了「國家經濟議會」，將國家的人才聚集於此，用以研究、解決戰後種種舊式代議制度不能解決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經濟議題。<sup>129</sup>參考法國的經驗，鄧孝情指出，只有「職業議會產生的經濟政府」，才能夠在「全民政治與獨裁政治（一黨專政，一階級專政或一人專政）猛烈鬥爭的戰後時期」，穩當的推行全民政治，打倒獨裁政治。<sup>130</sup>

因此，在國家主義者眼中，地方選舉與中央選舉以外，再輔以職業選舉的全民政治，正是保障中國維持民主的重要手段。<sup>131</sup>而全民政治不僅表現在中央、地方普選與職業選舉制度，也表現在地方上，呈現出來就是「聯省自治」。當前的局勢，李璜說明的很清楚：

為實現真正的全民政治，大家都知道只是首都革命，只是中央政府換一批人——就令其是新的健全份子，也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在道理上在事勢上都必得從省縣方面下手，纔會真正達到我們的目的。……不過以中國地方寬遠，

<sup>127</sup> 鄧孝情，〈職業代表制概論〉，頁 13-14。

<sup>128</sup> 鄧孝情，〈職業代表制概論〉，頁 14。

<sup>129</sup> 鄧叔耘〈法蘭西國家經濟會議的概況〉，《醒獅週報》第 166 期，頁 13-15；〈法蘭西國家經濟會議的概況〉，《醒獅週報》第 168 期，頁 6-8。

<sup>130</sup> 鄧孝情，〈職業代表制概論〉，頁 15-16。-

<sup>131</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醒獅週報》第 49 號，頁 258。

交通未便，而且羣盜割據的現形勢之下，就使在中央得着好人，定出好的憲法，又有誰奉行呢？所以我們革命工作是不但要從省起，聯省以與有數省地盤的軍閥的惡勢力抗，並且要先從縣起，聯縣以取一省的實力。<sup>132</sup>

僅推倒中央政府是無法改造中國的，為何呢？因為中國的地方過大，加上地方上盜匪橫行、軍閥割據，令不出中央的情況下，只改革了中央政府是毫無拯救中國的可能的，要改革中國，只有延伸到地方勢力去進行改革。國家主義者對於他們所主張的聯省自治，有著三個前提，是需要理解的：

（一）不是模仿那一國為聯邦或邦聯，而是事勢上的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二）不是為何種人的地位設想，並且不是為避免何種人的專橫設想，而故意削足適履或畫蛇添足的去作一種勉強分權的工夫，而是欲實現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得不然的。（三）不但不妨害國家的統一，而且於國家的統一是有利的。<sup>133</sup>

正是為了推行理想中的全民政治而推行聯省自治，而非為了那些要掩飾自己割據一方，去提倡省憲、聯省自治的軍閥而作。並且為了因應中國廣闊的領土，推行這種制度，正好實行地方分權的自治制度。然而，時人曾認為這有分裂中國的可能，國家主義者怎麼回應呢？他們回答道：

在長期的奮鬥中間，一些聯絡作戰的省份，可以得着兩種好的訓練的結果：

（一）為作戰的便利起見，聯絡了的省份絕不會互相立異，在行政號令上有所衝突，而必能通力互助，可以在許多事實上打破了舊日習慣以至成為法律的一些省的閉關主義。（二）因為主張的一致，利害的相同，聯絡作戰的各省人士必能真正同心同德，在同一的大目標——除國賊抗強權的大目標——之下，合作既久，感情漸洽，便可以將「大廣東」、「大雲南」等等固蔽的見解消除許多。……這兩點可以說前者係事實上的真正聯合，後者係精神上的真正聯合。只要各省在事實上和精神上都通力合作起來，又何害於統一。反之，完

<sup>132</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頁 257。

<sup>133</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頁 257。

全用中央威力由強迫效果得來的統一，還萬萬不及這種真正聯合的統一。因為我們覺得一國的真正統一是國民精神共通的結果，而不是法律的結果，更不是武力的結果。<sup>134</sup>



透過共同的利害與目標，形成聯合一致的作戰，可以使本來閉關自守的各省連成一氣，以為溝通、交流、作戰的便利，更因為交流漸多，更能破除本來各省本位主義的成見，讓大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一體感，理解到聯合起來保衛國家的必要。這種透過真切交流逐漸形成的統一方式，在國家主義者眼中，比起強硬的武力統一更好。同時，聯省自治更因採取某種與聯邦主義相似的精神和辦法，也讓各省在為自身建設上，有更多便利性：

（一）因為在革命的期間，聯合革命的各省已經有了獨立規畫的能力和習慣，不必中央重為規畫，徒滋紛擾。（注意：這是在打倒割據的羣盜以後而革命的各省人物在精神上在事實上確能以國家為前提而實現民治的時候。）（二）因為中央政府的誠意是在各省革命相當成功之後；明白言之，便是先有省而後有中央，先有省憲而後有國憲。因此之故，我們的辦法是在聯合革命相當成功之省，由各革命的省區舉出代表，成立國會，議定國憲，關於中央的政權，在形式上係由各省賦予，在規定上係取列舉辦法……這樣一來，自然是中央的權力特別的縮小了。但是要實現真正的民治，中央權力的縮小是有利的事。我們由專制到共和，由絕對的中央集權到相對的地方自治，這種變遷的利益在事實上已經證明白了。<sup>135</sup>

實行自治的各省能夠在革命建國之後，與中央各省劃分權限，而中央—地方各省的權限劃分確立，因此就不會有相互干擾的情形產生。而且由於實行真正的地方自治，也能夠使人民熟悉政治事務，同時又有中央的政治活動，也能使各地人們有全國連帶的感覺，如此不僅消弭地域觀念，形成國家觀念，也能

<sup>134</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頁 257。

<sup>135</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頁 257-258。



夠使地方得到真正的照顧，推行真正的全民政治。

可以說，全民政治的根本在於聯省自治。而聯省自治的前提，在於推翻軍閥，打倒國賊。那麼該如何做？常燕生對此有深入的思考。他在〈聯省自治與中國革命的新戰略〉中指出：

國家的觀念並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他乃是由許多地方的觀念積合而成，因愛家，愛鄉，愛地方之觀念擴充而成為愛國的觀念，空談愛國而忽略愛地方的感情，猶如空談世界大同而忽略愛國觀念一樣，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從愛鄉觀念上建築起來的愛國觀念，才是真正可靠的愛國心。<sup>136</sup>

常燕生指出，這種建築在地方的愛國心，正是革命的基礎。革命與革命黨是為了這個國家存續而革命，而這個國家的根基正是地方以及地方上的人民，由於中國國民國家意識相對薄弱，但地方意識，特別是省籍意識相當強大，因此要將此一意識進一步推廣為國家意識、國民意識，才有革命的可能。倘若成功，則接下來要推動「地方的革命戰」，透過使人民理解到他們遭到壓迫的痛苦，進一步組織、領導人民起來反抗那些忽略地方利益的革命目標，因為當下中國的革命目標是分散、多方面且不集中的，所以常燕生認為，只要各地人民起義，發動全民革命，必可達到驅逐這些國賊的功效，當成功驅逐這些人之後，才有辦法接下來進行地方自治，進一步推行省自治乃至聯省自治。<sup>137</sup>

具體應該如何做呢？常燕生以上一篇文章為基礎，寫作出〈聯省自治的步驟〉，該文指出，在推行之前有些預備工作要做。首先是「鼓吹聯治政策使成為政治上中心思想」，這是因為武力統一的想法一直縈繞於中國的軍閥、黨派心中，因此導致彼此征伐不已，卻又因為沒有認識到，晚清以來的時代潮流，乃是地方意識的抬頭，因此彼此之間即使征伐，也很快就會因失去地方信任而遭到背叛。其實辛亥革命就是一場由地方到中央的革命，因此很和平順遂，但

<sup>136</sup> 常燕生，〈聯省自治與中國革命的新戰略〉，《醒獅週報》第 152-157 期，頁 30。

<sup>137</sup> 常燕生，〈聯省自治與中國革命的新戰略〉，頁 28-33。

是因為後來武力革命的思潮不已，使得中國戰亂頻仍未止。為了結束這個局面，唯有透過聯省自治，才有可能解決，那如果要推行，必然要先使這個思想成為人們的中心思想。再來是「組織以聯治政策為中心思想的有力政黨」，要有實際的活動、要運動有聯治思想的人民羣眾，就必然要有嚴密的政黨組織，這個組織要有中央組織與地方組織，中央組織居中策畫和制定方略、協調各地組織，實際活動的地方組織有極大的空間活動，並彼此相互呼應，以免遭到各個擊破。這個組織是誰呢？就是國家主義者的組織：中國青年黨。<sup>138</sup>

接下來常燕生說明，以省為單位，是因為當時省是大小最適宜、統治最便利、地域意識較為清楚的地方區域，其他不是太大就太小，因此以省推行革命和自治是最適合的。那麼建設省的根本原則，則有（一）為全體省民而非特定人民謀利，尋求共同的利益（二）使全民均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三）能夠表現民意、人民直接參與地方自治的全民政治（四）推行各種建設以厚植實力，博取民心。而要能夠建設省，就要推翻統治當地的土匪軍閥，最終必然是需要使用武力等各種手段的革命，這種武力革命是待民眾有一定的組織、對省自治有一定理解後，才運用民眾力量由下而上去推翻軍閥，最後得到省自治的權力以後，就要放棄武力，制定法律以法律治省，以免再度出現割據的軍閥。<sup>13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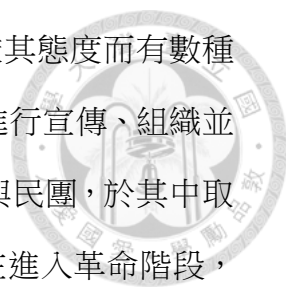
同時建設自治省，也有防禦共產黨的功用。在國家主義者眼中，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了破壞所有的生產事業，使得所有人都變成無產階級，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本來不夠，所以為了要使大家被迫與其一同革命，為了防止這一策略成功，必然要使各地有一定的生產事業與防衛武力。國家主義的聯省自治策略，正是阻擋共產黨破壞戰略的最佳法門。<sup>140</sup>

既然確立省自治是目標、革命是達成目標的手段、革命的主體是全民，那麼對象就是那些國賊，而判準則是看哪一個國賊壓迫民眾最厲害的，就先以其

<sup>138</sup> 燕生，〈聯治救國的步驟〉，《醒獅週報》第 165 期，頁 10-14。

<sup>139</sup> 燕生，〈聯治救國的步驟〉，《醒獅週報》第 166 期，頁 10-13。

<sup>140</sup> 燕生，〈聯治救國的步驟〉，《醒獅週報》第 168 期，頁 8-11。



革命對象，而通常均為掌握政權的軍閥或黨閥。對付這些人依其態度而有數種對付的方法，但是這段期間最重要者，乃是透過地方組織去進行宣傳、組織並訓練民眾，滲透入大大小小既存的民眾組織乃至於創造組織與民團，於其中取得主導權，最終成為革命的助力，去推翻既有的統治者。<sup>141</sup>在進入革命階段，強調統一由革命黨指揮、規劃策略與武裝力量的運用是非常必要的，而在成功之後，若也可以以小基礎進行建設，之後再謀全省的統一，之後革命政府就要竭力促成正式政府與省憲的制定，才能邁向自治之路。<sup>142</sup>當正式政府建立後，自治省的建設就進入消極的休養、小規模的培植到大規模開發三個階段，使人民能休養生息並重新開始建設地方，之後再逐步培養人才、訓練人民參與政治，最後再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建設，這就是從一省自治朝向聯省自治的起點。<sup>143</sup>

而聯省自治的自治省，正是國家主義者運用「聯戰法」進行全民革命的根據地。何謂「聯戰法」？「乃是以一地方為革命的根據地，便在這個地方集合訓練革命的羣眾，成為有組織的戰士；然後連絡其他的地方漸漸擴大範圍，使善勢力有所依據，而惡勢力不能闖入；然後與國賊外寇決一死戰。」<sup>144</sup>根據國家主義者的看法，隨著根據地在全省各地逐漸擴大，聯戰法將可以逐步形成中國的統一，驅逐國賊與外敵，達成理想中的國家，在全國推行全民政治。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全民政治的施行就是為了使國民能夠參與政治，透過參與國政形成熱愛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愛國心，使國家再也不落入破壞國家的國賊手上，國民就能夠讓國家變得更好。其中，聯省自治是全民政治的基石，國民在革命政黨指導下，透過學習參與地方自治、建設地方、驅逐國賊軍閥、創設地方國防等方式，以地方為基礎，引發愛鄉乃至愛國之心，逐步達到全國的統一。而統一之後，國民已有相當的政治經驗，便能實行全國型的全民政治。而選舉除了普通的中央和地方選舉，為了因應時局和經濟情勢的變

---

<sup>141</sup> 燕生，〈聯治救國的步驟〉，《醒獅週報》第 169 期，頁 5-9。

<sup>142</sup> 燕生，〈聯治救國的步驟〉，《醒獅週報》第 170 期，頁 7-11。

<sup>143</sup> 燕生，〈聯治救國的步驟〉，《醒獅週報》第 172-173 期，頁 15-18。

<sup>144</sup> 李璜，〈國家主義的建國方針〉，頁 253。

化，創設經濟議會，使職業團體參與國政，更能調節國內的經濟問題與矛盾，使國家的運作能更順利。國家主義者認為，在擁有愛國心的國民親自參與國政的情況下，會使國家走上穩定、安全、獨立自主的軌道。



### 本節總結


本節主要的論點，在論述國家主義者如何使國家主義的主張，具體化為適用於中國的行動策略。國家主義者透過指出國家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指出國家主義在中國的日益蓬勃，同時中國的國性是愛好和平的，因此正是實行防衛的、和平的國家主義的時機。

筆者指出，國家主義者在此時提出的具體主張，主要有：教育學、經濟學與政治論三項，而這三項主張環環相扣，彼此具有連帶關係。教育學的主張主要分為國民教育與軍事教育（武育），前者主要激發國家觀念和愛國觀念，並明瞭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帶關係，使國民能夠理解國家的存在，以及激發愛國之心，來去守護這個國家，進一步發動全民革命，「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而軍事教育，正是為了推行全民革命而準備的。政治論中分為全民革命與聯省自治兩項，而後者為前者之基礎，國家主義者認為，唯有基於中國人愛鄉的觀念，從地方發動革命，去進行建設與改革，讓國民透過參政增強愛國之心，並逐步推行省自治，才有辦法推行「野戰法」，去統一全國，進一步完成國家建設，而全民政治更是讓國民參與政治，以增強愛國心，並防備國家不再落入殘害國民國家的國賊手上的不二法門。而隨著政治權力由真正愛國者掌握，不僅要收回關稅等經濟主權，經濟學中國家經濟學發展政策的主張與社會政策遂能推行，使國家能夠達到富強之境，完整其國格，更進一步立於國際之林，不再受到列強的壓迫。

### 小結

回到本章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意識：「那麼國家主義的內涵為何？它的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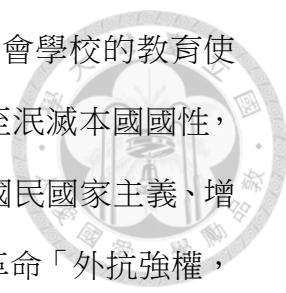




史是什麼？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又怎麼將國家主義應用於中國？目的是什麼？」筆者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因此在第一節描繪國家主義者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元素：國家、國性、國家主義史，以及分辨國家主義與其他易於混淆的主義的不同。國家主義中最重要元素正是國家，唯有人們愛國的天性萌芽，國家意識產生，才会有「國家」這個主體的存在，進而驅使人們想要保護或者爭取國家獨立。而承受這個意識的人們，才會去探索自身與他者之間的不同，梳理出屬於歷史、文化、所屬的疆土等屬於「自身」的事物，進一步分清楚彼此國家之間有著「個性」的不同，也就是「國性」的出現，同時才發現自身深受國家過往的歷史文化所影響，國家先於個人而存在。

當人們起而探索自身、爭取國家獨立的過程中，國家主義就誕生了，將會隨之而起的是國家主義運動，國家主義運動在西方有著漫長的歷史，最後這股思潮擴及全世界，也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潮流。這個時候，有著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區別，若是單一民族與文化、政治與文化共同體合一的運動，可以被稱作民族主義運動；但是近代國家本身時嘗試數個族群居，他們有著共同的過往和承受的文化，並不想各個民族獨立自主，因此推動的是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的獨立運動，這就是國家主義運動。而中國深受日本和製漢詞的影響，這種區別在中國特別顯有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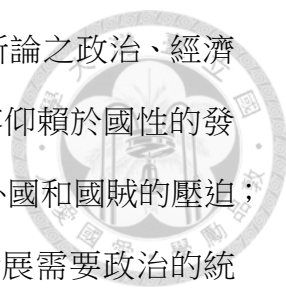
筆者在本章第二節，試圖描繪出中國的國家主義者腦中一套具有自成邏輯的思考模式，這一模式裡面將國家主義的特性與當時中國的歷史情境融為一爐，這一模式推展出的解決方案彼此環環相扣，並指出國家主義者相信，唯有透過這些方案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成為國家主義者宣傳其意識形態的根本。中國國家主義者率先指出中國的國性「愛好和平」的優點與缺點，並寄望於改造中國國性，在保留過往的同時，未來能解決過往國性的缺點。國家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也凸顯了這個必要性。同時，國家主義者更指出，不僅僅是中國國性本身的問題，而是中國國民國家意識的不足，這個意識的不足導致了中國現今的困境，而之所以不足，乃是由於當時



中國教育受到世界主義等有害國家主義的思想荼毒，以及教會學校的教育使中國人淪為外國權益、文化而非本國權益、文化的捍衛者，甚至泯滅本國國性，因此他們意圖透過收回教育權運動和國民教育，來灌輸中國國民國家主義、增強國性，使人們能夠愛國、為國付出與犧牲，具備推動全民革命「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意識基礎。

而中國經濟的衰敗、財政的匱乏、經濟主權的出讓，不僅阻礙了國家主義教育透過國立學校宣傳的目的，也使得國家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主權人格的人格受損，國性也將因此受損，長此以往，中國將因文化與經濟的侵略而亡國。為了使中國能夠具有富強的基礎，因此國家主義者採用德國國家經濟學學者李斯特的主張來發達中國經濟，更要收回關稅等中國經濟主權，使中國能夠富強起來，抵禦外國的經濟侵略，並藉此發展教育來阻擋文化侵略，最終使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有完整的國格立足於世界。

而要發展這些，則需要政治的力量。在這方面，國家主義者主張全民政治論，這套論述的基礎，在於地方聯省自治，國家主義者認為，人們愛國的觀念奠基於愛鄉，因此透過組織革命黨，在地方進行宣傳、組織、訓練人民去信仰國家主義與聯省自治思想，並打入現有組織，隨後透過革命打倒民眾的敵人，以地方為基礎展開建設、訓練民眾參政並培育愛國心，組成全民政治的基礎，唯有透過全民參政，才能使人們更愛其鄉、更愛其國，隨後逐漸擴大革命根據地，透過「聯戰法」逐步造成全國的統一。這時人們具有足夠的政治經驗，也因為透過聯省自治推動的全國統一，可消弭狹隘的地域觀念、創造全國的愛國心，國家經濟與教育也因此能夠推動與發展，遂能夠推行中央與地方的全民政治，同時為了因應當時資本主義發展下，經濟與社會狀況變化萬千，因此更參考法國的國家經濟議會，舉行職業選舉，來減緩社會矛盾。簡而言之，在推動聯省自治、全民政治的過程中，讓國民參與國政，就足以使人們發展、發揮其對中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愛國心，國家主義將因此發展，而隨著目標逐步的推進，最終能夠達到中國的統一。



總結上述，中國的國家主義運動，所要推行的乃是上面所論之政治、經濟與教育三方面的主張，這三方面的主張環環相扣，教育的內容仰賴於國性的發揚、歷史文化與國民義務的灌輸，這種內容卻是來自於受到外國和國賊的壓迫；全民政治的推動則有賴於國民教育的啟發；而國家經濟的發展需要政治的統一；而這些教育的大力推廣卻又仰賴於經濟的發展。而這些手段，最終是達致中國統一與富強。

在此時，國家主義者的意識型態內涵已經完備，林毓生所言意識形態中所需要的特性：根據自己的前提與當下歷史情境的危機，在其內部發展出一套自圓其說的、封閉的「系統性論述」。



## 第四章 結論

救國，富強，是晚清以降中國人的夢想，努力的目標。這個目標在中國近現代史的人物身上，呈現得非常具體、非常生動。從中國民族主義隨著第一代知識分子誕生以來，這個夢想一直深根於中國人的心中。主張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正是深受這股時代浪潮所影響、身處於其中的一群知識人。他們尊奉國家主義，認定這是最正確的意識形態，是最適合、最能救國的藥方。因此，他們在五四以後意識形態真空的中國裡面，組織起自己的政黨，致力於宣傳這個主張，並和其所認定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等敵人們展開搏鬥。

本文的問題意識，正如筆者在緒論所提的，是希望能夠解釋，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外是處在一個國際環境不穩定，而國內則政局和社會秩序混亂、經濟衰退，同時過往居於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崩解，導致意識形態真空、解決問題的各種「主義」盛行的狀況下，國家主義者是如何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進行政治活動，組成青年黨，與國民黨、共產黨形成三黨競逐的情勢的？同時，國家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國家主義」內涵是什麼？與「民族主義」有何不同？他們又是如何將之具體化為一套有系統的解決方案，用以宣傳、說明這個意識形態與解決方案，是如何能夠有效回應中國當時的具體情境的？

筆者在第二章梳理中國近現代政治史與民族主義思想的複雜脈絡，並描繪出在其間的行動者，如何在此歷史情境下活動。中國民族主義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浮現，從此逐漸進入中國人的意識中，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具有數個強烈的特性：（一）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二）社會達爾文主義（三）以國家為中心的集體主義（四）強烈的反傳統主義（五）壓倒啟蒙的救亡主軸。民族主義構成了近代中國人看待世界的主要視角。而中國近現代政治所呈現在中國人眼前的，也

是內憂外患接踵交相而至，民族主義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擴散於中國各階層，並走向激進化。

而在中國居於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儒家，也因隨著晚清西力衝擊和辛亥革命的緣故，導致普世王權的瓦解，儒家意識形態也隨著解紐、崩解，不再具有統治地位，其所建構出來的一套政治、社會、文化等秩序與觀念，也都遭到唾棄。因此，中國人大量引入西方思潮，使中國成為西方思想的實驗場，社會改革也取代了政治改革，紛紛試驗各種改革方案。在這段期間，孕育青年黨與共產黨多數成員的少年中國學會誕生了。

但由於社會改革的失敗、俄國革命的成功，與其強力的政治、外交宣傳，使得共產主義產生壓倒性的吸引力，不論是國內，還是旅法的中國人，都受到強烈的吸引，許多人無條件地支持共產主義和蘇俄，中國共產黨更在此時成立，受蘇俄指揮。蘇俄更促使國共兩黨的聯合，陰謀使中共吞併國民黨。此時中國國內的情勢仍沒有改善，甚至發生劫車案，導致列強共管的聲音出現。

在此一情勢下，曾琦等人在法國發現俄國與共產黨吞併國民黨的陰謀，加上中共在法支部不斷吸收成員，勸告孫中山無效後，遂決定組黨，並回國進行擴大吸收黨員，從事其所信仰的意識形態「國家主義」的宣傳，與共產黨對抗。此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也分化為三派，最終各自走上各自的道路，學會也因此解散。

隨後的情況，發生諸多引起列強鎮壓中國人民、激發民族主義的事件，國家主義者在此時，透過《醒獅週報》進行宣傳，於各地大幅吸收成員，並系統化、本土化國家主義的理論，使其適用於中國。因此，受到為數不少的人們支持，成為國共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本論文的第三章，正是敘述上述所言的意識形態國家主義的內涵與特性，以及應用國家主義於中國的方案。筆者將國家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四個基礎：

(一) 國家 (二) 國性 (三) 國家主義發展史，以及 (四)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不同。

國家主義者強調國家的誕生是基於競爭與互助所誕生，而國家的性質並非如馬克思等人所言，是由物質決定的，而國家與國家主義之間的關聯，乃是基於人所具有的天性「愛」，人因愛其國，因此會在國家受到壓迫時，為國奮戰，這就是國家主義的展現。正因愛國，因此反對所有主張國際主義、反對國家的學說，例如共產主義、世界主義等主張。同時由於國家主義者視國家如同人一般具有人格，因此國家有其國性，國性乃是一種經由生活、組織、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塑出來的國家靈魂與國民生活模式，而其內在則是這個國家共同的歷史回憶，合之則形塑出一個國家的靈魂，與國民的共有特性，不過，國性是可以變化的、會隨時間演化的，並非一成不變的。而當國家受到壓迫時，國性就會使國民出來為國家而戰。

而國家主義者眼中的國家主義史，指出國家主義誕生於法國大革命，以及國家主義有由上而下的專制製造，以及由下而上的全民政治兩條發展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國家主義的潮流因法國大革命而擴散至全世界，證明了國家主義是世界的潮流。並需要指出的是，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三者之間，人們經常誤解為同義詞，因此國家主義者用盡心思指出四者之間的不同，並用心指出國家主義者是包容性極廣的、和平的、防衛的主張，強調的是政治而非單一民族血緣文化的共同體，與後三者有著明顯的不同。

在上述四點的基礎上，中國的國家主義者針對中國特有的歷史情境，提出了系統化的政治論述作為解決方案。首先針對中國的國家主義史進行梳理，並指出中國國家主義發展的未來可能性。接著論述中國國性為「愛好和平」，並指出其優點與缺點、改進方向與方法。改善國性的方法在於「教育」，而國家主義者最重視者乃是教育，因這與其所提出的經濟學、政治論主張，環環相扣構成了解決中國困境的方案。




國家主義教育學的核心在於喚醒愛國觀念、責任心，以及灌輸時間與空間連帶感的「國民教育」，唯有使人們具有這些觀念，才能使其明瞭國家主義運動的重要性，並更愛國，願意去守護國家。而國家主義者所提倡的軍事教育，則是用以當人們願意發起全民革命時，所需具備的技能，並可從中使中國國性缺乏的組織、紀律等各種特性，加以強化。

國家主義政治論，其主張為「全民政治」，根基在於「聯省自治」。國家主義者推動聯省自治，乃是基於中國人愛鄉觀念的地域觀念，從地方作為革命基礎，透過全國性的黨組織，在地方進行宣傳、滲透和組織，到時結合人民使用武力，推動革命，建立起由省民自治的自治省，在自治省中透過國民參政逐步強化其愛國心。同時透過各地的連帶關係，逐步推動各省的革命與自治，進一步與之聯合，最終達成全國的統一。各個自治省在統一前，都是國家主義「野戰法」的根據地。當透過聯省自治與野戰法完成統一後，施行全民政治，建立起強而有力、不受外國干預的政府，收回所有喪失的主權，並透過經濟議會和職業選舉，用以調節全國社會矛盾、施行經濟政策。

國家主義經濟學，運用德國學者李斯特的國家經濟學，強調透過保護國內產業的關稅保護政策、發展經濟的產業政策、廢除國內稅關的統一市場以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來使國家經濟發達，讓中國走向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運用社會政策，解決社會分配不均的弊端。然而這些均須仰賴統一的政府，運用政治手段收回關稅等各種喪失的主權，這不僅是一種經濟所需，而是作為一個國家，喪失主權就是不完整的國家，因此為了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必須要收回經濟主權。

然而，國家主義者指出，若要強化愛國觀念，就必須透過興學、收回教育權等行動，但是若要興學就需要有力的財政支持。而有力的財政支持，背後需要一個統一且強而有力的政府，以及活絡發展的經濟，這就需要國家的統一，因此推動聯省自治以達全國統一，是國家主義者必須加速進行的。然而要做這



件事，又需要使愛國等觀念深入人心，就需要教育的支持。另外，要活絡、發展經濟，就需要政治力量協助收回經濟主權和推動有利的政策，這又需要統一且有力對外收回經濟主權的政府。因此三者之間環環相扣，是一套必須同時並進的政治方案。這也是不依靠既有勢力和外來援助的國家主義者，所必須要克服的高度困境。但是，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完整、能夠受到尊重地立足於國際社會的國家，是國家主義者的目標，是這套政治方案所要達成的目的，他們也自信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綜上所述，筆者所要呈現的，在一九二零年代紛擾的中國，國家主義者提出的這套自成系統的、封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方案，成為當時中國除國共以外的第三個選擇。這套方案具體回應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列強侵略、國共伺機而動的歷史情境，並為國家主義者爭取到不少黨員與政治支持者，更成為國共的眼中釘，意欲除之而後快。而國家主義者當時的政治主張，也切實地反擊了當時甚囂塵上的世界主義，使人們注意到，唯有從「國家」出發，才能踏實地去解決國內問題與外部壓迫的問題。





## 參考資料



### 一、史料：

-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冬青出版社編，《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臺北：冬青出版社，1975。
- 冬青出版社編，《國家主義論叢（第一集）》，臺北：冬青出版社，1973。
- 冬青出版社編，《國家主義論叢（第二集）》，臺北：冬青出版社，1973。
-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初稿〉，《列寧選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 215-222。
- 余家菊，《國家主義教育學》，上海：中華書局，1925。
- 余家菊，《國家主義概論》，北京：新國家雜誌社，1927。
- 李大釗，〈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茶會上的講話〉，收於姚維斗、楊芹編注，《李大釗遺文補編》（哈爾濱：黑龍江省新華書店印行，1989），頁 3。
-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上卷》，臺北：傳記文學，1973。
- 李璜、余家菊合著，《國家主義的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23。
- 張允侯等編，〈少年中國學會〉《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頁 211-572。
- 章進編，《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新北市：文海，1982。
- 陳正茂、黃欣周、梅漸濃編，《曾琦先生文集（卷一）》，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陳正茂、黃欣周、梅漸濃編，《曾琦先生文集（卷二）》，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陳正茂、黃欣周、梅漸濃編，《曾琦先生文集（卷三）》，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陳正茂編，《醒獅週報》，臺北市：國史館，1993。
-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臺北市：臺灣商務，1965。
- 斯大林，〈不要忘記東方〉，《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頁 152-154。

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55-61。



## 二、中文專著

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周淑真，《中國青年黨在大陸和臺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著，陳謙平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柯博文（Parks M. Coble）著，馬俊亞譯，《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臺北：學術出版社，1983年第五版。

唐寶林，《陳獨秀大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康之國，《曾琦國家主義思想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張太原，《「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郭正昭、林瑞明合著，《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臺北：百傑出版社，1978。

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臺北：秀威，2011。

馮兆基著，劉悅斌、徐礎譯，《尋求中國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〇年代中國政治》，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8。

羅伯特·艾倫（Robert C. Allen）著，陸贇譯，《全球經濟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 三、中文論文

-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收於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66-101。
- 王奇生，〈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收於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9-65。
-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45-74。
-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3卷第4期（臺北：2001），頁477-513。
- 王遠義，〈現代中國思想變遷中的歷史主義〉，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主編，《中國文學歷史與思想中的觀念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2005），頁375-416。
- 丘為君，〈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1期（臺北：2016），頁1-46。
- 李金強，〈曾琦與其《國體與青年》〉，收於金觀濤等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493-506。
- 李義彬，〈國家主義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反動活動〉，《歷史研究》第5期（北京，1965），頁33-46。
-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於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出版者不詳，年份不詳），頁7-57。
-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期（臺北，2002），頁49-119。
- 沈雲龍，〈兩位反共的先驅：梁啟超與曾慕韓〉，收於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臺北：傳記文學，1981），頁167-180。
- 肖海艷，〈“新國家主義”與九一八事變后陳啟天的抗日救國主張〉，《井岡

- 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卷第15期（長春，2013），頁116-121。
- 尚海艷，〈陳啟天的「新法家」與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二十一世紀》第136期（香港，2013），頁44-56。
- 尚海艷，〈陳啟天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探析〉，《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長春，2010），頁246-249。
- 尚海艷，〈陳啟天與20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權運動——兼談國家主義教育思潮〉，《歷史教學（高校版）》第2期（天津，2009），頁44-56。
-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激進化反傳統思潮、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收於《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下冊）》，頁785-863。
- 段煉，〈臨城劫車案與中國青年黨的成立〉，《歷史教學問題》5期（上海，2009），頁60、66-69。
- 孫承希，〈析國家主義派的“新法家主義”與“生物史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上海，2003），頁109-116。
- 孫承希，〈醒獅派之集體意識與道德社會的追求〉，《史林》2期（上海，2003），頁98-105。
- 張少鵬，〈常燕生東西文化觀的激進化及其演變〉，《史學月刊》6期（開封，2013），頁77-86。
-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頁37-60。
-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於《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頁105-140。
-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頁75-91。
- 敖光旭，〈1920—1930年代國家主義派之內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期（廣州，2006），頁90-109。
- 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國民黨與中俄交涉（1922-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期（臺北，2007），頁141-192。
-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5期（臺北，2007），頁47-97。
- 敖光旭，〈國家主義與“聯俄與仇俄”之爭——五卅運動中北方知識界對俄態

- 度之解析（上）》，《社會科學研究》6期（成都，2007），頁139-149。
- 敖光旭，〈國家主義與“聯俄與仇俄”之爭——五卅運動中北方知識界對俄態度之解析（下）〉，《社會科學研究》1期（成都，2008），頁140-152。
- 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收於氏著《勤工儉學的發展》（臺北：三民，1988），頁1-20。
- 陳正茂，〈「大江會」的國家主義運動——以梁實秋、聞一多為探討對象〉，收於《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2008），頁43-80
- 陳正茂，〈中國青年黨史料研究——以期刊為研究場域〉，收於《敝帚自珍——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臺北：秀威，2009），頁251-330。
- 陳正茂，〈李璜的政治初航（1919-1923）〉，收於《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2008），頁229-259。
- 陳正茂，〈曾琦與民國政治〉，收於《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2008），頁173-228。
- 馮筱才，〈江浙戰爭與民初國內政局之轉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期（杭州，2004），頁54-62。
- 黃金麟，〈革命與反革命——「清黨」再思考〉，《新史學》11卷1期（臺北，2000），頁99-147。
- 羅志田，〈救國抑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收於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55-95。

#### 四、西文論文

- Chan Lau, Kit-ching(陳劉潔貞),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1923-1945”.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 Marilyn A. Levine (林如蓮), “Zeng Qi and the Frozen Revolution.” in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ited by Roger B. Jean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2, pp.225-240.

#### 五、學位論文

陳雲卿，〈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吳國樑，〈國共以外的選擇：中國青年黨之研究（1923-194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哲學碩士論文，1998。

孫承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王永珠，〈聯俄與仇俄：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蘇俄態度的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曾輝，〈中國青年黨研究（1923-1945）〉，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